

# 安那祺主义：理论与实践

## **Anarchism: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趙京 Jing Zhao

 中日美 比較政策研究所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SBN 国际书号: 978-0-557-01635-8

Publisher & Printer 出版印刷社: Lulu Enterprises,

860 Aviation Parkway, Morrilville, NC 27560, USA

Rights Owner: US-Japan-China Comparative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http://cpri.tripod.com>

Copyright 版权: © 2008 Jing Zhao 赵京

160 Maidenhair Ct., San Ramon, CA 94582 USA

Language 语言: Chinese 中文

Distribution 发行: DT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www.dt2002.com](http://www.dt2002.com) DT 国际出版社

China Agent 中国代理: Ping Wang 王平 (成都) [wping33@gmail.com](mailto:wping33@gmail.com)

Japan Agent 日本代理: Liang Li 李梁 (青森) [liaosa@yahoo.co.jp](mailto:liaosa@yahoo.co.jp)

Edition 版本: Third Edition 第三版

Version 印次: 1st Printing 第 1 次

Character 字数: 157 千字 157 thousand

Date 日期: Dcember 31, 2008 2008 年 12 月 31 日

## 目录 Contents

### 序言 Preface

1. 什么是所有权 What is Property
2. 以民众史观认识民众运动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3. 我理解的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  
On Mennonite, Anabaptism and Pacifism
4. 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On State Power and Anarchism
5.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On the Conflict of Marx and Bakunin
6. 跨越世纪的会晤 A Dialog with Bakunin
7. 脱离日本政府管制申请  
Anarchists Kurimura and Miyaji to the Meiji Government
8. 克鲁包特金对现代社会的再启蒙 On Kropotkin
9. 是社会性运动，还是政治性斗争 On Plekhanov
10. 关于 Kronstadt 悲剧的新资料  
New Documents on the Kronstadt Tragedy
11. 马克诺运动的教训 The Lesson from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12. 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  
On 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 and Leninism  
附：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Visiting Lenin's Tomb
13. 非宽容社会中激进主义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Radicalism in Totalitarian Society
14.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On Molotov and the Fall of the USSR
15. 托洛茨基：问题与主义 On Trotsky and Trotskyism
16. 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  
Anarchism for Universal Political Freedom
17. 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萨维哈斯惨案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18.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Anarchist Movement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19. 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  
A Life for Freedom: Augustin Souchy's Autobiography
20. 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 The Natural Character and Social Character of Human Rights
21. 个人人权的尊重与民族主权的平等  
On Human Rights and Sovereignty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22. 社会改进党人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A Challenge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23. 日本红军来自狱中的声明  
A Declaration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Prisoners
  24. 论恐怖主义 On Terrorism
  25. 丘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Pacifism as Pathology
  26. 作为外交政策的美国民主  
American Democracy as a Foreign Policy Means
  27. 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 On Chen Duxiu
  28. 毛泽东主义 On Maoism
  29. 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与教训 Cuban Anarchism: History and Lesson
  30.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Working Right as a Basic Human Right
  31. 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  
The Theoretical Mistakes of the CCP and the CP-USA
  32. 从挑战 Yahoo 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  
Challenge Yahoo at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33. 出席 Chevron 雪佛龙公司股东大会  
Attending Chevron Shareholders Meeting
  34. 国际经济学的政治条件  
The Political Condi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35.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  
The Political Condition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36.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Th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 to Abolish Nuclear Weapons
  37. 美日安全保障合同委员会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38.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 On Spinoza
- [附录] 作为科学的比较政策研究  
Comparative Policy Study as Science

## 序言

首先，我必须说明如何把 anarchism 译成中文。

在一九八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和出卖之后，我从自己与北京政权和东京政权的抗争经历（以及与华盛顿和台北当局的短暂接触）中成为了一个 anarchist。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九九二年四月发表在东京出版发行的《民主中国》月刊上的《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与《跨越世纪的会晤》是中国人自从二十世纪初期短暂流行后就消失了近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对 anarchism 的再发现。正如我在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这个中文译名多少阻碍了人们对它的理解。我注意到这个借自日本的译法（其实，连“政府”、“主义”、“社会”、“共产”等近代政治用语都借自日本）在日本已经被片假名音译アナキズム所代替，说明日本的知识界已经普遍认为“无政府主义”不能准确表达 anarchism 的含义。

另一方面，我对于早期音译“安那其主义”有一定的抵触感，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文献中几乎查不到这个音译，不敢冒险把笔墨浪费在普及这个用语上而忽视其丰富的政治含义。但是，当我这十几年来一直用“无政府主义”这个用语表述我的研究、思想时，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毕竟确实在“推广”、“普及”一个潜在于中国社会但没有被认识理解的概念、理念或社会组织方式，确实有必要从“白纸”开始。这样，用音译不仅可以准确定义和评述已经在西方（包括日本）文明中展开的理论和实践，更可以注入古老的和新兴的中国社会内涵。而且，中国社会并不抵制具有内在价值的概念的音译用法（如佛教中的大量专用名词）。我为此曾经就教过不少人，记得乔姆斯基说过：名称不太重要，关键是实践内涵。我决定略加修改，确定把 anarchism 音译为“安那祺主义”。

虽然我们可以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文明中找到安那祺主义的雏形和原初表述，作为社会思想与实践的安那祺主义无疑是近代西方社会中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中最灿烂动人的理想。此书收录的文论也大多通过人物、事件和实践说明安那祺主义的理论。如果我们比较宗教中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单一圣经与佛教的千姿百态的不同，就会体会到社会主义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专断教条与安那祺主义的“百家争鸣”的差别。我们都确信安那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方式，是人类发展和个人自由的和谐与幸福的保障。

本书收录笔者多数已经在《民主中国》、《十月评论》、《比较政策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的论文，并大多沿用“无政府主义”的译法，大体上按时间次序先介绍法国、俄国、西班牙、美国、日本的安那祺主义

的历史与理念，然后通过笔者自身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实践，说明安那祺主义在实际运动中的指导价值。虽然不能说全面，本书基本上考察了安那祺主义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思想和实践。当人类的知性发达、成熟起来时，我们会发现人类所崇拜的那些“总统”、“总书记”、“主席”、“总理”、“大臣”和 CEO 等所窃取的权势，正是人类理智不开化的象征。畅饮过安那祺主义理智之泉，谁还会再欣赏那些用裹尸布制成的形形色色的服务于金钱和权力的嫁妆！但愿本书的出版多少能加深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秩序的理解并改进之。

赵京

2008年10月1日 美国 圣拉蒙

附注 1：主要是出于政治敏感性和避免误解的考量，我在此没列出需要感谢的亲朋好友和同志们。但愿此书第三版能早日在中国正式出版。

附注 2：第一版出版发行后，根据初步反馈，略加修订，以第二版的形式出版。（2008年10月30日 美国 圣拉蒙）

## 1. 什么是所有权

共和国、宪法，  
多么动听的名字！  
可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看啊，饥肠辘辘的穷苦人，  
依然衣不蔽身，  
依然劳累困顿。  
再来一次革命啊！  
这次应当更向前一步，  
应当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注1）

在以政权斗争为中心展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矛盾，如以温斯坦莱为代表的山岳派平民利益，以布朗基为代表的共和平等派的诉求。他们很快明白：新掌权的、以资本为后台的统治阶层马上就出卖了曾经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平民阶层；为了政治权益的垄断，统治阶层甚至完全不顾那些从人类历史保存下来的、同为人类一分子的基本伦理情感（注2）。很显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革命，总要维持的人支配人的组织社会必然会堕落腐化下去，这种新的革命，马上就集中到所有权的制度上。马布利（1709—1785年）可以被称为是思想先驱，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他就预见到所有制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革命不可能彻底。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马布利本有一切机会在神职工作的道路上取得教会和国家权力的高级地位，但他在风华正茂的中年突然离开外交部，完全献身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与官方的政界活动绝缘，连查理十五世之子的太师之任也坚辞不就。这个抉择，一方面是他厌弃其熟悉运作的专制制度的政治观点的成熟，一方面更促使他到古希腊历史（特别是反对奢侈的斯巴达制度）中寻找国家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作为“第三等级”利益代表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局限。在他的众多著述中，马布利体现出禁欲主义的道德情绪，以道德标准来区分人类社会的历史，甚至宣称：幸福就在我们本身，而不在于我们拥有的事物，对于国民来讲，需求越少、幸福越多：“立法者的艺术在于减少国家的需要，而不在于增加便利于满足国家需要的收入。……拟定提高国家收入或国库权利的任何办法，都是具有毁灭性后果的。”（注3）这种道德宣教基于马布利对现实社会中由所有制私有带来的弊端的认识：“我越仔细考虑这个问题，越深信财产和地位的不平等正在使人产生所谓分化并改变人心的自然趋向，因为无益的需要使人产生对他的真正幸福没有用处的愿望，使

他的脑袋充满最不公正和最不合理的偏见或谬见。”（见注3）他更特别反对靠金钱支配政治：“因为一国的执政者的需要，一般比任何其余东西都更能增加国家的需要，而执政者的生活习惯又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活习惯，所以我希望财富不要创造参加治国的权利。”（见注3）

如果仅仅是劝人为善，希望统治阶层节制，马布利更适于从事预定的神甫教职，维护已经被因涉及法国、欧洲政治而丧失的天主教本来具有的人道主义传统。但马布利更进一步、更坚决地反对私有财产制度，主要是从自然权利和自然状态理论出发，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破坏了自然秩序。按照当时流行的重农学派的观点，个人私有（即不依附于领主等的人身自由）、私有动产（即对生活必需品的所有权）和私有土地三项关系密切构成统一体，如果缺少一项，其他两项就必然随之解体。马布利否认三者的不可分性，他承认前两项符合自然原理，竭力反对地产权（包括土地私有制萌芽的茅屋所有权和劳动产品所有权形式）。即使最初平均分配土地，经过若干时间（注4），私有制必然引起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分裂成几个阶级、社会道德下降，富人阶层必然力图夺取政治统治权、任意修改法律，在贪欲土地的驱使下发动战争……，总之，私有制不仅破坏了一个社会（国家）中公民之间的和谐，而且也破坏了整个人类各社会集团（国家）之间的安宁（“哲学家经济学家对政治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的疑问”，上揭书）。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认为人身自由是所有权自由的一部分，而更把它与生命一样理解为作为人类一员的资格。“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协议和人为的制度，因此人人能够随意处分他所有的东西。但是，人类主要的天然禀赋，生命和自由，则不能与此相提并论。生命和自由的天赋人人可以享受，至于自己是否有权抛弃，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抛弃了生命，便完全消灭了自己的存在。因为任何物质财富都抵偿不了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理性的。”（注5）正是卢梭不但恢复了把出让人身自由视为犯罪行为的罗马法精髓，而且宣明了人身自由是人的天然权利，并不是受社会制度制约的公民权利（如罗马的“解放奴隶”必须得到人为的法律裁决才能具有人的天赋）。“自由乃是他们以人的资格从自然方面所获得的禀赋，父母没有任何权利剥夺他们这种天然禀赋。那么，为了建立奴隶制，就必须违犯自然，同样地，为了使这种权利永存下去，就必须变更自然。法学家们既郑重地宣布了奴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奴隶，换句话说，他们也就是肯定了人生下来就不是人。”（见注5）如果注意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所有权是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具有个人独立人格能力的、主体人对客体物财的所有关系，就首先可以认识到所有权是近代国家社会关系的进步的产物；在那种“人生下来



就不是人”的制度下，实际上是不可能论及（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关系的。如果以此标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关系，就会吃惊地发现，有十多亿民众（加上去世者）因为“农村户口”被终身固定在并不属于自身的土地上，是丧失人身自由的农奴（注6）此“农奴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罪恶，远远超过“文革浩劫”、“反右斗争”给人的灾难，任何人都不能找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身自由只不过是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的自由”等借口来肯定其它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制度。

在确立了人身自由后的社会里，社会性财物（一般情况下，空气、阳光、海洋等自然环境暂不考虑）就对人的关系而言可分为两大类：

（一）直接用于个人生活必须的吃、穿、住消费用品，也称基本生活资料，（二）间接服务于个人生活的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与知识技能）以及满足个人高等社会性消费的生活资料（如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的别墅）（注7）。同时肯定这两类财物的个人所有性质，认为私有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权利，是确定不移地赋予所有的人的权利，是所有的人为其生存所必要的和没有不公正就不会被剥夺的权利（注8），构成以后逐渐形成的资本阶层统治的私有制王国；同时否定这两类财物的个人所有关系，就是单纯、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但更偏于后者）、大致接受第一类财物的个人所有但反对第二类财物私有的思潮，就是以后形成强烈实践运动的社会主义理论。

私有制拥护者的强大支柱来自于“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观念，连对私有制攻击得最透彻、把人类不平等的产生归罪于私有制这个唯一基础的卢梭理论也“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纵然在浅薄的批评家看来可能是这样的理论”（注9），卢梭的社会契约的基础正是私有制，“的确，财产权是公民所有权利中最为神圣的一种权利，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卢梭把马布利竭力推崇的“古代共产主义”斯巴达政体称为暴虐的贵族政治制度，他的学生丹东、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等革命性再彻底，也不止一次地宣布：私有制是神圣的（马拉可能是例外）。国民公众甚至发布命令：“凡提出土地改革法或提出其他一切推翻土地的、商业的和工业的所有权的法案的均处死刑。”

卢梭没有如马布利等人那样把腐化的（私有制）社会与善良天性对立以建立理想社会，他的贡献在于激昂地不妥协地指出社会是建筑在不平等的基础上，贵族阶层的豪华生活（包括卢梭也置身其中没法完全摆脱的、为贵族阶层效劳的腐朽文化）是建立在平民的贫困上面的。这样，那种把社会进步只指望于上层阶级良知发现的说教或者是出于认识论上的无知（我们从马布利的个人禁欲生活中可以这样认为），是对平民的欺骗。社会平等本来是自然的天赋，怎么需要依靠统治阶层的恩赐才能获得呢？但卢梭深深陷入矛盾的辩证法中，知道虽然民众渴望解脱奴役

关系，但“每个人都会理解，奴役的关系，只是由人们的相互依赖和使人们结合起来的种种相互需要形成的。因此，如不先使一个人陷于不能脱离另一个人而生活的状态，便不可能奴役这个人。”“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疾呼：‘不可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但是，很明显，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因为私有观念不是一下子在人类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许多只能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的。”“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见注5）

或许，我们没有必要设定人类不平等的产生一定是伴随着私有制建立起来的，因为在原始的共同享有资产的氏族部落中，只要人这么一种社会性动物出现，就必然生活在被区分为不平等的上下人际关系中，就产生了人支配人的关系，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个人或阶层必然占用由于集体协作产生出来的、超过单个人作用（劳动）简单相加的成果。二十个人可以协作在一天内捕获猛兽，但一个人用两百天可能也毫无收获。问题在于：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往往只以被支配者单独劳动中付出的价值来支付集体协作产生出来的价值；在现代的分工协作产业社会中，它成了经营利润的差额来源，因为如果劳动者不安于低报酬还想获得由分工协作带来的价值时，经营资方很容易重新雇用另外的单个的劳动者（注10）。对于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者而言，能够找到一个就业机会就诚惶诚恐了，哪还会与雇用自己的企业交涉工资等条件呢？

既然人必须从事社会生活，就必然促使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不断地加重每个人对社会组织的依赖关系以便进一步剥削压榨。而且，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使得支配者A很容易在分与一部份强占利益的前提下指使一些被支配者B共同去压迫征服另一些被支配者C，由此败坏了社会道德，“统治别人比不依附人更为可贵。他们同意戴上枷锁，为的是反转来能把枷锁套在别人身上。很难强使一个决不好命令他人的人去服从别人。”

（见注5）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权势的社会就逐步形成，把不平等关系以保障私有财产的法律形式强制固定下来。怪不得鲍胥爱说：“假如我们要追溯到事物的本源，我们也许会发觉，对于你所拥有的那些财产，他们（穷人们）的权利并不小于你的权利。……我们当中任何人也不能自诩他在自然中比别人处于更优越的地位。”（1652年

《圣弗朗索瓦·达西斯颂词》）卢梭在此打碎了十八世纪中被人们坚信的“一切都以法制为转移”的信念，并由继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证明了：任何特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首先是结果；也就是说，至今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所有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甚至也可以用于否定卢梭对于私有财产的坚定信念。

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最终在欧洲确立了共和国和宪法制度，但民众很快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解放，在劳工中出现了反对各种资产权力的无产者阶层的独立意识。与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的有闲阶层（注11）改革相比，以魏特林（1808-1871年）为代表的劳工思想一开始就看穿了国家银行、国家工场等金融资本家和政府的改革措施只是延续社会不平等的陷阱，而号召劳动的贫困大众起来进行社会革命，实行财富共有共享、废除金钱货币，“恢复”早期基督教团生活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凡是仗着自己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而要求比别人多享受或少工作的人，他就是贵族。”“在我们的组织恶劣的社会里，富有者和有权势者享有不利于劳动者的真正不受约束的自由。”“你们所引以自豪的一切财富，难道不是你们或你们的上辈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人民那里窃取来的吗？你们强加给我们的捐款和赋税、你们使资本膨胀起来的利息、你们制造出来的破产、你们装出来给我们看的虚伪和耗费浩大的官司，难道不都是盗窃吗？你们让工人在令人窒息的工厂里过早地衰亡，这难道不是你们对社会犯下的谋杀罪吗？你们的监狱、断头台和手持刺刀的军队，不是到处宣扬谋杀吗？”（见注1）魏特林以裁缝帮工生活，不可能如卢梭、马布利那样有条件钻研古希腊和罗马历史，从知识上只可能反复推敲在德国手工业工人中具有深厚影响的、但他自己已经不再信仰的《圣经》，并想到利用宗教感情解放人类，为艰苦的斗争注入福音色彩。他大胆地指出《圣经》的许多矛盾之处，以此说明他要揭示的基督教原则才是《圣经》的精髓并力图模仿耶稣宣传组织革命。“正因为这是史实上的、而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所以这些矛盾对于检验基督教的原则来说，根本不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耶稣后来所宣扬的东西，全是约翰先前提出的主张，财富共有共享的原则，艾赛尼派在约翰之前就宣传过了。”（注12）魏特林特别教育了俄国贵族巴枯宁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无政府主义。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财富再分配（也包括新创造财富的分配）过程，可以免去象卢梭那样“到圣日尔曼去作了一次七八天之久的旅行……我到树林深处去探索，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形象，我在心里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见注5），也可以超越魏特林的义愤激情，很清晰地看出：超常致富的财产几乎都是靠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掠夺来的。那些由中国民众自四、五十年以来在国家权势的

强制或欺骗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可观的国有资产（如填海造田、引水工程、三线建设、大跃进炼钢等等），在尚未被瓜分之际名义上是属于国民的，实际上完全被统治阶层的“计划”所垄断，很少达到造福国民的功用。民不聊生的危机促使了国家统治阶层的“改革”政策，一时间也赢得了人心，取得了统治阶层自身也沾沾自得的胜利。仔细回想，自从邓小平集团主导中国政局以来，曾经吃过毛泽东专权之苦的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集团确实地接触、倾听了来自民众的呻吟，顺应了民心（如果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这一步决不可能实现）。但是，仅仅顺应民心并不是政治改善的充分条件，整个国家统治集团比较顺利地接管政权（包括可观的国有资产）后继续打着“改革”的旗号只不过在于“改革”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共元老阶层陆续过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把包括国家资产在内的巨大国家利益移交到他们的后辈手中，但其不争气的后辈无论在人品、资历还是在能力上都无法统治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度（他们倒不在乎来自民众的对世袭制的愤怒）——况且，这个国度已经不可能如过去那样全权统治了，所以，统治集团迫不及待地制订“法律”，以国家权力的意志把国民用血汗和生命积累起来的财富以“民营化”的形式瓜分吞食掉（注 13），把财富建立在强夺的罪恶上（注 14）。其次，那些多少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民众最近创造出来的大量财富，几乎重复着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指出的原始积累过程，只不过此次的国家权能更为强大罢了，甚至连略有良知的外国人看到中国劳工的工作条件也过意不去。个人所有差别的扩大就是社会不公的体现，如果中国民众在“改革”尚未被完全葬送之前不能有效地制止官僚统治阶层的腐败，留给中国的只有社会革命的选择了。

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因为看到私有财富的不正当来源就否认个人拥有财产的权利，在一党专政的全权统治下，个人正是因为被剥夺了甚至属于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的权利而实际上无法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问题在于：如何划分所有权的限界（定义），使得个人的人身、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又不至损害公共利益？按照上述分类，蒲鲁东（插图，1809—1865 年）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不同意义（注 15），他把第一类个人所有称为“个人占有”，“个人的占有是社会生活的条件；……是一种权利”，它符合自然，适用于自罗马法传下的定义：所有权是在法律所许可的程度内对于物的使用权和绝对支配权（或随意处置权）。此处的“物”指的是直接消费品等基本生



活资料，而不是如 1793 年法国宪法在开头发表的《人权宣言》中说的“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物、自己的收益、自己的劳动和勤勉的果实的权利”或《拿破仑法典》第 544 条说的“所有权是最绝对的方式享受和支配物件的权利，但不得对物件采用法律和规章所禁止的使用方法”那种超出个人生活资料的（因而也必然侵夺他人财物的）无限界的所有权。即使是基本生活资料的所有，也不可以“绝对”地随意支配，必须服从公益性的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往往不能由法律具定明裁。例如在发生饥荒时大财主囤积粮食宁肯烂掉也不提供给民众，就超过了个人所有的权利范围。把个人所有基本生活赋予天然权利的性格，其意义在于否定共产制的幻想：“那种存心否定私有制的自成体系的共产主义却是在所有权的偏见的直接影响下孕育出来的；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总是有所有权一词。……勤奋的人不得不为懒汉工作，虽然这是不合乎正义的；能干的人不得不为笨蛋工作，虽然这是荒谬的；最后，人抛弃了他的个性、自发性、天才、情感以后，就不得不在公共‘法律’的权威和严格性面前低首下心地自趋灭亡。……共产制是压迫和奴役。……共产制侵犯了良心的自主和平等：侵犯前者就是压制智力上和情感上的自发性、行动和思想的自由；侵犯后者就是用相等的美好生活来酬报劳动和懒惰、才干和愚蠢、甚至邪恶和德行。”蒲鲁东建议，把这个可以存在的个人所有称为“占有”以区分法律定义的“所有权”一词，正如西塞罗把土地比做一个大戏院那样，谁坐在椅子上那个座位就是他占有的，但椅子却是戏院所有的。椅子的功能是在上演时向观众提供使用价值，这种向使用人提供的价值功能是可以被占有的，但使用目的和条件是受社会制约的。同样地，这种占有形式还可以略为扩展到“小生产者”（包括个体农户）为了维持生计必须保有的经营和劳动手段（蒲鲁东没有区分这两者）。

相对于个人或家庭独自占有的所有权（在商法中多体现在 Sole Proprietorship 或 Self Employed 个体经营业主或家庭经营）而言，蒲鲁东所指的第二类所有权包括今天的跨国公司那样的大规模私有形式，它们必然带来各种盗窃：诈骗性的破产、公·私文件伪造、彩票、高利贷、地租、利润、敲诈勒索等等，都是专制社会的基础，是苦难和罪恶的主要原因。所有权的弊端广为人知、广为人恨（注 16），蒲鲁东骄傲地宣判：“所有权就是盗窃。”

所有权按照既有的法律制度定义，是指完整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利；占有则是一种事实状态，即与所有权归属分离而行使的、在一定条件（期间、使用规定等）下相对、暂时的权利，不改变所有权的性质。那么，我们所占有的财物的所有权在谁那里呢？在社会整体：“人从社会的手中得到他的用益权，只有社会可以永久地占有；个人会死亡，社

会是永久不灭的。”需要留意的是，这个社会，决不是指的国家（政府），因为现存国家本身正是所有权制度的产物。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正是要建立没有所有权、不同于共产集权的社会。虽然在私有制下废除其法律制度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在马克思看来是贫困的哲学的贫困，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废除了所有权的私有制，并不是我们至今为止所理解的私有制。所以，从理论上讲，没有必要嘲笑一个法国印刷工人的天才发明，而应该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态在实践中去检验它。

注 1：[英]魏特林：《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 年）开卷，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1984 年 4 月版。

注 2：在 1989 年春天中国发生的震撼世界的运动中，再一次复现了这种普遍人性为国家权力玩弄的性格。只是因为其被镇压才减少了被出卖的性格。

注 3：[英]马布利：《马布利选集》之《论法制或法律的原则》，何清新译，商务印书馆，1960 年 4 月版。1983 年 3 月该书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

注 4：基督教社会主义政论家拉梅耐说得更明确：“这样的财产平等如果是早晨建立的，往往到晚上就不再存在了。”《一个信徒的话》，1834 年出版。

注 5：[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 年版。

注 6：“城市户口”是一种（上等）公民制度，被剥夺掉这个公民权利下放到农村、农场的“知识青年”回城浪潮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标志之一。

注 7：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在《七大洲风云四十年》中记叙与铁托等共产党头目乘游艇、避暑别墅时“天真地”询问，这也是工作需要吗？惹得主人难堪。如果再记忆起铁托死去后人们很快赶走了他的赖在总统宫中不肯搬出去的遗孀，就可以理解今天南斯拉夫解体的意义并不在于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的胜利，而在于制约原来存在的民族矛盾公开化的外部环境的变迁。

注 8：[英]李弗尔：《社会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秩序》，1767 年版。李弗尔是马布利所批驳的重农学派人物。

注 9：[德]考茨基：《论 1789 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注 10：日本的经营管理阶层比别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同行们较注意社会地位的平等。例如，据报道 1994 年公司社长的工资平均仅为新职员工资的 10.6 倍，但美国的差距可达数十或上百倍。

注 11：这三个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其实很不相同。小店业主傅立叶偏于哲学的玄思，圣西门擅长于设计未来产业社会的浪漫，欧文则是当时最先进工场经营的大企业家，俯心于现实的改善。

注 12：[英]魏特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3 年），胡文建、顾家庆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参见注 1 中的文章，两文合为一册书出版。另外，魏特林还著有《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 年），与前两文共同构成了他的空想体系。魏特林关于耶稣的天才猜想是基于他亲身经历的体现，以后在死海岸岩下发现的怪文书多少印证了他的说法。

注 13：例如，中共的国家副主席无法把同一权位让给自己的儿子，就推出最大官商（它的更通俗名字叫“官倒”）公司总裁的位置，把儿子扶上官商公司总裁的椅子。

注 14：一般显贵害怕强使他们尊重人民的那种政府，比害怕死亡还厉害。当波斯的七位解放者杀掉篡王的伪斯麦尔第斯后集会讨论他们的国家应当采取哪一种政体时，总督奥达奈斯坚决主张应当建立共和国。当他看到人们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将要选举君主时，于是让出竞争王位的权利而只要求他本人和子孙能够做自由人（见注 5，卢梭引自希罗多德）。无论何种统治形式，权力交替的结果总是一个明确的判别方式，例如，从全日成·全正日父子世袭中可以想见北朝鲜更象波斯而不象希腊。

注 15：[英]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1840 年版），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2 年版。

注 16：大布朗基（“囚徒”革命家布朗基的哥哥）在致蒲鲁东的信中告白到：“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各类的所有权被滥用的情况实在太多。但我不能从滥用所有权做出废除所有权的结论，这个猛药和可以治愈一切病害的死亡太相象了。”蒲鲁东把此信放到《什么是所有权》的前言以示对大布朗基的尊重。

[1995 年元旦 日本静冈县三岛市]

## 2. 以民众史观认识民众运动

沙皇的幽灵在俄罗斯复活，显示出俄罗斯革命连最基本的政治成果也被出卖殆尽了。不过，如果我们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另一场具有相同重要意义的法国大革命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对于今天的这一插曲也就不会惊奇了。

关于法国大革命，从同时代的米涅的《法国大革命史》到今天的以巴黎大学索绪尔教授(注1)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史讲座，大都是学院式研究；以保守的统治立场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的政论，如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只有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才是彻底以民众史观描写这场民众运动的，才是最明确地揭示出革命的真髓的作品。

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内战等击败了白军的反动军事势力，同时也镇压了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政治力量，特别是镇压了1921年克朗斯塔 Kronstadt 海军基地以无政府主义水兵为主的起义。但布尔什维克对于专心著述的无政府主义“教祖”克鲁包特金却非常客气，以他的《法国大革命》版税的名义资助克鲁包特金让他安心写作。实际上，广义的俄罗斯革命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先驱的，连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物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克鲁包特金的影响。列宁就高度称赞克鲁包特金的《法国大革命》是“至今为止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著中最好的作品”，“至少要印刷几十万册，在我国所有的图书馆里普及”(注2)。



在此书里，克鲁包特金(插图)强调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是废除了农奴制与专制政治，即使波旁王朝复辟，也不敢恢复旧制度。“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了二十三年，就是因为民众不能放弃革命的成果。所以，甚至在波旁王朝的白色恐怖时代，统治阶层也不敢去触动民众从封建领主那里夺回的土地。旧制度的复活已经不可能了”(426页)。

当然，革命的成果来之不易，而最大的阻挠却来自领导革命的国民议会(后改称国民公会、立法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成员。克鲁包特金猛烈抨击他们对革命的背叛与出卖：在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狱)之前，国王公然调集军队准备解散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却无动于衷，“民众已经站起来要彻底推翻王制，但议会对于哪一边能获胜没有把握，小心地避免支持任何一方。总的来说，议会对王制更怀好意，不追究路易



十六的犯罪，为了阻止暴露国王自身的犯罪连国王的共谋犯也不愿意追查”（222页）。

当国王收买米拉波等著名议员、招致奥地利雇佣军进攻巴黎准备杀害所有革命者的阴谋暴露后，国民议会仍然全力回避对国王的审判与判刑。在革命的高潮，国民议会判处国王的死刑时，有46%的议员反对。

“资产阶级的指导者们自从七月十四日和十月六日以来，脑袋里就一直没有放下他们所畏惧的民众起义这个“妖怪”，“面对革命的胜利、共和制的确立、封建特权的全面瓦解、要求进一步对富有阶层征收重税的民众，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更愿接受国王与外国雇佣军”，“连罗伯斯庇尔这样的激进派，也没有勇气要求国王退位，认为共和主义者这样的称呼是对自己的中伤”（182-183页）。

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是受尽封建特权压制的都市平民与地方农民。克鲁包特金高度评价农民起义：“为了废除封建特权、夺回自十七世纪以来被僧侣、世俗两界从农民部落掠夺去的共有地的农民起义，才是大革命的精髓、大革命的基础。资产阶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没有自1788年萌芽、1789年以后迅速展开的农民大起义，革命决不会进行的那么彻底”（85页）。

在巴黎，“打倒王制的，是被称为共同体 *commune* 的组织。八月十日以后，共同体成为革命的名符其实的核心、掌握实权。当共同体健在时，革命就充满活力。在全国各地的共同体中充满了革命的灵魂，没有这样的核心，法国大革命就不可能摧毁旧制度、击退德意志侵略军，不可能再生法国”（147页）。

支持共同体的是被称为部段 *section* 的民众自发组织，在此之上组成共同体。部段才是革命的发源处、是民众的活动据点。克鲁包特金称那些活跃在部段的民众为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他们“为革命献出身心、理解革命的意义、热爱革命、为革命在所不辞”。在法国的历史上，“无套裤汉”突然以事态发展的主体出现：“他们活跃在街头、出现在国民公会的傍听席，以怒吼、喝彩等推动议事日程。这是来自民众的直接呼声，不可能从资产阶级的舆论中产生出来。议员们和行政机构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握有最后的武器：起义”（268页）。

不用说资产阶级的政府，连激进的雅各宾派和罗伯斯庇尔都恐惧、压制部段的活动。部段的无政府主义者成为首要被迫害对象，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或被迫自杀。部段死了，共同体也亡了，革命也就停滞不前或趋于反动了。

克鲁包特金深情地称赞部段和共同体的精神领袖马拉：“比大多数革命者年长、富有经验、对民众深切热爱，比同时代人正确地理解革命的各个阶段、能预见下一步的发展，再没有别人能象他那样把握各种复杂



事件的相互联系”（335页）。可惜马拉被过早刺杀身亡（插图“马拉之死”）。

与马拉相比，罗伯斯庇尔“排斥一切财产平等化的诉求。他明知平等是革命摧毁封建制度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却害怕离开当时的统治势力，小心地避开那些为民众活动的人”（190页）。“八月十日之前，罗伯斯庇尔与所有雅各宾派，都宁愿支持国王与宫廷而不肯再次诉诸于民众革命的烈火”（191页）。

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革命已经成功、已经达到尽头，“只有罗伯斯庇尔才是建立强有力政府为革命闭幕的最理想人物”（408页）。由此，罗伯斯庇尔被资产阶级推上独裁者的地位，在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又把他们抛弃。

克鲁包特金对于在法国大革命中（1789年至1794年）涌现出来的近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民众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赋予极高的评价，以至于断言到十九世纪末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问的伪装”）等都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只注重财产、消费品平均的“共产主义本质”，无视伴随工业化社会到来的生产过程中的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关系。

无论如何，此书中确立起来的彻底民众史观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民众革命，包括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任何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民众运动，都是很好的启发。俄罗斯革命变为今天的结果，对于每一个真正的站在民众立场、本身也是民众一员的人都提出了许多必须回答的问题。我认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反省在于各种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不同潮流（有时候只是不同名称而已）的组织之间的互相理解与认识。只要是民众的利益奋斗牺牲，不管其本人愿意用“社会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称呼，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同情。

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革命的过程发展为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已经背离民众、革命就已经停止了。最近的特别是关于克朗斯塔起义的历史研究，非常清楚地表明：克朗斯塔起义的水兵们不仅是十月革命的直接参与的功臣，而且也是俄罗斯革命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的要求（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反对由“党”垄断一切，释放所有社会主义者等）完全符合苏维埃的精神，而直接镇压起义的托洛茨基和批准镇压的列宁在此事件的处理上都是有罪的（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把镇压的责任推到“契卡”头目捷尔任斯基的头上）。而参与镇压的布尔什维克官僚，以托洛茨基为首，后来几乎都遭到斯大林的肃清（注3）。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事件就判断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但列宁，特别是托洛茨

基，也必须对他们竭力反对或殊死反对的斯大林体制的形成负一定责任。

今天，那些能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人，甚至一些赞同斯大林主义、毛主义的活动分子，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难得了。但这并不能作为自己的免罪符，而反思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基于事实认识那些自己认同的潮流中的过失，是一个最不容易、也是最需要实行的起点。当我们终于认识到以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程为顶点和象征的所有苏联、中国官方教材都是为统治当局服务的偏离民众史观的工具时，克鲁包特金的这本《法国大革命》就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基本教材。

注 1：1985 年，身为法共党员的索绪尔曾在北京大学访问讲学，我有幸听讲，对于他细致地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民众心理的手法留下了深刻印象。

注 2：以下关于此书的引用直接来于菊池里志发表在《海燕》周刊 1998 年 9 月 6 日第 692 号的书评，所引页数是淡德三郎翻译的日文版(新人物往来社，1971 年出版)的页数。

注 3：关于这一次起义，最重要的一份文献 Ida Mett, *The Kronstadt Uprising 1921*，最近可从万维网 <http://www.cs.utah.edu/~galt/kuprise.html> 上阅读。关于十月革命以后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自治的另一份重要文献 Maurice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1917-1921*，也可从万维网 <http://www.geocities.com/WestHollywood/2163/bolintro.html> 上阅读。

[香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5/6 期]

### 3. 我理解的门诺教派以及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神学政治

二〇〇三年春季，“再生基督徒”（注1）小布什发动的侵略伊拉克战争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也加深了基督教社会的危机。在“9·11”之后“上帝保佑美国”的宗教狂热气氛中，除 Quaker（注2）、Jehovah's Witnesses（耶和华的证人）等少数教派外，绝大多数基督教组织都被误导到政府的战争行径中。具有传统和平主义倾向的再洗礼派 Mennonite 门诺教派也处于动摇之中。

我在门诺教派的月刊《基督徒领导者》发表文章抨击小布什当局的战争政策并呼吁美国的教徒们站出来把威胁人类生存的世界超级军事强权转换为和平的保护者。月刊的编辑们登载了两篇典型的读者来信，一个美国的男教徒表示反感我这个外国人对美国政府说三道四（我所属的教会也有人问我：“难道我们还得让恐怖分子第二次袭击？”），另一个加拿大的女教友则完全赞同我的尖锐提问。但我心慰地读到更多的门诺教派基督徒如下的布白：“当我拿起报纸或从网上浏览时事新闻，我感到这个世界快要爆炸了。这种持续的紧张迫使我每天都面对如何生活的问题。我的忠诚心随时都受到挑战。我的内心挣扎把我带到这样的结论：今天，我的忠诚不再属于任何国度、任何先祖、任何旗子或任何公开告解。我只知道上帝爱世界、耶稣为众人死去的平安消息。”（注3）

我知道时机已经确定，是对自己十一年基督教体验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在二〇〇三年夏天，我专门赶到圣荷西的 Lincoln Glen 教会，深切感谢门诺教派自从我在日本大阪接受洗礼以来对我在精神上和在世俗上的帮助，并表明自己不再自称是一个基督徒。教会的主牧师 Reimer 博士年近七旬，来自加拿大，阅历广泛、精神宽宏，很理解我的决定。主持日常事务的副牧师 Eldridge 女士也和蔼可亲地为我祈祷。另一位年长的教友虽然掩饰不住失望，也不忘提及另一位曾经接受过门诺教派非暴力体验 fellowship 却因为文化、政治背景不同而分别的印度朋友（甘地）。与甘地类似，与其说出于个人得救的动机，我更主要是怀着寻求社会解救的愿望学习、研究基督教，我很幸运自己充满着祝福完成了十一年的思想体验。

虽然再洗礼的思想（婴儿没有理解能力，故必须在成人后才能受洗）现在已经成为基督教普遍接受的常识，但只有门诺教派（包括较早分裂出去的 Amish 阿米西教派）、Hutterite 哈特爾教派和 Swiss Brethren 瑞士兄弟会仍然存在并保持有自己的历史记录。其中，“瑞士兄弟会”更像是一个方便的称呼形容而仍在瑞士活动的、从追随 Zwingli 的教徒中分离出来的再洗礼派。他们既没有一个如门诺或哈特爾那样的教派领袖，也没有从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同体生活，又向政府交付战争税，被哈特爾

教派等瞧不起。不过，作为宗教改革最活跃的中心并以加尔文集大成，瑞士从再洗礼派继承的最大政治遗产是尽量回避世俗的利益之争。所以瑞士在保持独立的同时，能够保持中立地位，幸免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灾难。当联合国也成为国际政治角逐的牺牲品时，没有加入联合国的瑞士反而成为美苏会谈、国际裁军会议、联合国科教文机构、甚至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世界政治的中心论坛舞台。

从人口统计上可以看出哈特教派的历史(注4)。从1528年开始，此教派在1600年前在Moravia摩拉维亚(今奥地利境内)从事共同体生活的人数曾经达到两万人。在遭到迫害被解散后，有近三千教徒于1622年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开始生活，到1690至1762年期间，很象许多别的再洗礼派，哈特教派又被迫解散，已经没有一个共同体了。不过，有一些教徒在罗马尼亚又开始聚集，建立共同体，并移民到相对平安的俄罗斯境内南部，在1819-1859年期间曾寄居于那里较大的门诺教派社区中。从1874年开始，为了逃避强制征兵和公共俄语教育，哈特教派开始向北美移民，主要定居在美国的南达科达州(以便在战争时逃离美国)和邻近的加拿大Alberta省，今天约有四万多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仍然以德语为主的封闭共同体教徒成为美国公众攻击的靶子，有两个年轻男子因为拒服兵役被征兵的官兵活活虐待至死。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与其关心向外界的传道，他们更象修建方舟的诺亚家族一样专注于自身共同体的生活、随时准备上帝的降临。在这一点上，与被外界传为“拒绝使用电力”的阿米西教派相似(注5)。

当然，再洗礼派的和平主义政治定位主要是由其最大的继承者门诺教派展示出来的。门诺教派的历史就是再洗礼派作为和平教会坚持、发展“非暴力、非抵抗”的历史，它的主要历史记载虽然沿着荷兰与瑞士——俄罗斯——北美的线索，但今天其最密集的信徒却是在战乱不堪的刚果。与别的“与世隔离”的再洗礼派不同，门诺教派积极地在世界各地展开人道援助，也好意地报道其教友在刚果等地的竞选(乌拉圭现任总统的妻子也是门诺教徒)。我本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参加声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民主运动遭到中国和日本当局的刁难，如果没有门诺教会以及别的日本兄弟姐妹的支持，很可能被迫放弃学业尽早逃离日本。日本政府虽然在1989年巴黎的西方七国首脑声明中也签署宣言“保护中国留学生”，其文部省大臣在国会答辩中也声称“已经采取措施从奖学金和签证方面支援中国留学生”，作为唯一被取消奖学金的中国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至今北京方面拒绝提示理由)，当我向所在的国立大阪大学当局寻求帮助时却被告知：“谁不知道那些国际宣言和国会答辩都是谎言？我们没有得到通知要帮助你这样的情况！”。臭名昭著的出入国管理局因为我没有办法提出由中国政府出具的奖学金和“人身担保”，拒

绝延长我的签证。对于卑鄙的日本政府而言，任何没有力量强制其执行的国际公约都是废纸而已。这成为我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一课。我记得自己当时闪出的念头是：“难道自己放弃清华的核物理专业、到日本来学习社会发展，错了？”。我的指导教授警告我：如果你不能从出入国管理局拿到留学生签证，校方准备以“无完成学业希望”为理由拒绝我继续学习。那时候，有个绝望的中国留学生以“血光敢死队”的名义写信给NHK(日本公共播放协会)电视台，威胁要“每月杀死一名日本人”。

这时，门诺教会的木下老人作为我的“担保人”带着他的生意收入证明等材料陪我去出入国管理局。日本当局看见有日本公民出面为我“担保”，才没有再刁难我。当我向木下老人道谢时，他要我一同感谢耶稣。我虽然自“六·四”以来由松尾夫妇介绍去门诺教会，却一直没有信教，这时，我知道我再不可能是无神论者了。这也是门诺教派几百年的和平主义历史上在日本传教期间的一个普通情节。实际上，德国血统的教会牧师Friesen博士夫妇就是战后由美国的门诺教派派往日本传教的，他们后来帮助我们举办婚礼(日本和中国当局都拒绝为我们开具结婚证明，丧失基本的政府职能)，并帮助我们逃到美国安顿下来。

与马丁·路德类似，荷兰人门诺·西门(1496-1561)曾是天主教牧师。他在40岁时因为其兄弟坚持再洗礼派被处死才抛弃罗马的权威，转入地下传播再洗礼教义。与许多成年后转信再洗礼派的教徒一样，我也很为如下的典型例子感动：一个再洗礼派信徒深夜逃出牢房，一个天主教狱卒在后追捕，但狱卒不小心跌入深沟，再洗礼派信徒返回救起狱卒，狱卒把再洗礼派信徒重新抓回牢房，再洗礼派信徒被处死后，狱卒转信再洗礼派。据记载，哈特尔派最有教养的领导人Onophrius在牢狱和赴刑中的高尚、坚定表现感动了从下到上的迫害者：刽子手们在雨季尽心准备最干的木柴以使火刑最快结束，刑警队长要求主子改为更快的斩首刑，未遂后自己也逃到摩拉维亚加入哈特尔教派，连疯狂执行宗教迫害的费尔南德王子的监护人也“举起双手向天起誓，从此以后再也不迫害再洗礼派的兄弟们”(注6)。



门诺教派(插图为其标志)在美、加主要居住在农业地区，但并没有采取哈特尔教派那样自成一体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方式，他们的“非暴力、非抵抗”传统比较容易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极少数受到主流社会影响的青年应征入伍，但被告诫不要直接介入战斗，更多的人则参加政府专门组织的社区服务，在诸如“男性护理”领域建立开拓性的工作。当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认同政府的战争政策时(罗斯福在国会两院讲演中要求对日宣战时，只有蒙太拿州的女性议员反对)，门诺教派的“非暴力”(不参加战争)、“非抵抗”(不反对政府)和

平主义与美国政府相对“和谐”，从某种意义上帮助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制订国内政策应付和平主义和反战主义者(如贵格教派)。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门诺教派的年轻一代在校园中接受与大众相同的公共教育课程(注7)，在美国主流社会本身存在着强大的反战浪潮的情况下，就会分化门诺教派。越战期间，门诺教派主办的学院中出现的反战抗议就让门诺教派领导层感到担忧(注8)而不是振奋。今天的情况更令人担忧。有一次我与一位德高望重的南方门诺教派牧师交谈，他竟然为小布什的战争政策辩护，在提及被美军残杀的无辜阿拉伯民众时，以“耶稣为他们在天堂安排”来解脱。我出于礼节，没有说出：“那么，阿拉是否为那些在世界贸易大楼里丧生的基督徒超生呢？”在美国的主流基督教社会政治上普遍腐败、把上帝褻渎为所谓美国“国家利益”的保护神的环境中，不得不随波逐流的门诺教派也经历了结构性转化，不再是中世纪黑暗宗教时代的再洗礼派希望之星了！以我的浅显的基督教知识和体验，与其耗费精力留在门诺教派中争论“恢复”再洗礼派的反抗当政腐败的传统，留在基督教社会中寻找创义人的蔑视世俗权力的原始动力，我更认同在大学期间影响我人生的斯宾诺莎的自然神学政治观。

实际上，再洗礼派的起源并不是单纯的神学教义之争，也不是逆来顺受的非暴力、非抵抗主义，而是发源于早期宗教改革和德意志农民战争的革命潮流。而最早指出这种关系的不是尽力回避暴力的门诺学派等再洗礼派的记录，而是他们的敌人。因为正是那些农民战争最激烈、持久的地区才是再洗礼派最频繁、集中的场所，那些同时镇压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政府和地主知道起义者和异端者是一回事。农民领袖 Gaismair 之所以影响浩大并被当局深恨，正是因为他同时也“传播伪造的基督教自由”，他要求“所有财物共有，废除所有权威”，在其“区域条令”第六条中特别引用《圣经》章节作为神圣使令销毁所有教会的“圣品”(奖章等)。而曾经干过工匠并携带枪支的哈特尔则直截了当地教导说：“再洗礼派之所以受到迫害，是因为如果真实的基督教得以传播，皇帝、国王和地主们害怕他们会越来越威信扫地、一钱不值。”哈特尔的妻子更直截了当地说：所有圣坛仪式，包括圣婴洗礼，都是牧师的发明以骗取钱财。所以，毫不奇怪，在再洗礼派活跃于今奥地利西部、意大利以北 South Tyrol 地区(注9)的1527-29年，没有发现任何和平主义的文件。哈特尔最后带领一千名信徒(包括三百名孩童)被当局驱赶，走投无路，也宁死不屈，在至州长的信中以“摩拉维亚的地主老爷们，愿你们这些三重仇敌永世下地狱去！”开首，哪里是一个和平主义教派的创始人？完全是农民起义首领的口吻。怪不得费尔南德王子的律令第十七条规定：“凡是传播财物公有的人都得被砍头”。正如敌视德意志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的早期御用历史学者 Josef Jäkel 所断言：叛乱农民

是社会渣滓，再洗礼派就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印证克鲁包特金所说“如果耶稣在世，他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如果说，历史上的再洗礼派在德意志农民战争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以个人内心宗教自由的旗帜点燃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火炬，并以和平主义的信条影响、教育了国际政治的进程，今天，在美国霸权主义侵略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复燃以及中国的政治专制这些黑暗势力相互勾结利用、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国际环境中，人类再一次呼唤再洗礼派那样的基于每一个个体良知而抗争、生活的广泛社会运动。

注1：据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解释，他在竞选时说自己是“born-again”基督徒，只是指“洗礼后再生”，但现在的“born-again 基督徒”却声称自己可以与上帝沟通，似乎自己是“再生基督”。见 Jimmy Carter, *Our Endangered Values: America's Moral Crisis*, Simon & Schuster, 2005. 他们崇拜的上帝是很廉价的。例如，上一世纪最有势力的传教士 Billy Graham 在其自传 *Just as I am* (HarperSanFrancisco & Zondervan, 1997) 中就很炫耀“每一个美国总统都要有我的祝福”。

注2：Quaker(有中文译为“贵格”)教派在平时主要通过 Friends(教友)或 Friends of Reconciliation(和解之友)活动。在硅谷很活跃的圣和西和平中心即附属于“教友”。在战时，“教友”成为全美的反战中心之一。他们奉行“非暴力(但)抵抗”主义。圣荷西和平中心的月刊 *Peace Times* 上甚至介绍如何“非法”地拒绝缴纳联邦税中用于战争的部分。与那些冲入军事设施的抗议者一样，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别的人都是“合法”地偷税、漏税。

注3：Steve Goossen, “Making peace with God's call to love the world”, *Christian Leader*, January 2004.

注4：John Hostetler, *Hutterite Socie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8018-5639-6. 第291页图6。本文写作中关于哈特尔教派主要参考此书和注6的书。

注5：阿米西教派现在也不拒绝发达科技。我过去在 Adobe Systems 公司任职时，曾有一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同事来自阿米西教派家庭，后来辞职回阿米西教区开电脑咨询公司。前不久在北卡州发生的校园枪杀案中，阿米西教派孩童自告担当人质，英勇就义，显现再洗礼派先祖遗风。后来该家庭收到许多捐款。

注6：Werner Packull, *Hutterite Beginning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8018-6256-6. 第271-272页。

注7：哈特尔教派共同体社区中的公共教育主要是为了学习“第二语言”英语。而门诺教派战后出生的人已经不会讲德语了。



注 8：本文中一些观察在我的英文稿 Jing Zhao, Political Theology of American Mennonite Pacifism,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nnonite.html> 中已经有所表述，并参考以下书籍：Perry Bush, Two Kingdoms, Two Loyalties: Mennonite Pacifism in Moder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1998.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W.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3.

注 9：从诸如以下的地图可以参考当时的宗教分布：

[http:](http://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shepherd/central_europe_relig_1923.jpg)

[//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shepherd/central\\_europe\\_relig\\_1923.jpg](http://www.lib.utexas.edu/maps/historical/shepherd/central_europe_relig_1923.jpg)

[2007 年 2 月 28 日 美国圣拉蒙]

#### 4. 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

热爱人类，反抗制度——巴枯宁

制度(组织形态)是构成人类生活的社会本质——笔者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正当孪生宠儿的话，无政府主义最多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与两位嫡生幸运儿同源却不同宗。无论是痛恨沙皇的宪兵、专制开明的君主，以及共和国的警察，还是哀叹侧翼的排挤、暗算，无政府主义的命运，正如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对孟什维克派的攻击一样：“非常遗憾，诸位已经被历史遗忘，你们的命运可悲，你们的作用已经完成，你们将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当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被自身创建的共产主义政府流放到国外，七十年前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重新在俄国取代共产主义极权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复兴呢？

一九七〇年，詹姆斯·焦尔 James Joll 在其所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日文版序言中论述到：“一九六四年，此书的英文版刚发行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已经从现实的关心变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了。随着西班牙共和国的灭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衰退，无政府主义只存在于法国、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流亡者，或者纽约、巴黎、伦敦等大都市的少数固执知识分子当中了。然而，近年来我们又看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实践，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现象，特别在学生运动(日本也不例外)中，有令人注意的复活。这些新的革命运动，不一定明确地依存于无政府主义，有些运动明确地拒绝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含有许多与本书中所阐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方法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是指由蒲鲁东所表述出来的，地方分权与劳动者自治的原理。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关于中国政体的联邦制设想顺应了这种要求。“而且，这些运动的意义，并不只是就无政府主义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全权主义的批判，而且就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产业社会的批判，也是仍然有效的。无政府主义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的、最有活力的激进思潮之一，至今为我们提供着新的启示。”这一点，当然不只是针对欧洲、北美，也对南美、亚洲具有相同意义的。

在《序论》中焦尔进一步发挥道：“与其它的少数派一样，无政府主义者是那些患成功崇拜症的历史学家的受害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一次革命，他们的政治理论充满了理论的欠缺、错误的前提。有一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教义为人们带来了情绪上的共感，却轻易

被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典型的冷酷、毫无意义的暴力、恐怖行为的行动特征一笔勾销。但是，过去一百年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对产业社会的性质提出许多疑问，他们对近代国家的概念不断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对几乎所有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前提不断提出挑战。他们常常诉诸于非常粗暴、直接的手段，攻击既成社会、道德秩序的内在价值和制度，这些攻击，无论喜剧还是悲哀，都归于流产。但是，无政府主义运动迸发出来的抗议，是隐藏于人类心理底层的欲求，虽然它不构成重要的政治、社会势力，只不过是一连串的挫折，但这种欲求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从人心中消去。”

无政府主义的这种人性欲求当然是存在于人类发源之始的，但我们可以把其明白地表述追溯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影响下的内心胎动，最早由法国的乡村牧师梅叶以《遗书》的形式表露出来，这当然是合理主义对上帝权威的异端，作者明确喊出：个人的东西归个人，不要交付给任何形式的异己（教会、君王）。而卢梭则以自然和教育对现存制度的抨击成为无政府主义思潮写作方式的最大代表。在内容上比卢梭更完备地提出无政府主义学说的是英国的葛德文，他在《政治正义论》中，从两方面对社会制度提出幻想：（1）教育个人，使个人的幸福建立在对道德的追求上，从而使社会变得完善起来；（2）“政治制度的唯一正当的对象是个人利益”。政府不能持有以下两个以外的正当目的：社会内部解除对于个人利益的不正压抑，对外共同防御外敌的入侵。在此同时，马布里明确提出废除私有财产以达到人的平等，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伴随着强大国家建立起来的权力对人类生活的桎梏。

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却是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神话破灭的产物，目睹了当世的政治革命、宪法改革的失败，产生了对旧有的所有革命方法和目标的攻击理由和机会。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从十九世纪至今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越来越高度的中央集权、越来越发达的产业国家。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宿命就是不断反抗所有热衷于权力追逐的社会集团：从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就是旧有的宗教信条与新兴的合理哲学冲突的产物，其最大的理论代表就是“启蒙主义的私生子”蒲鲁东。

为了给最贫困、最大多数的阶级找到改善其物质、精神、道德状态的方法，而且是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蒲鲁东本能地反感近代社会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发展，这就是他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认为他们所设计的“新社会组织化”不过是既成要素的再排列，把权力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完全没有意义，特别不能相信那些财产共同所有、由中央政府强制管理劳动的共

同体乌托邦。作为人的第一要素的劳动，只能由各自的劳动合作来自治管理，在排除政府干涉这一点上，蒲鲁东承认亚当·斯密是他的老师。

但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最大代表在理论上的漏洞立即被当时还不太有名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严密、独断的黑格尔哲学思辨所驳难。当时的发展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运动领袖的时候，从俄国逃出来的巴枯宁就应运而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合流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上。

在第一国际中还有一位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英维马志尼也很有影响，《牛虻》的主人就是被描写成受马志尼的指派，押送弹药进山而被捕就义的。马志尼对国际性的工人运动缺乏民族斗争的知识和热情，当巴黎公社成立时，他反对这个运动而最终失去了对第一国际的影响。如果说第二国际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告终结的话，第一国际就是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分裂而告终的。尽管在这两人的追随者间掺杂着不少个人的争权夺利，但他们两个人都明白彼此之间的原则差异决不可能弥合。今天看来，他们的差异有两层含义：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上看，马克思是英明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只会堕落成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人类社会的恐怖集团（甚至黑手党也被警察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者）；从社会哲学的理念来看，巴枯宁坚决反对以权威主义的政党形态创建自由社会的企图，“我唾弃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自由，剥夺自由的东西决不是人性的东西，共产主义把社会的所有权力都集中起来，必然会在国家的权力下把财富也集中起来。我则希求国家的废止，彻底扑灭权威的原理和国家的教化。国家在把人道德化、文明化的借口下，压抑、榨取人，使人奴化、堕落下去。”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对全权主义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警告是多么英明！

恩格斯稍后正确地论述到：“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以下认识上是一致的：社会革命到来之际，政治国家以及与其相随的政治权威的消亡、即公共机能丧失政治的性格、变为单纯的监视社会利益的行政机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在权威主义的政治国家的成立条件还没有消除之际，要求一举废除这些社会条件，即革命的序幕就是废除权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乌托邦贫血症！“废除权威”本身就要求人类最大的权威！那么马克思先生确实实际一些：由一个能够废除自身权威的阶级——无产阶级，来废除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巴枯宁的指责很准确：马克思所幻想的无产阶级是哲学思辨和经济学推理的产物，蒲鲁东则生活在现实的无产阶级之间，深知他们自身的弱点不足以担负起这个废除权威再自我废除权威的历史使命。可笑的是，列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怎么办》中又把“灌输”知识给无产阶级的使命交到知识分子的“先知”

（如马克思和他本人）身上，背离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期待，彷彿回到其俄国同胞巴枯宁的立场上了。

无政府主义与政治权力最近的关系发生在西班牙，那里的口号一直是：“我们要求废除资本的支配、国家的支配、教会的支配，在此废墟之上，建立起无政府状态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但我们知道：西班牙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社会基础，乃是其从宗教改革、产业革命以来被时代遗弃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佛朗哥的独裁政权的产生。由此我们再次确认：无政府主义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以反政治来从事政治的企图必将彻底失败，虽然其回光也曾反照于中国大地上。无政府主义只是作为各次社会运动中的一种成分才永远存在于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市民运动、学生运动中。

应该说，十月革命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派、孟什维克派，以及各类隐蔽的、公开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权威遭到了最大的威胁。但人除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欲求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欲求：面包，而面包必须在秩序、权威中产生。更引申地看：人类，由于欲求面包而产生的服从，向往权威的性格，已经变成人性中不可分的最大特征。所以，毛泽东去世后，《人民日报》连篇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共产党政府生怕无政府主义在人民当中漫延扩散。也正是民众需要权威的国民性产生了要把权威强加在国民头上的各类政治闹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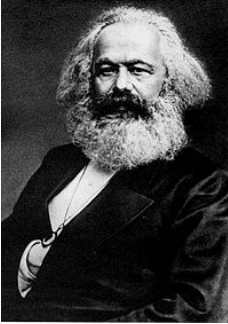
从共产主义全权形态中表露出来的对权力的服从只是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侧面。从产业社会以来，不断涌现出对近代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礼赞：洛克、黑格尔、孟德斯鸠、韦伯，一直到当今的帕森斯，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使国家机器更加权威、合理、精密、机能充实。但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却远离了“三权分立”提倡者们的理想。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日本，行政权即政府统治个人的权力高居于立法、司法权力之上，靠立法权来制衡行政权力、特别是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压抑的期待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压榨，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通过分配领域对国民的剥削，其共同实质都是通过国家的强权来实现的。

个人在这种暴力之下越来越无能为力，只能采取屈服、盲从、欺骗、出卖人格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这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表露得最清楚：国家权力、即镇压之权（林彪的这句名言倒是个真理）非常强大，它拥有摧毁人类的能力，它供养了一大批国家“公仆”，靠国家的名义寄生国家的腐蚀越深，被腐蚀越深的国家更加深了对个人的支配。从最大的官僚到最没有权力的平民，都被国家政权这个撒旦治服得没有一丝反抗余地，只好以最卑劣、可怜的方式逃避国家的强权。这就是现代社会中

“异化”的本质，叔本华、尼采、施本格勒敏感地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虚无意识的克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最大课题。如果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政治权力的变革上力图反抗这种异化的尝试以有价值的失败告终了的话，从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希望的曙光：从个人的知性、人格的改进着手的、基于个体、团体之间自由联合的社会改进运动兴许是解消不必要的政治权威支配的必由之路。

[东京【民主中国】1991年11月]

## 5.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



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的Niebyl-Proctor 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 Ann Robertson 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是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 Robertson 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我们松散的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达成的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 Robertson 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注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门徒，都对虚伪的基督教等宗教毫不留情。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

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注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这些国家的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注3）。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注4）。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注5），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注6），加上力图统一意大利的传奇英雄马志尼（伏契尼著名小说《牛虻》的主人公就是为马志尼押送弹药而被捕牺牲的）等，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



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 1868 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注 7）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 1872 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 65 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 19 名与总委员会的 21 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 25 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注 8）。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民族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为了窄狭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漫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注 9），与“专

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注10），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里，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注11），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注12）。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废除边界”、“废除常备军”、“全民就业”、“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注1: Ann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 vs Bakunin Confli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3 issue of *WahtNext*?

注2: 巴枯宁1850年在监狱中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过96页长的“悔过书”，成为马克思等对手攻击的把柄。这很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蒙混过关的“自我检查”，其中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十年来在德国等欧洲的经历，试图说服沙皇改革。例如：“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在俄国状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劣等；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

好、更亲切、更具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共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和自尊，而俄罗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语气，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在监狱里写的这类材料。见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47.

注 3: 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xiii and p.136. Paris, 1928. Reprinted by AK Press, Oakland, 2003.

注 4: 我目前订阅的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 经常评述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权力 (包括古巴, 甚至委内瑞拉) 的霸道行为, 并追踪到当年马克思分裂“国际”的“原罪”。

注 5: 列宁主义者喜欢解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 (即俄国的“契卡”那样的超越法规的秘密警察)。其实, 在公社成员中有不少巴贝夫和布朗基的追随者, 相当于巴黎公社的“先锋队”。正如巴枯宁指出的, 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地方都没有起义或抵抗普鲁士军队, 巴黎公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雄悲剧史诗。

注 6: 后来有所谓第二 (社会民主主义) 国际、第三 (共产) 国际、第四 (托洛茨基) 国际继承“国际”而把“国际”称为“第一国际”, 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 已经抛弃了“国际”的部分基本原则。

注 7: 引自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01. 原文引自法文 1868 年 9 月 23 日。

注 8: 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p.266-267.

注 9: 克鲁包特金作为一个科学家 (地质学和社会学), 获得英美知识界主流的承认 (如两次获邀到美国讲学), 被誉为“最高贵的安那祺主义王子”。后来, 他回到布尔什维克专政下的俄国。列宁为了利用他的国际名声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 给予他象晚年的托尔斯泰在沙皇统治下那样的优待。见 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 Prince: Peter Kropotki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其实, 他对英美战争政策的错误判断, 由他最出色的学生古尔德曼和柏克曼早就指出了, 但他听不进去。见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注 10: 以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 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 很难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些很教条的组织, 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 依然在固守马克思的教义, 但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影响。见笔者的介绍: “我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

（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

<http://cpri.tripod.com/cpr9697/iso.html>，“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印象”<http://cpri.tripod.com/cpr1999/slparticle.html>等。

注 11：美国社会主义老战士 Bookchin 是一个很好的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向安那祺主义转变的典型例子。他 30 年代大萧条时 9 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不断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论战，被现实转化。他甚至断言，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二战以后，也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见 Murray Bookchin, “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AK Press, Oakland, 1999. 同时，我们知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是安那祺主义者。瞿秋白在临死前承认他还信仰国家的消亡，但对为什么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个理想感到怀疑，由此否定自己的政治生涯。

注 12：希特勒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 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潮流之一的共产党攻击其“兄弟”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安那祺主义者本身也有不少称号，克鲁包特金称自己为“共产安那祺主义者”，强调经济（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平等；巴枯宁则厌恶“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这联想到政治上的强制，他更宁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按照杜尔凯姆的研究，共产主义本来是古希腊概念，远早于近代国家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则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列宁的一党专制实践使得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阅读各类政治刊物，从这些用语中就可以判断其各种立场。

[2008年8月19日 美国圣拉蒙]

## 6. 跨越世纪的会晤

——一个幽灵正弥漫在欧亚大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赵京：尊敬的巴枯宁先生，您不会因为我的姗姗来迟而介意吧！

巴枯宁：欢迎，欢迎，来自遥远的朋友！我已经等了您一个多世纪了，不过，我并不希望您来去匆忙而没能领会我的想法——当然，也有一些聪明人是故意扭曲了我的思想。你看，人类的认识过程都是可逆倒推的：在邓小平时代认识毛泽东的中国，在戈尔巴乔夫的“重建”中认识斯大林、列宁。今天，当我的祖国土地上解体了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度后，我们才可能全面地审视马克思了。

赵京：从这种意义上，您无疑可被称为人类的导师之一。当这个世纪的历史与您的倡导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人类的悲剧远远超过了个人的荣辱。直到八九年，才从天安门广场上传出了反抗近代国家形态的发自人类心灵深处的最强音——无政府主义，并一直导引着东德的消亡、苏联的解体和欧洲共同体的统合。令我焦急不安的是它在中国的扩散现实和可能的后果。

巴枯宁：回顾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我个人的许多不负责任的政治活动，我特别想指出以下的区分是重要的：哪些是思想上的不合理，哪些是实践上的幼稚或愚蠢。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反抗近代产业社会中的国家强权形态的无政府主义经历了重大的失败，但在天安门广场、在红场等地点的民众抗议中表露出来的理想却是永远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之中的。应该反省，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找到一种消灭了人支配人权力构造的组织形态来进行社会生活。唉，世界永远是罗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苦笑)！

赵京：是呀！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全权社会形态之中，倒容易对社会民主主义感兴趣。人类兴许配不上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你看：那些反抗中国政府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却必须倒向另一个更大的政府强权寻求庇护。可怜的人类，连一个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产生不出来啦！

巴枯宁：“人追求自由，却又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最早道出了对近代社会的哲学悲观。实际上，以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可以认为近代世界历史的激荡都是由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再建引发的。以民族(语言、文化)为背景建立起政治目的的国家，本来只应该防御外侵、为国民提供福利，却往往变为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少数统治阶层的权力机构。苏联政府就是最典型的国家权力，戈尔巴乔夫的“重建”国家权力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赵京：这兴许是无政府主义能够提供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了。对于中国这样的全权主义社会，所谓改革的目标不是以新的权力形态去取代旧的体制，而是首先向政府强权夺回那些属于个人权利的东西。实际上，所谓的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越来越重视人权的意义，连中国政府也变得聪明了一些，发布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供中国国民监督、批判政府的强权膨胀。

巴枯宁：这也是中国政府比苏联政府高明之处。我个人认为中国并不可能像苏联那样消亡，因为中国社会的全权主义形态并不如苏联那样强制，特别表现在经济利益的分配形态上。可惜人类常常忘记，或者说不愿意正视历史。你看：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经济上采取前资本主义的压榨方式，使马布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是万罪之源，而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公正政府。但葛德文却警告我们：不可能存在公正的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政府，永远是一部分人压榨另一部分人的机器。

赵京：兴许，共产主义思潮中不少人总是不知不觉地把基督教中的理想王国硬搬到现实中来，才造成了忽视社会大前提之下的哲学思辨。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高明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剥削关系，却完全没有想象一下全权社会形态下人支配人的赤裸裸的强权现实，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还要空想。象欧文、圣西门这些人，对于近代科学、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经营形态、政府组织性质的变革，都比坐在大英博物馆中研究现成文献的马克思的认识深刻。

巴枯宁：可惜，我们这些投身实际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如马克思那样博学，那样有号召力。我自己也感情用事，由于不认为《资本论》有马克思自称的价值，我干脆拒绝接受马克思的献辞。不过，我确也苦心地劝过马克思，你把个人的私有财产抽个精光(听说你们那里处决人还需要死者付钱)，还谈得上甚么“个人自由”、“个人的全面发展”呢？他又搬出“万能的教育”来搪塞。问题在于，是教育一个富人掏点钱出来容易呢，还是教育掌权者交出一些权力来容易呢？洛克菲勒、松下幸之助很“慷慨”地退还了不少财富给社会，斯大林会交出本来属于国民的权力吗？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还声称他是“国家总统”呢！

赵京：哈哈，财产在阴间不通用，权力关系却是永恒的！再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敢想象“共权主义”的天堂，所以干脆大家都把权力交给上帝，才算最大的公平和正义。上帝当然不需要教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接受教育只想教育人类，最终只能把人类的发展导入歧途。不过，我有点不理解，当时马克思是如何思考消亡国家这一重大课题的。

巴枯宁：共产主义消亡国家的途径是消灭所有的反对势力，不管它叫地主、资本家，还是持不同政见者，其结果当然是激发更强烈的反抗，

直到——你看，叶利钦的出现。我很气愤你们中国人把 Anarchism 翻译为“无政府主义”，常常给你们中国人带来误解。我们反对近代出现的人支配人的国家权力形态，却并没有要消亡国家，也不想废除政府，我甚至根本反感以政党的集权方式对抗政府、推翻政府的企图。

赵京：“无政府主义”这个名词确实翻译得太糟了，一下子就被判了死刑。我这样的人虽然与 Anarchism 很有共感，也绝不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这个名词首先是日本人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先把它译为“安那祺主义”，挺美妙的吧！可它能达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目的吗？今天日本的学术界都改用中性片假名发音，但我们中国人恐怕永远也只用“无政府主义”这个词了。不瞒您说，我的同胞常常连概念都没弄懂就开始了带有功利性质的理论争吵。既使对于“人权”这样的概念，你问两个人，肯定会得到三种解释。书归正传，您不是也想过建立“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政府吗？您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厅干甚么？

巴枯宁：好汉不提当年勇。那是恨铁不成钢，并不是仇视国家机构。市政厅的权力并不大，我们以为一举摧毁权力机构，废除了税务、警察，希望获得解放的市民们自行组成松散的、基于个人愿望的自由结合体。可悲的是人们也需要权威和支配，还是韦伯正确：越进入近代社会，官厅机构的庞大、复杂化越不可避免，人类生活需要各种政府的机能。为了使这些机能的强化不加深对人的支配，我们又看到甚么蒲鲁东的“法朗结”，英国的费边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总之，诉诸于广泛的社会改进运动来减轻政府的非法支配，如近来很受人瞩目的“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组织所做的那样。

赵京：至于国际性的人权活动，部分带有对于过去殖民政策的反省性质，没有反省侵略政策历史的日本政府不懂人权的概念，只愿意与外国政府打交道而无视外国公民的人权，变相鼓励专制政府强权的非正常膨胀。我们看中国的政府机能，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同时，一个持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普通公民连去菲律宾这样的国度都需要菲律宾人的“担保”，更不用说生活在“有钱人”的日本的国土上，简直像一个小偷！

巴枯宁：我真为你们中国抱不平！当年日本人在台湾、在“满洲国”，在南京杀人时持的是甚么样的护照和签证呢？那些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残留孤儿”持有甚么护照和签证呢？你们真是伟大的民族，还把他们收养为亲生的儿子。真痛心，我的同胞们也像日本人一样，对你们犯下过不可宽恕的罪行。好在上帝会还历史以公正的，今天中国的变革里正孕育着人类进步的新的期待。

赵京：可惜中国人是权力(关系)崇拜的民族。例如“六四”终结了一个有限改革的时代，但那些蒙取民众支持、在权力边缘生活过的“改革派”至今没有人反省，并承担对民族犯下的罪过。而普通民众面对强大的国家机构只剩逃避一途，国民意识越来越虚无化(Nihilism)。

巴枯宁：近代国家的形成首先需要一种精神，苏联国家可以解体，但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却是永存的！虽然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世界精神财富的贡献不如你们的先祖，但我坚信，中国的民众会创造出迎接现代化的新的理念形态的。朋友，我真羡慕你生于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和国度里，中国的未来也是世界的未来！

赵京：您这样说，只是加重了我们的惭愧。在一个灵魂僵死、外壳膨胀的政府机体下，正发生着人类可能干出的各种卑鄙行径，却只是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生存功利。所以，我们举起了知性与人格这两面旗帜来对八九中国之春进行最彻底的继承，在没有人敢于宣称解救中国的危难之际，我们找到了通过改进个人的知性与人格的道路来推进社会全体的进步。

巴枯宁：这也是对无政府主义发出的警告的一种响应吧！请牢记这一点：任何一个声明解救社会的运动都要避免自身的组织性的权力关系，否则就会导致出卖和灭亡。无论是八九中国之春，还是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不是被镇压下去的(根本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镇压它们！)，而是被出卖葬送掉的。戈尔巴乔夫下令降下苏维埃联邦的国旗，只是终止了自那面旗子被升起以后的各种出卖。说到底，人类完全没有必要对那些人为的国旗、国歌倾注比对一棵树、一堆土更多的热情。那些象征权力的“神圣”标记背后就是赤裸裸的人支配人的罪恶。

赵京：是啊，没有“被统治者”(即国家主权的主人)同意的任何强权形态都必然是要灭亡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虽然其权力形态不断发生重组，为人类带来了无数的灾难，但其文化、人口却不断繁荣、演进，在这个世纪之末，又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转换时代。任何阻碍民主、自由、人权潮流的权力形态都不可能持续太久了。

巴枯宁：上帝祝福你们，如果要借用你们的先祖在《诗经》中的一句诗来预期中国的话，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4月]



## 7. 脱离日本政府管制申请

日本政府太政大臣三条实美 殿下：

吾等生来即在日本政府的管制之下，受到法律的保护、获得法定的权利、也履行法律的义务。但是，今日，吾等大醒大悟，不再愿意生活在日本政府的管制之下。

从今以后，不受法律的保护、不要法定的权利、也不尽法律的义务，断然决定脱离管制。敬请批准。

谨上。

地球之自由民：栗村宽亮、宫地茂平  
明治 14(公元 1882)年 11 月 8 日

[日本无政府主义史料]

<http://www.ne.jp/asahi/anarchy/anarchy/data/dakkan.html>

[2001 年 7 月 17 日译于美国圣荷西]

## 8. 克鲁包特金对现代社会的再启蒙

大约自公元九世纪中期以来，直到1613年王族会议推举罗曼诺夫为沙皇为止，俄罗斯一直由海贼出身的诺尔曼人Norman族长Rubrik的家族统治。1842年，在罗曼诺夫王朝下改名为克鲁包特金Kropotkin家族的Riurik直系中，诞生了令所有统治阶级震撼恐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彼得·克鲁包特金。今天，当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代替，而以扬弃、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列宁、马克思的时候，谁也不能绕开无政府主义，不能绕开克鲁包特金。

自幼失去母亲，靠法国人家庭教师和德国人乳母抚养成长的克鲁包特金，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主人（统治阶层）与奴隶（被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部分是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更主要受当时的农奴解放运动风潮的感染，在圣彼得堡士官生学校读书的克鲁包特金就热衷于数学（地理学）和社会问题这两大注定为其终生从事的行业。1862年克鲁包特金20岁时作为士官加入哥萨克联队往西伯利亚从军五年，其间不断从事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在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进化的原因之一》

（注1）的绪论中，他回顾到：“青年时代当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满洲北部旅行时，动物生活的两种特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大多数的物种在严酷的自然中必须进行生存竞争，周期而至的生命剥夺，广阔土地上没有生物的活动……；(2)虽然大多数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自身并非一定如此）认为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进化的主要原因，但即使在动物群居的少数地方，我却没法找到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手段的残酷斗争。”

克鲁包特金由动物的观察联想到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受斯宾塞的影响（曾翻译过其论著），但对于达尔文主义者将生存竞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滥用（特别是其后克鲁包特金亲身经历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1902年就发表了《互助论》，从动物间的互助、原始人、土著人间的互助，中世纪都市间的互助，直到近代社会中的主要是劳动大众之间的互助，论述了人类生活中除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特性，指出这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空想，引论到人性中实际存在的、超越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国家统治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的善良本性，可以克服战争这一人类罪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周刊上登载一文，抗议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滥用，反对只用残酷的压迫和狡诈的欺骗语言，而要以相互协同的视点来解释生物学以及社会的进步，并要求再版《互助论》的普及版。克鲁包特金在其序文中开首写到：“今日之战争，几乎把所有欧洲都卷入恐怖的战争中，在德国人侵入的比利时与法国的各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大规模地残害非战斗人员生命以及掠夺普通民众生存手段的事态。这时，那些为罪恶的战争寻求借口的人把‘生存竞争’作为一个得意的解释。……本书的基本概念，即相互扶助代表了进化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因素，已经逐渐地被生物学者们所承认了。最近欧洲大陆出版的关于进化论的大部分论著都已经对生存斗争中的两种特性，即对自然逆境的物种之间的外部竞争和物种内部的对于生存手段的内部斗争，做出了区分。……不过，虽然动物间相互扶助的重要特性已经逐渐得到现代思想家们的认可，关于我的至今为止的第二个命题——人类历史中对于社会制度的进步的两个重要特性——却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现代思想的精英们，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大众是与人类社会的制度改进无缘的，只有那些在知识、政治、军事方面的精英们才可能指导愚昧的大众实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

“现在的大战，使欧洲的大多数国民不仅从战争的现实，而且从日常生活的繁多的结果中，深切地感受到应该变更这些流行的教义了。任何国家要想克服历史危机，都离不开民众的创造与建设的天分。那些积极备战、制造野蛮战祸的不是欧洲的民众，而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支配者和精神上的导引者们。……今天的妇人见到那些在基辅城里蹒跚的德、奥军队的伤员、俘虏，总会塞给他们面包、苹果，有时也会递上铜板，并不问其是敌是友、是官是兵。……那些自发的来自英、美、俄的对于比利时、波兰的援助，都超越了‘慈善’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单纯的邻人之间的互助。所有这些同等的事实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种子，正如人类原始的互助是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的最善制度的起源一样，这一类新的事实也将导致新的制度的诞生。”

从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反抗人类历史上最大强权——国家——的犯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人性中实际存在的同为人类的互助善良本性。作为一个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克鲁包特金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无抵抗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在生活实践中，“克鲁包特金象托尔斯泰主张的那样去生活了”（罗曼·罗兰）。当俄罗斯的贵族中最早接受欧洲传来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在为如何对待农奴而受内心谴责时，克鲁包特金 12 岁时就抛掉了公爵的称号，并以自己的贵族出身为耻，从此以贫困和遭受迫害为伴。直到 1917 年俄国革命，克鲁包特金才赶到俄罗斯，出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顾问委员。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布尔什维克政府曾经要以他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教科书，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再为新的强权政治所利用，因为自反抗沙皇的斗争以来，做出了先驱性牺牲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先镇压的工人起义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克鲁包特金专心于无政府思想源泉的哲学论著——《伦理学》，献给世界上一切被支配的贫

民大众，终因健康不支于1921年2月离开人世。布尔什维克政府要为其举行“国葬”遭到其家人的拒绝后，对那些自愿参加葬礼的无政府主义者开恩释放一天。两万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冒着政治危险参加葬礼，仪仗队前，两人高举象征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黑旗，上书“立即释放所有牢狱中的克鲁包特金的战友和同情者！”（注2）

历史上所有的群众运动常常为野心家、政客、内奸出卖掠夺，无政府主义者却永远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就是如克鲁包特金所坚信的那样，民众生活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来源，在《互助论》中，这种信念已经超越普通的道德、法约束束成为一种信仰，即：生为人类，就应该信仰人类互助之爱并由此去反抗、改善人类的罪恶制度。今天，我们在日本仅仅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尊严呼吁竟遭到北京和东京两个政权的卑劣迫害（注3）而没有变成暴力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信仰，相反，我们深深同情和理解所有的以各种形式、手段反抗国家强权的政治斗争（包括被判处死刑的“日本连合赤军”、“中核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以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秘鲁的“光辉之路”等等），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理想主义者。我认识几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学生，是日本青年中仅有的胸怀人类社会理想的优秀青年（我并没有知识认为他们坚持的理想是片面或错误的），当日本政府破坏日本宪法派兵海外，五十来名“中核派”（他们也曾曾在机场阻止日本国家强权强制遣送张振海）在不可能获得游行许可的情况下，蒙上面具、穿着同种衣裳在几辆装甲车和上百名警察的围堵下冲向大阪中心街梅田游行，抗议自卫队开向波斯湾。我们再次看出：只要国家政府的强权存在一天，国家权力必然对人类实行不平等的统治，人类就不可缺少无政府主义（或者叫“人权运动”、“社会改进事业”等等）的出于善良人性的反抗；强权（既存的法律、制度）彻底摧毁人性的一天，就是人类命运的终结。这个无政府理想主义来源的人性就是“上帝意志”，所以我们说，除了“上帝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威，如果基督降生在现代，他是一个当然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受近代科学的启示，克鲁包特金高举科学的演绎归纳法，甚至痛斥圣徒保罗（罗马帝国的公民）在罗马强权下向现实低头，曲解基督教义，胡说“奴隶要服从自己的主人”（《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七章 社会的法律机能），同时也以实证数据的分析，探求人们从事分业（分工）的合理可能。克鲁包特金高度赞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称其为“反对国家干涉的斯图亚特学派”。1898年出版的《农园、工场与作坊》就是他的社会学论著，奠定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此书主要指出：近代经济学者们立于“地主、资本家等特权阶级从低廉劳动力那里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讨论财富的增加，必然不问“应该生产什么？”，

“怎样去生产？”这个大问题，那么人类由科学进步激起的幻想（例如不被终生束缚于一种体力劳动而可以每天用一半时间工作，可不断变换农园、工场、书斋、画坊等等）就永远没法实现。涉及到具体的产业，例如英国农业的衰退，就是由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不合理政策所致（例如把土地租给有钱人作为游猎场）；另外，克鲁包特金也独具慧眼，对于被官权御用的经济学者们宣判了“死刑”的小生产、小工业也赋予在近代产业中的不可缺地位，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显得更加注目。

克鲁包特金的亡命生活影响了他，使他主要在社会哲学方面从事论述，除了《互助论》，较有名的还有《法律与强权》、《诉诸与青年》、《面包与自由》、《法国大革命史》、《俄罗斯文学史》（注4），但1903年于伦敦出版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无疑是他的代表作。克鲁包特金再次表明：无政府主义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梦想，而是存在与民众普通生活中的（尚没有形成制度的）道理，并且会永存于人类生活之中。在本文“一、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中，“科学家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类一员，他们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许多人拿国家的薪水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偏见，在大学里显然无法产生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别的社会主义、别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间，只要有民众运动，只有在民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活力和创造性就（才）不会消失。”而所有既成社会制度产生的动力也来源于民众，“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使社会生存顺利可能，为了维护和平，为了调停纠纷，也为了互相协力扶助，做成了许多必要的制度。”这样，在任何时代中都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潮流，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反抗少数统治集团，拥护创造了不成文制度的大众的创造力，“今天，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少数政治家做成的法律不抱任何希望而借助于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众的创造力，努力于创建保障社会自由发展的新制度。……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本来为了平等、和平、互助而产生的制度，连其中最善的部分，也作古成了化石。这些制度违背了其本来目的，成为少数野心家支配的工具，逐渐变成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没法希望国家主义方面的良知来改进制度自身，只能由产生于民众运动的革命运动来改变。革命家常有两种，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利益而在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时冒出的权谋骗子，这些人或因掌握权力丧失人性，或因运动处于低潮而卖身求荣，疯狂为统治阶级充当打手。但我们在反抗罗马帝国的法律中产生的基督运动中无疑看到另一种不可能被出卖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注5），无政府主义再洗礼派运动（即后来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今天新教的理论发祥）、法国大革命中的

无套裤汉、雅各宾党（这些人多被拿破仑利用去镇压过王党复辟）、直到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来自人类改进、制造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大众的建设活动中。

本人是科学家的克鲁包特金象拉普拉斯在《宇宙的体系》中推开上帝的假设一样，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头疼的康德、黑格尔式先验命题、辩证法术语等一脚踢开，而偏好于产生于十八世纪英法哲学中的演绎、归纳法。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复辟蔓延于欧洲大陆时，在英国诞生了无政府主义近代理论的基础（注6）。实际上，正是依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传播才把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理（人身解放、法律平等、代议制选举）燎原开来，并影响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废除（1861年）和美国奴隶制度的灭亡（1862-63年）。与此同时，正是共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848年革命）挽救了近代科学，把科学从权势的附属下解放出来。包括孔德的实证哲学（社会学）、斯宾塞的综合社会学，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蒲鲁东在此基础上集大成，发展出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自由，也是全人类共同自由的同义语：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者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最终得到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地发挥科学技术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才能排除在议会政治、国民普选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犯罪（注7）。

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如果要用一句来概括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历史、国家的本质，克鲁包特金如是说：“所谓国家，就是由地主、将军、法官、僧侣、资本家、革命家、人民公仆等等结成的，用于强权支配民众、榨取贫穷大众财富的社会组织。”而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际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削；所谓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一小撮新兴统治集团在独占经济资源基础上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压迫。所以，蒲鲁东在目睹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共和政府权力的犯罪后提倡由生产者、消费者联合成立的公共团体“法朗结”，其基础是利他式、互助式的个人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性质的自由大同，当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会最终获得自由。现代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织、变革，才能生存、发展。

注1：本文所引的克鲁包特金著作作为春秋社1928年4月发行的《世界大思想全集》第34卷，由室伏高信、八太舟三译为日文。

注2：我1996年在Univeristy of Wisconsin-Madison图书馆读到巴金翻译的克鲁包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自传》，后来又读到George Woodcock & Ivan Avakumovic, *The Anarchist Prince, First*

Schocken Paperback Edition, 1971, New York, 对克鲁包特金晚期包括支持英美等“自由世界”、厌恶德奥专制体制的政治生活有了更全面一些的认知。克鲁包特金并没有出卖晚节，但确实让包括古尔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失望过。

注 3：1992 年笔者在东京一个高级旅馆的“庆祝中日建交 20 周年”的“学术会议”上，遭到神户大学雇佣的一个中国打手的突然袭击。我去医院检查鉴定并到警视厅报案，一个便衣和一个制服警察拍照笔录了 3、4 个小时，说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后来我再去追问，日本方面竟然谎称没有接到我报警的纪录，并警告我不要再追究此事！

注 4：以北岛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们在离别祖国后逐渐失去了诗歌的无政府主义热情，他们应多读读克鲁包特金，同时加强哲学知识。

注 5：见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

注 6：葛德文《政治正义论》。

注 7：日本等西方的政治体制再“民主”，也无法克服金钱操纵等为葛德文深恶痛决的议会黑暗。

[1993 年 2 月 14-21 日初稿于日本静冈三岛市，2003 年 11 月 11 日修订于美国圣荷西，2008 年 10 月 26 日再修订于美国圣拉蒙]

## 9. 是社会性运动，还是政治性斗争？ —— 由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所想

普列汉诺夫(插图, G. V. Plekhanov, 1856-1918年)并不是思想家,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俄罗斯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活动家。早在1876年12月18日的示威中,学生时代的普列汉诺夫就锋芒毕露:今天,在全俄罗斯面前,为了表明与这里的人们的同盟,我们聚集在这里了。我们的旗帜高高飘扬,上写:“土地与自由!”。

逃过了沙皇宪警与哥萨克骑兵的追捕,普列汉诺夫逃到了西欧,主要在瑞士度过了长年的流亡生涯。在这里,他由反对沙皇专制的恐怖斗争转向面对大众的社会主义宣传,并达成了由巴枯宁向马克思的过渡。自《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年)以来,直到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劳动党中的支配为止,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权威。而正是这样的先驱最容易为时代的潮流所摒弃,1905年尼古拉二世开枪屠杀莫斯科广场的请愿民众,普列汉诺夫却发出惊人的感叹:“要是他们(殉难者)不去夺取武器就好了!”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普列汉诺夫与大多数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物(如声明“不打第一枪”的爱国主义者考茨基)一样,支持本国(俄罗斯)政府的战争政策。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普列汉诺夫回到自己为之宣传奋斗一生的“理想之乡”,除了新的权贵,他没有看到一个劳动者的踪影,几个月之后在芬兰悄然逝去。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写于1894年(我的读本为春秋社昭和3年(1928年)发行的迁润日译版),第一章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流派”,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18世纪法国的唯物论以来的追求“完全立法”、“完全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回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发源的人性论“空想性”的批判,主要受基佐等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的启示:“基佐认为:最善的社会组织,根本没有探求完全立法的必要,现存的一切已经足够满意的了。而且,面对现存社会组织,反驳那些非难者的攻击的最有力武器就是人性本身。……人性本身就决定了法兰西不可能从事社会与政治制度的真正改革。”与此同时,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也宣布了历史动力存在于人性之外的历史哲学之中。

在第二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普列汉诺夫归结到,只有卡尔·马克思克服了“空想”与唯心主义哲学的虚无,从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条件)解明了“财产状态”的神秘,完成了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



明：“反过来看，那些枉费苦心的带有天才奇想的完全立法构想，那些探求可能社会中的最善组织的努力，还有甚么价值呢？准确地讲：毫无价值！这也同时证明了那些埋头于此类研究的人们缺乏起码的科学教养，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没有任何劳动党不服从科学社会主义，或者《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的旗帜。”这样的鼓动言论，具备政治的战斗性，却疏远了科学性与社会性，把社会主义原有的广泛、生动、多彩的流源归于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狭小、僵硬的现实要求之下了。

第三章“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历史展开及其观点”是本文的精彩部分，显出普列汉诺夫对无政府主义的认真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哲学来源可追溯到德国人斯特纳(MaxStimer, 1806-1856年)的《唯一存在与其所有》，首先开端于对宗教哲学的驳难，“斯特纳与他(费尔巴哈)完全相同，只不过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出发演绎出极端的、过激的结论与命题：神是幻想的产物、神是幽灵，这都不错，但你强求我们去爱的人类是甚么呢？不也是幽灵、也是抽象物、也是人的想象吗？你所称的人类，到底存在于何方呢？在人脑、人脑的何处存在呢？所以，唯一的存在，只是具备自己的欲求、自己的志向、自己的意志的个人而已。如此，作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怎么可能去为抽象物人类的幸福而牺牲呢？你反抗旧神，对极了，却没有抛弃神学的见解，你为我们提供的(人类)解放，完全受到神学、神的支配的。”这个出发点可与尼采、叔本华并论，但其展开主要是针对国家社会(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以及那些资产阶级改良家、有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献身”、“救济”的自私本性。“共产主义者认为共同社会必须是财产的所有者，但“我”才是财产的所有者，只是关于我的财产，才能与他人协议、契约。”面对国家，斯特纳禁不住大叫：强盗！“在国家里，不存在财产(即个人财产)，存在的只是国家的财产，正如我的存在必须通过国家才能成立一样，我的财产也是通过国家才成立的。”

普列汉诺夫出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斯特纳的难解的说教不抱任何恶意，反倒要说明蒲鲁东这个自称“无政府主义之父”的理论的粗俗，因为正是在蒲鲁东那里，提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差异。“权力的信仰，与神的信仰一样，既原始又普遍，人们聚集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产生了权威，即政府的萌芽。”“与秩序相当，与秩序同一的自由是权力与政治的唯一实在。秩序的同义语这个绝对的自由如何才能达成呢？可以通过对各种权力方式的分析达成学到。不管怎样，正如我们再不可忍耐人对人的榨取一样，我们也不能允许人对人的统治了。”国家不过只是人统治人的一种方便，“我要区别所有社会中的两种制度，第一是社会性制度，其二是政治性制度。前者存在于人的本性

中，既自由也必要，随着其发展，就削弱、抛弃了本质上不自然的、一时的后者制度了。”“社会性制度是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关系的组合，在其中实行利益的均衡并普遍地达到劳动、分工、合作、竞争、商业、货币、股票、信用、财产、交换的平等和互相担保等等。”

“政治性制度的原理是权力，表现在阶级的差别、权力的异化、行政的集权、司法的分离，选举产生的主权代表等形态。政治性制度是为了秩序而设计、逐渐完成的，这是因为社会性制度尚没有存在的缘故。社会性制度的原理和法则，只有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刚刚发现，今天正成为各社会主义流派的争议对象。”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性运动正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才被蒲鲁东从各种政治性斗争中发现出来，为了达到社会性目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组织也必须否定政治性的制度利用：“政党的否定，权力的否定，人及市民的绝对自由。以上的三条中包含了我们的政治、社会的信仰宣言。”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蒲鲁东的驳斥简单而干脆：既然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必然是政治性的斗争。至于蒲鲁东在经济学方面依据小手工生产者展开的设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与《经济学批判》中一针见血地指明其激进革命口号中隐藏的最保守的期待，把他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区别开来的只是其精神的贫困、狭隘的气质，和对于一切真正革命的厌恶。在他的“政党无用、政治无用、国家无用”论的背面就赫然写着：“政治万岁！选举运动万岁！国家干涉万岁！”

第一国际的内部史就是围绕着蒲鲁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继承蒲鲁东对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区分，巴枯宁更专注于实际运动中的社会性革命与政治性革命的不同。看看那些无产阶级的议员吧！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完全被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包围，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不，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化(回到工区，学会了敲门而入，讲甚么“隐私权”等等)，为甚么呢？并不是人创造了地位，而是地位创造了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的驳难展开不如对斯特纳或蒲鲁东那样小心，主要是因为他是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吸取的第二手理论来打倒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实际阻碍(例如不赞同无政府主义者出席社会主义的大会)，连列宁也批注道：“前一部分是历史文献，是关于斯特纳、蒲鲁东等思想的贵重材料，后一部分完全是诡辩，用杂乱的推理把无政府主义与强盗之间嘲笑得没有甚么区别。”普列汉诺夫在“无政府主义是空想主义者，他们的见解与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处”的结论下，在第四章“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称战术，他们的道德”、以第五章“结论—第三阶级、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之后草草收尾：“这样，以革命之名，无政府主义者为反革命效劳，以道德之名从事最不道德的行为，以个人自由之名践踏他人的权利。”并且他举例告诫那些糊涂成

为无政府主义俘虏的劳动者：“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看社会问题，就会明白其无政府主义‘同志’其实不学无术，编造的理想不过是幻想而已。在资产阶级政治之外，有无产阶级政治与之对抗，这才是从根本上彻底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动力。”

普列汉诺夫的命运本身也暗示了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1)社会性制度与政治性制度的理论、(2)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实践斗争这两方面的差异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简单武断的判决，更进一步影响到布尔什维克胜利后苏联国家政权内的残酷斗争，以及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争夺国家权力的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今天看来，我们没有权利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铁托、胡志明他们的选择有甚么错误，因为时代环境(主要是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同，但我们起码可以指明：政治斗争并不能代表一切，不可能完成必须经过社会性连动才能达及的许多方向的社会改进。特别当我们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更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性斗争的限制，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1)中共党内的权力之争；(2)几乎只在海外进行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的方向性迷误，都在迅速地远离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

自邓小平南巡至中共的十四大，海外媒介(包括《中国之春》)竟倾注大量篇幅去登载、评述甚么人的儿子的“写作班子”的甚么“纲领”，表明关于中国政治动向的风流本身已经没有甚么可值得一顾的文字了。过后李梁先生邀我就中共的十四大写点评论，我一无兴致，二无精力去耗费在中国社会分析的表层时髦上。最近由《民主中国》等媒介略知“民联”、“民阵”两个组织的政治性活动的挫折(此挫折或其成功，意义都不宜渲染)，那些投身于政治性斗争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们，有几个人理解政治性斗争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或力量这一方向呢？当然，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在民主力量主导国家权力之前，彼此先争吵一番可以避免实际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之间落得托洛茨基、刘少奇那样的命运，在今天的政治性民主运动组织中也会产生一些由此获得经历的人才。但我依然坚信，以八九中国之春为代表的中国的社会改进运动，是由以下三种缺一不可的要素构成的：(1)政治制度的民主化；(2)基本人权的保障；(3)为达成全民族幸福的自我献身的爱国主义。我们说：为甚么它没有消沉也不可能失败，因为它不仅只是政治性的斗争(当然也很需要)，更是社会性的，拯救每个个人的社会性运动。

[东京【民主中国】1993年10月]

## 10. 关于 Kronstadt 悲剧的新资料

1999 年，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文献署的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发行了“1921 年 Kronstadt 悲剧”两卷本文件。这应该说是关于 Kronstadt 武装冲突的最全面、客观的资料汇编。书名以“悲剧”总结这次冲突，可以感受到编者对反叛士兵、水手们的同情，同时也对列宁、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内战条件下武断地镇压军事叛乱表示理解

（插图是镇压后列宁、托洛茨基与红军士兵合影）。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没有中文版，我所读到的只是从 Spartacist No. 59 Spring 2006 英文版的 Kronstadt 1921:



Bolshevism vs. Counterrevolution 得到的片断摘录。更遗憾的是

是，这份资料的出版，没有弥补调和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包括托洛茨基派）就此冲突的分歧。

这进一步证实我对此次冲突的认识。一方面，从伯克曼 1922 年的小册子 *The Kronstadt Rebellion*, Ida Mett 1938 年的 *The Kronstadt Commune*, 到 1955 年 New York: Libertarian Book Club 出版的 Voline 的 *The Unknown Revolution (Kronstadt 1921, Ukraine 1918-21)*, 都记载了反叛士兵、水手们的革命激情，从原则上显示出对于正在形成的列宁主义一党专政体制的抗议，值得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站在刚刚获得政权、内战尚未结束的新兴的布尔什维克铁腕领导人物的立场，短暂地“冻结”民主主义原则，杜绝西方列强及白卫军利用无条件地要求民主带来的混乱，粗暴、迅速地地平定叛乱，也是有战术上的一定的正当理由。

实际上，正如我在论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中指出的那样，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列宁主义的基石，都是超凡政治家列宁在当时俄国革命条件下采取的暂时性的政策，如果列宁本人存活稍久且仍然不丧失明智判断的话，他会“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义上来的。当然，人类政治事件的历史，几乎不存在理智的条件。伤病之中即将离世的列宁，只能把权力移交给惟命是从、毫无原则、道德、人性的官僚阶级（后来的权术大师邓小平重复了这个过程，让其僵尸代理统治中国）。从这个

意义上讲，列宁、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主义的形成及其变种（斯大林体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他们对克朗斯塔特士兵、水手的镇压，正是一场悲剧的典型的开端。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取消新闻自由、多党制度，人类社会主义的历史将大为改观。

对于克朗斯塔特“悲剧”的认识，应该是祛除列宁主义体系中存在的肿瘤的重要药方。我们期待着这份资料的译文的出版。

[2006年7月25日 美国圣荷西]

## 11. 马克诺运动的教训

据莫洛托夫回忆（注1）：“有一次在内战中，当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时，（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马克诺攻击邓尼金的侧翼，意外地解救了苏维埃共和国。邓尼金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对付马克诺的进攻。你看，连马克诺也是有用处的。那时的情况是如此危险，列宁召集我们大家说：‘完了。苏维埃政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我们接到文件和秘密联络地址……”。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邓尼金如果能攻占莫斯科，高尔察克、Wrangel 等领导的白卫军会服从邓尼金的指挥，统一起来打败布尔什维克刚组建的红军，改写二十世纪俄国和世界历史。从莫洛托夫的回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权力这个唯一目的，多么地不择手段，连俄罗斯革命的另一大潮流（无政府主义）也斩尽杀绝。

今年夏天，我首次造访在奥克兰的著名无政府主义据点 AK Press。奥克兰是美国黑人激进运动的大本营，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高涨时期，这里的黑豹党与联邦警察展开巷战，被镇压取缔，但由此也迫使美国政府转而支持马丁·路德·金的和平抗议运动。在“9·11”以后小布什当局的“你不站在我这一边就是我的敌人”的国家恐怖主义气氛下，只有奥克兰选区的黑人女议员芭芭拉·李一人投票反对小布什的阿富汗战争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中坐落的红砖建筑 AK 出版社陈旧阴森，让人望而止步。我叫了几次门铃，才被放入紧闭的铁门。这里更象一个杂乱的大仓库，好在我对那些书刊都比较熟悉。当我一眼看见散落在地上的彼得·阿西诺夫著《马克诺运动史》（注2），马上掏钱购买时，那位跟着我的青年女子放下戒心（或好奇感），知道我也是属于这个运动的同志，任我独自漫寻。我知道，AK 出版社本身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组织运营的，没有上司老板，八、九个员工都是白人，包括伯克利大学的学生。



阿西诺夫 1887 年出身于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工人家庭，很小开始做工并成为社会主义者。几次遭到监禁和流放。这个经历与马克诺（插图）相似，使他成为马克诺的同志和战友，在 1919-1921 年期间到乌克兰帮助马克诺从事文化和教育活动，成为马克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由他为马克诺运动记录历史，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马克诺运动基本上被镇压下去的 1921 年，阿西诺夫回到莫斯科，躲过尚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警察系统，写下了这部宝贵的记录。1922 年他逃到德国，在柏林组织那里的流亡俄罗斯无政

府主义活动，并于1923年出版了本书。需要指出的是，阿西诺夫在发表了拥护苏联的文章后与马克诺等分道扬镳于1932年返回莫斯科，从事编校工作。马克诺1934年死于巴黎，阿西诺夫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以无政府主义罪名枪决。

作为历史记录，阿西诺夫多次承认此书简单粗糙，并希望以后有条件时重写。他保存的原始文件已经遗失，所幸此英文译本中加入了十一份收录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文库Ugo Fedeli（现存于阿姆斯特丹的社会运动国际研究所）中马克诺运动1920年1月到6月的文告，从中可以明确知道马克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性质。与任何主观记述一样，阿西诺夫在此书中对马克诺本人及马克诺运动的军事胜利（或失败）描述不一定全面，但这无损于此书的无可替代的价值，从中可以了解马克诺运动的主体（乌克兰南部最贫穷、革命的工人农民）以及他们为什么拿起武器反抗企图支配乌克兰的所有资本和专制权力：奥-德帝国、沙皇及其残余（白卫军）、乌克兰民族资本·地主阶级，以及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制。虽然马克诺运动没有条件在他们控制的城乡实施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政策，但他们废除监狱，废除资本剥削，公告新闻、言论、政党自由（禁止一党专制），把包括教育、税收等一切权力都归还给民众。应该说，马克诺运动比同样在危机中诞生但更短暂生存的巴黎公社更具有新社会的雏形。

阿西诺夫通过此书告诫后人的要点是：俄罗斯革命从二十世纪以来，沿着两条路线展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前者宣扬社会革命，后者强调政治活动并最终归结到国家政权这个唯一的目标。阿西诺夫告诉我们：那些聚集在国家社会主义旗号下的各个派别，不管是社会民主党（后分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还是社会革命党，都是梦想取代过时的沙皇体制下优越地位的知识阶层，他们之间的争吵没有价值。实际上，他们也容易被制服、吸引到列宁的一党专政的新权贵体系中。作为政治变迁的“十月革命”，只不过是变换了一个政权，没有什么社会的进步。而无政府主义才是革命的精髓，在革命倒退的关头，坚持反抗政治专制和经济剥削的革命理念，不惜以微弱的军事斗争手段坚持“把工厂交给工人！把土地还给农民！”的旗帜。

本书印证了莫洛托夫这个最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列宁-斯大林主义者）如何为了夺取政权利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白。作为“外来势力”的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当他们1920年10月逃出乌克兰时，被迫与唯一的同盟马克诺运动签订协议，包括释放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实行新闻、政党自由。但他们在《真理报》上只登载将马克诺运动编入红军的条款，一旦马克诺运动帮助布尔什维克击败邓尼金和Wrangel后，布尔什维克马上命令这支以乌克兰南部农民为主的民

兵组织开赴到波兰边界去镇压别的反叛农民。这当然不可能。作为军事斗争的马克诺运动就这样被早已调来的亚洲高加索红军部队（还有中国士兵）镇压下去了。在这3年的英勇斗争中，马克诺运动高举被压迫民众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援助的困难条件下从未妥协。1921年8月28日，身负6处枪伤的马克诺在昏迷中被他的战友们用马车护送出俄罗斯边境，结束了这场以他名字命名的运动。阿西诺夫估计总共有20-30万马克诺运动的子弟献出了生命。

本书的序者、在英文世界中较有名气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Voline（注3）也提到他本人的经历（本书第29页）：当他在监狱中谴责布尔什维克出卖了马克诺时，审讯他的秘密警察头目哈哈大笑：“你说这是背信弃义？这正好证明我们是高明的政治家！当我们需要马克诺时，我们知道如何利用他；当我们不需要他时，我们就消灭他。”不过，我们也知道，绝大多数秘密警察头目，以及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头目（包括“十月革命”的实际指挥者和“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都没有逃脱一党专制的魔掌。据载，布尔什维克的五大创始人之一的季洛维也夫在被枪决前，绝望地哀求秘密警察：“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允许我给斯大林同志拨一个电话吧！”而斯大林最欣赏他的卫队长表演季洛维也夫的这个临终绝唱。那么，我们怎能不理解成千上万的对俄罗斯革命抱有热情的正义人士最终抛弃了被一党专制玷污了的“社会主义”呢？

马克诺运动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只有同时反抗任何形式的资本支配和政治强权的无政府主义才是俄罗斯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总结巴黎公社的教训时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死了，公社万岁！我们说：马克诺运动死了，马克诺运动永垂！

注1: Molotov Remembers - Inside Kremlin Politics: 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 Chicago: Ivan R. Dee, 1993 第99-100页。

注2: 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1918-1921, London: Freedom Press, 2005.

注3: Voline (Vsevolod Eikhenbaum) 本人也是马克诺和阿西诺夫的战友。他在1947年出版的《人所未知的革命》于1974年被译为英文，是关于俄罗斯革命无政府主义的经典。

[200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期间 美国圣拉蒙]



## 12. 无产阶级专政与列宁主义问题

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1）。这一段文字尽管被作为经典广泛引用，其实没有多大价值。第一点是对阶级的进一步定义，第三点是对一种未来的政治体制的进一步说明，只是就第二点，马克思在如下的评论中有所展开：

1850年1月至11月1日，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注2）。1871年9月，马克思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中提出：“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礎。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注3）。1875年4月-5月初，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注4）。

马克思的著述颇丰，不过关于“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例如，与代议制的关系），他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论述。我们所知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列宁定义、发展并实践的。实际上，所谓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

1917年8至9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宣布：“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注5）。1918年3至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更简明地宣称：“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注6）。

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解释、定义，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教义（社会民主主义），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列宁主义。在已经初步掌握政权的基础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认识，是出于俄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注7）。

列宁没有教条地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体。相反，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缺乏知识和经济能力的无产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所谓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那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胡说”），只有在某些教主（马克思）教导下，在某些职业革命家（列宁本人）的领导下，依靠一个铁一般纪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强制地灌输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才能领导工人阶级、依靠农民阶级、利用知识分子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

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注8）。“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大会上对多位退席抗议的社会革命家的宣判）的各俄国政治力量的各种回顾纪录看来（注9），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基础在于沙皇崩溃下那些刚从农民转换为士兵、水手和工人的政治活动分子接受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鼓动（注10）。俄国革命政治上的成功带来的列宁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列宁的天才，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来源于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本质上的逻辑联系。就政治发展方向不以经济发达程度为转移的事实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并不确立。

列宁主义在俄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时期有一定的效用。既然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依据特殊历史条件夺取政治权力，它的任何“说法”都不具有非坚持不可的原始教旨。正如王凡西晚年经过长期寂寞的思索后，痛定思痛地承认：“斯大林建立其野蛮独裁时曾经利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观念，以此作为护符，作为招牌。这些个观念，有的是真正属于列宁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伪造了的，有的则在具体特殊的情况中列宁当作权宜性的办法提出来的。”“为要在一定范围内医治及防止此种个人独裁起见，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首先我觉得：‘工人政权必须集中’这一个思想，应该用另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观念来补充，那就是，统治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互相钳制与互相平衡。’”



“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制，应该用同阶级内部的分权制来加以民主化。”“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必，而且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种种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被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钳制和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的存在。”“无产阶级的专政绝不应该变成一党的专政。由部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派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的监督。”（注11）。

王凡西进一步指出：“一九二一年三月间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党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存在，显然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如后来历史所证明，实在

是贻害无穷。这个禁令事实上不曾能禁止派别，却给了占上风的某一派别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灭反对者。“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非常反动的公式，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反动理论的几个基石之一。“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都奉行了这条‘路线’，使共产党变成为‘绝对统一的’，即由一派独裁的，亦即由一人独裁的组织。”王凡西作为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把在列宁的绝对权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苏联共产党内的一次大会的错误决定提高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只是看到了其直接恶果，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正是列宁主义体制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错误决定不可能在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内得以纠正，反而促成了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实际上，我认为所谓“列宁主义”的形成是在布尔什维克刚用武装手段占领冬宫等象征性部门驱散临时政府成员不久的十一月十七日，在“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大楼讨论是否停止前几天刚颁布的“暂停新闻自由条令”。此时，仅仅在军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布尔什维克，只有左翼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列宁的人数也不少。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员Larin提议解除“政治恐怖”，恢复新闻自由，得到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布尔什维克成员的热烈赞成，而“列宁派”Avanessov提议推迟讨论新闻自由，却遭到强烈否决。此时，列宁“力挽狂澜”，力陈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权力，以34对24票通过了列宁的提议。具此，左翼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堡的实际军事指挥机关）和辞去“人民委员”的五个职位。连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也反对列宁的提议，退出中央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注12）。这实际上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开端，也是列宁个人独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的起源。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列宁的政治天才本能地预知，只有这样的个人领袖独裁下领导的一党专制，才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动员广大的工人、士兵继续把革命向前推动。

新闻自由与一党专政不能共存。随后的内战更提供了布尔什维克压制新闻自由的理由，也成为第二国际考茨基等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关键因素之一（注13）。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第四国际已经明确地决议到：“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享有组织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自由。”“限制组织团体、派别、政党的自由，并不是限制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除非群众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党制是工人政权、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先决条件。”（注14）。到此，我们可以下结论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

原初的“权宜之计”。我们不得不回到了陈独秀的结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

更进一步，王凡西看到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的逻辑连贯性：（1）“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织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阶级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2）

“工人阶级只有应用民主手段来争取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革命党应用暴力和阴谋手段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可能是民主的。“这些说法……，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却必须承认它们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更彻底与一贯的。陈独秀如果要把他的绝对民主论贯彻到底，就得接受这些个说法。”（注15）。陈独秀之所以没有走到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今天，苏联的瓦解、中国的变化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劳动阶级的自我解放，即使由列宁、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天才领导的政治胜利也无法保证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成果。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把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的失败只归结于斯大林主义而对列宁主义的“权宜之计”性格视而不见，最终没法回避第二国际的遗留问题。而解决第二国际的民主与专政之争，又得回到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分裂教训上。

虽然列宁主义的各种发展、变形有许多重大分歧，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具有那些追随者理解的那样大的价值。我们除了“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外，也不能把列宁简单地否认掉。相反，只有彻底扬弃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主义的教义，在俄国、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的国度中推动在发达工业国家形成的初步民主主义制度，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才能保卫在中国的原初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成果。

注1：《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注2：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注3：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注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注5：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注 6：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17 页。

注 7：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16—517 页。

注 8：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00—201 页。

注 9：尽管关于俄国革命的出版物多如牛毛，但最经典的记录仍然是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1981 (Reprinted)。此书 1919 年 1 月初版时由列宁作序，虽然包含有作者的主观倾向，但基本忠实于事实。

注 10：《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很好的写照和宣传。

注 11：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http://www.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htm>.

注 12：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enguin Books, 1981 (Reprinted), pp. 237-241.

注 13：Leon Trotsky, *Terrorism & Communis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注 14：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通过（一九八五年一月）[兆立译]

<http://www.marx.org/chinese/08/01.htm>.

注 15：王凡西：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http://www.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50.htm>.

[2005 年 11 月 美国圣荷西]

[付录] 忘记过去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我们没有成为人类的有机部分，在我们的血液中存在着某种拒绝一切进步的因素，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世界，为遥远将来的子孙们提供惨重教训而已。”当十九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文学与艺术）突然崛起，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时，文学家 Chaadaev P. Ia 在 1829 年却发出这样的绝望预告。整个二十世纪中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奋斗的历史为人类提供了永远取之不竭的遗产，但今天的俄罗斯还没有能力反省自己的历史，迅速失去民意支持的政府正拼命地抹掉所有关于苏联（即二十世纪的俄罗斯）的记忆。如果说将以革命家命名的公共场所、设施更换为过去的帝国或教会的称呼还不妨理解为对更深古历史的复归，那么，关闭那些本来属于人类遗产一部分的纪念馆却过分地表现出一时的政治权力意识。沉睡在红场上的列宁很难接受人们的参拜，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迁移到远离权力争夺中心的更合适安眠的故土去。必须同时面向未来（学习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制度）和回归过去（苏联以前的历史）迫使俄罗斯无暇反省其刚成为历史的遗产，难道对于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尝试的憧憬仅仅是我们这些受到过保尔·柯察金影响的“红小兵”的乌托邦吗？



五月八日临登机离开莫斯科的前几个小时，我们略怀缺憾地信步到 GYM 百货店，听到红场那边传来不寻常的喇叭声，原来是列宁墓开放了！第二天就是战胜纪念日了，克里姆林宫当局总要象征性地做一点姿态，却又不愿意（可能也没有大大必要）宣示开放时间。我们匆忙赶到被围起来

的红场入口，没有过去的排长队等待的情景，与俄罗斯人一同缓缓进入由卫兵守护着的列宁墓。遗体仍然保存得相当完好，但这本身其实与社会主义精神违背，来源于东正教和沙皇俄国的旧习，只是比克里姆林宫的寺院中保存着的伊凡雷帝等历代沙皇、贵族和东正教府主教、总主教的灵堂更现代化而已。从某种意义上看，列宁看穿了沙皇（国家权力）和东正教教会组织的人性恶本质，同时彻底地反对这两者，自己却成为结合这两旧习的最大祭品。最近的历史资料逐渐可以证明列宁墓的建造只是出于国家统治现实的必须，列宁在枪伤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拥有领导国家的权力，而必须处理大量行政事务、直接面对俄罗斯帝国社会基础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必然逐步演化成（以斯大林为首的）专制官僚集团，列宁临终时已经不再信任斯大林，要求撤换斯大林了。那么，热心

建造列宁墓的斯大林官僚集团当然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统治国家的要求让（已经丧失抗议能力的）列宁的遗体再为现实需要服务。

与毛泽东遗体相比，列宁遗体显得更有朝气、理想而较少权谋与威势，使人联想起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确实，与毛泽东的反感知识分子、专注帝王、农民相比，列宁继承了俄罗斯知识分子面对未来的激情，兼具马克思那样的学者性格（十月革命的另一位领袖托洛茨基也具有这种天性，比列宁更理想浪漫）。很惭愧在中国近代史没有出现一个如普希金、赫尔岑、托斯妥耶夫斯基、巴枯宁和托尔斯泰、克鲁包特金、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文学家、思想家，我们从他们的思想中可以感受到具有普遍人类价值的精神，他们对于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反抗并不只是基于作为知识分子这么一种特定阶层的本能（如反对书报检阅制度），而怀有（几乎被教会垄断埋葬掉的）基督教的赎罪反省意识。1861年颁布的农奴解放法令等一系列“大改革”为知识分子带来一些恩赐，但在1868年圣彼得堡的学生争取自治权益的斗争中产生了更深刻的以Nechaev S. G.为代表的自我否定思想：不错，在反抗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学生、知识分子确实代表了未来，但从民众的眼光来看，你们不是与沙皇贵族同样处于统治·欺骗·寄生的犯罪地位吗？Natanson M. A.等人更彻底地呼吁：“具有个体批判思维意识的知识分子们，到了向民众支付数百年来为偿还债务的时候了！”正是这样的出发点，导致了最初政治结社“土地与自由”的诞生并一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普及，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才告一段落。以此反省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无知，仍是因为依附于政府权力（不管其权力来自中南海还是华盛顿）谋取些许残羹而成名成家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自省的良知，反以御用帮凶行走为业。中国的知识阶层如果要发挥超越出国家强权下“技术奴隶加少部分权势败类”地位的贡献社会的功能，首先要排除阻碍知识分子获得思维知识的世俗影响。

列宁墓的两侧是十月革命以来殉身的士兵，工人的墓地。背后立有斯大林、勃烈日涅夫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雕像（可惜改革者赫鲁晓夫没有入列），在往后的克里姆林城墙上被挖出许多方块，纳有高尔基、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妻子）、片山潜（日本社会党创始人之一）等名人的骨灰。大概因为第二天是战胜纪念日的缘故吧，斯大林的雕像前被放置了一些花束，显得有些注目，偶尔有人从不间断前行的队列中走向斯大林像前鞠躬。兴许，对于统治者斯大林的评判，在经历了“正”与“反”之后，还需要辩证的综合。人们专注于他的清洗同僚、压制知识界，其实，正是官僚和知识分子最具报复能力可以很快否定斯大林的统治形象，但斯大林当政期间的“政绩”如何却没有比较中肯的认识。赫鲁晓夫所揭露的那种连地球仪都不会看得人怎么能够指挥“伟大的卫



国战争”取得胜利呢？与斯大林有些类似（但量级小许多）的朴正熙在韩国得到了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这当然有赖于韩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而俄国知识分子尚需艰苦的工作和岁月才能对斯大林、托洛茨基、列宁和苏联时代做出与这段历史相称的研究成果。对于俄罗斯而言，仅仅是复归东正教和旧帝国的光荣并不能赶上今天的时代，那种故意忘记过去的企图就是对于历史曾经提供的教训经验、牺牲和贡献的背叛，重复无所谓的牺牲。

我们刚步出列宁墓侧面的台阶，看见红场的对面有一队举着红旗、标语、列宁画像的老年人（约一百多人）高呼口号迎面过来。我拨开围观的人们，跑上前去与一个老太太握手，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的镜头，连说“乌拉！乌拉！”，他们围上来，动情地咒骂叶利钦和美国，一个老大爷用生硬的胡须，使劲吻刺我的脸面，我注意到他的左腿是残缺的……。

目送着游行队伍渐渐消失的背影，可以感受到幕里那个遗体的不安，列宁不可能被任何行政当局认为地理葬掉，也难享有复活的命运。过早地去世，对于列宁个人而言成全了他的功名，但我更希望列宁思想有一个完成和终结。那么，理想的统治者“哲学王”列宁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理念呢？这可以被称之为赎罪之国家学说的基点：国家是人们从事社会生活的“恶之必须”，任何为政者，相对于任何别的政治势力（如列宁相对于沙皇、临时政府、社会民主党、反叛苏维埃的无政府主义水兵或农民）都有充足或不充足的理由去镇压、支配、欺骗同为人类的同胞；但在人类“造物主”面前，“哲学王”也不可摆脱统治人类同胞所必然带有的社会生活“原罪”。这种“原罪”只是基于以下的简单现实：并不是由于他/她的出生而具有（因为出生是无可选择的），乃是因为他/她要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必然负有的。当然，从历史事实来看，任何统治者（包括列宁、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毛泽东、邓小平以及那些靠代议制爬上权力顶峰的政客）在其注定成为“王”之际绝少可能会爱顾“哲学”的智慧和信念，但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减轻社会“原罪”（如托洛茨基、彭德怀、胡耀邦等）。至于那些有幸多受了些教育（因此比别人多负罪债）获有些许知识技能的人，比较容易地由一百多年前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选择中得到拯救或复活：永不向任何权势屈服，把自己置身于无权势、无钱财的平民行列中，为民众服务。

[1994年5月14日，静冈县三岛市]

### 13. 非宽容社会中激进主义的意义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我借出席公司同事（香港人）婚礼的机会，首次进入香港境内。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外交部 236932 号）对于大陆的中国平民而言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法权制度，无权势的普通人往往必须变卖可怜的家产或举债才能获取它，但连中国领土上的殖民地政府也不把它作为值钱的文纸。本来，人类之组织政府，是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之方便的（如记录或证实某人何时何地出生，为成年男女办理婚礼登记以维护一夫一妻的社会生活型态等等），绝不允许任何权力利用这个服务制度进行人支配人的罪恶。任何一种形态的政府，当它拒绝为本国的公民提供这种服务（如发行护照对外国证实其为本国公民）时，就宣告了它本身的非合法性。我不相信人类社会将永远生活在至今为止的这种非理性的对于自身的奴役状态下，每当看到（也经历着）人们屈从于国家权力之下甚至不得不靠出卖同类的利益（甚至生命）、自己的灵魂以谋取“护照”、“签证”、“绿卡”等等，更坚定了我对人类理想的追求：消亡国家权力的罪恶。

我竭尽可能，掠影般地考察香港的政治、商务、学界的状况，最后在新苗社的小屋与林致良等三人深夜长谈，感受到一种在今天的社会中早已被遗忘掉的“中世纪性”的同志式交流。新苗社听起来很像文学爱好者社团，其实是纯粹的政治性组织，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被出卖掉的遗产，在它的九三年社员大会决议《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以下简称《决议》）中表述到：“我们托洛茨基派几十年前已经指出，苏联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其实只是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变态工人国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仅仅维持着国有财产制度（这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已。官僚统治者维持国有制，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复生，在这点上可算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有进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极端专横暴虐的方式，肆意压榨工农大众，滥用并且侵吞国家财富，却事实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直接的巨大障碍物，而且是社会主义名誉最大的败坏者，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为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共产党官僚政府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现在被多少（有一些）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带有倒退和进步两方面的意义。”以今天的已经被人们疏远的社会政治思潮来看，这是一个激进的样板。

任何社会改进事业都必然带有激进的性质。耶稣传教时就是对固守《旧约全书》兼以此垄断信仰生活的旧约太教的反抗，其后的宗教改革正是恢复了这种激进精神才保持了基督教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

性、革命性敲响了近代以来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警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改进并维持了这个制度使之更加稳定。社会改进运动所必然带有的激进性格源于占据整个社会形态主流的势力的非宽容性，这种非宽容性往往表现为愚昧、残忍。表现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在较高（广）层次上被不宽容地排斥的激进派在较低层次中又以不宽容的形式排斥更低层次的激进派，这就会引起外部的困惑。我们以此审视一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的可称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兴许可以为今天的社会改进事业找出明晰的方向。

社会主义思潮没有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但它在弥漫欧罗巴大陆时就排斥内部的最大激进支流——无政府主义，连会议也不允许其出席。撇开关于国家权力认知上的理论不提，马克思主义派在现实的斗争中首先不宽容地利用其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好恶心理，丑化无政府主义的成熟的政治行动（暴力），恩格斯就一方面潜心无产阶级起义的街垒战，一方面痛斥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最近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喜欢以反对暴力、恐怖的名义封杀许多弱者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非宽容性。暴力必须反对，但最大的暴力不是秘鲁的“光辉之路”（《民主中国》有一期社论将其痛骂一通可谓无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以及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布朗牧师那样的为反对罪恶的奴隶制度去抢劫军火库的暴力行为倒是人类正义的必须。为了中日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真正和平，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实现人权尊重。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度中，最大的暴力犯罪都是政府权力本身。任何不能（不敢或不顾）反抗政府强推罪行的人都没有资格（或必要）附和着咒骂那些被迫以极端形式抗争的受压迫者。事实上，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如北欧）不存在具有冒险性激进派的基础。

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战争面前再次分裂，基于现实的利益斗争，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国家政权的专制彻底排除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确立了新的、不宽容的统治。托洛茨基派（以至今还不太为人们所知的第四国际为代表，最近刚被叶利钦政府批准在俄国设立组织）的局限性即在于它既然忠实地以托洛茨基为起点，就没法理解托洛茨基的起始——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具有某些必须被扬弃的错误的，例如被过分强调的“阶级史观”和“工人国家”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是不存在的，托派所英勇抗争的斯大林型国家官僚专制只不过是列宁布尔什维克路线在新形式下的畸形发展而已，吃过其苦头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的毛泽东曾经承认：在欧美的民主主义政体下是不会产生斯大林体制的。托派最早揭露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共产党政权国家的本质为经济上的“工人国家”和政

治上的“官僚专制”这两大特征，以此可以自然地认识斯大林专制统治下“丹东之后，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恶性重复：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都被斯大林肃清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试图“拨乱反正”反而被幽禁起来，葬送了“重建”苏联的可能性基础——戈尔巴乔夫的符合西方口味的“新思维”、“公开化”的失败是如此之明显（这当然是苏联解体之后）并不需要托派的理论预见。托派认为“对一九一七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曾经建立过的工人国家，做出理论上的总结……主要是托洛茨基派的贡献！而且只有坚持托派的理论核心才可能完成任务。”（引自《决议》）但所有这些过程，包括托洛茨基的命运，都已由推翻沙皇专制的另两大势力：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命运中清楚地表明了。再说一遍，托派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他们的最大悲剧（今天的托派仍旧没能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时间的流逝会冲掉一些历史的事实，却更清晰地显示出理论的构架。如果说中共十四大新上台的权贵们刚闭幕就必须朝拜一个近九旬老人只不过预示着下一次大会的终结，那可能是因为“六四”的镇压记忆犹存，继承八九中国之春政治运动的人们将此视为中共统治中国正统性的丧失。但任何政治事件不过是固有性质的表露罢了，魏京生（十多年前是多么激进！）先看出了这种固有性质，再往前溯，只有最早的共产党反对派——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最透彻地理解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在主导中国现代史的中共发展史上，至今没有得到“平反”的开除陈独秀等托派（当时的中共自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和愿望，只是听命于斯大林而已）甚至杀害托派分子（如王实味）的变质，必然地演化出“第一次路线斗争”之后的无数次至今不断的斗争。注意一下并没有多大政治力量的中国托派这个不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激进社团，在感佩其抗争精神的同时（见郑超麒、王凡西等人的回忆录），不得不惊叹其内部的不宽容性就是直接源于那些潜意识中所受的斯大林（即列宁主义的翻本）的影响。

陈独秀的难得之处在于超越任何一种单纯的教义，这来自于他不顾个人功利的人格，可认为超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一两位先行者：康有为、孙中山。在清朝刚崩溃之际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激进得吓跑胡适等同路人，在民国共和之梦幻破灭、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创立共产党，都极具政治洞见。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却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困苦中。作第三国际的替罪羊简单，因为陈独秀比康有为、孙文更“天下为公”，知难行易的他最终不情愿地在易宽、彭述之等人影响下接受托洛茨基的见解并成为托派的领袖。中国托派的注定命运在于没有直接投身于中国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抗日军事斗争），只是寄希望于中

共上层组织的民主，除了内部争吵只能印刷少许的仅限于租界（那里政治思想上安全一些，有点像今天的香港）的刊物。托派不理解晚年陈独秀思想某种程度上回归民主、人权的意义（彭述之竟无知地攻击贫病去世的陈独秀是“晚节不终”），陈独秀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义或组织上屈从于势力的共产主义者（特别在第三国际犯了罪过的关头），不是一个简单的托洛茨基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主义者——尽管在中国的至今为止的历史上，仅仅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教义的忠实实践者就是可贵的了，因为中国社会本不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宽容性，与托派同病相怜的“民主党派”（即右派的反对派）在陈独秀刚出狱时还欢喜巴结他，得到中共暗示后竟都佯装不识其人。

在许多激进性的、带有封闭性的社团中，都标榜超越出普通人类行为规范的教条，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政党中，对于别的政治团体，常有“仅仅停留在民主主义的阶段上”、“还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已”的略嫌不足之感。民主主义作为人类生活的起码必须尊重的方式，正如《圣经》上“不偷窃”的训诫一样，并没有必须去为之献身的价值（世界上也没有见过“不偷窃党”之类的团体），更不用提实际存在的民主党（如“日本自由民主党”）社团只是利用民主的方式（例如最近把促使自民党下台的反腐败愿望转变为选举区制的划分）获取自己（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超越出简单的民主主义（如多数可决形式）对于许多立志献身社会改进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人格的提升，这种提升在社会危机的时代就呼唤着所谓职业革命家、先知的诞生，如布尔什维克、耶稣的十二信徒（这其中的相通处，罗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西方哲学史》中多有描述）。特别当那些初期带有革命性的社团转变为不宽容社会的统治势力时，那些仍然忠诚于初衷激进性的个人或分支就必然带上悲剧色彩。格瓦拉是幸运的，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告别了卡斯特罗去南美征战并殉道于“死得其所”的战斗中，但注定要指导（或献身其中，反正他们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选择）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指导中国革命的陈独秀们必须扮演起赫克托尔（特洛伊王子）的命运：就其所从事的事业（团体）而言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就其个人的人格而言可能达成最高的完成。

如果明确一些，把社会改进运动的精神理解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再说明一下，这个中文译名不合适），反对一切形式的人剥削压榨人、人支配统治人的罪恶制度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非托派（笔者即为其一）与托派关于斯大林型专制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不同立场，对于一九八九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及其发展方向（如最早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波兰最近的选举）就可以（也应该）抱有不同的认识，政治思想上的不同

激进立场正是现实生活上宽容的基础。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赫克托尔或必须上十字架，甚至那些为了生存（物质与精神的）被迫投身于（最大犯罪之源的）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人类同胞也可以得到人性的教育，共同消亡一切现存的一小撮人用以镇压、支配大多数民众的制度，使这个社会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各个层次上获得宽容的性格。

[东京《民主中国》1994年2月]

## 14. 关于莫洛托夫和苏联的兴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沉痛地宣告：全苏抚恤年金领取者，1906年以来的苏共党员莫洛托夫在经历长期的疾病折磨后，于1986年11月8日以96岁高龄去世。去世者1930年至1941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在1947年至1957年担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人民委员会会议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的第一副主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莫洛托夫的国际性名声起自1939年他以苏联外交部长身份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秘密瓜分东欧的协议）。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以国家防卫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宣告德国的入侵；莫洛托夫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与波茨坦会议中，都伴随斯大林，与斯大林一起共同代表苏联，与美国、英国谈判战争进展与战后处理。

熟悉苏联历史的人更知道莫洛托夫的地位。他16岁即加入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派，曾经被流放过两年，参与创办《真理报》，被捕判刑13年（1年后逃脱）。1917年加入彼得堡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参加二月革命、迫使尼古拉二世退位。在十月革命中，莫洛托夫是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领导起义。1920年，莫洛托夫在3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名列第一位（另两人是布哈林与加里宁），经常代替缺席的中央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决定政策。

列宁去世后，莫洛托夫协助斯大林战胜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右派”布哈林、赖可夫等，成为斯大林的副手，参与制订、执行了所有被称为“斯大林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苏联最辉煌发展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斯大林晚年已经不信任莫洛托夫，1948年强迫莫洛托夫与其妻（犹太人）离婚，1949年撤销其外交部长职务。1952年莫洛托夫仍然被留在扩大了了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执行局中，实际上却已经见不到斯大林了。莫洛托夫承认：如果斯大林再活下去，他自己就危险了。

斯大林去世后，莫洛托夫重新恢复了过去的职位，留任从22名减少到8名的政治局、重掌外交部、与赫鲁晓夫等共谋打倒贝利亚。1957年，莫洛托夫反对否定斯大林、图谋解除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军方支持下连夜调动军机把亲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开会，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将他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

奇等开除党籍。契尔年科上任后，莫洛托夫才得以恢复党籍（1984年）。虽然苏共把他的党籍从1906年连续算起，但他实际上有四分之一的党龄是以“反党份子”的身份度过的。莫洛托夫也幸存到目睹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当莫洛托夫193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出生）。可以说，没有第二个人比莫洛托夫更有资格见证苏联历史的兴亡了。

苏联解体后，大量西方记者、研究者涌入俄罗斯猎取资料，用英文发表了不少新的关于苏联的报道、研究。但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局限，多数文章仍旧停留在从细节上攻击苏联的层次上。引起人们注目的是前苏联的官员撰写（或由别人代笔）的回忆录，例如国家安全系统的Sudoplatov少将（注1）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前、Kalugin少将关于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的苏联中级官僚生涯回顾，提供了关于苏联政治运行的实际逻辑与演变。不过，他们的级别不高，领域不广，难以从中全面了解苏联。

莫洛托夫在“退休”后有了大量时间读书（虽然他只懂俄语）与思考，但是，如他自己所称：“列宁与斯大林都没有兴趣写个人回忆录”，他自己也没有写回忆录的念头。莫洛托夫晚年的写作仍旧是向苏共中央或苏联报刊写信，要求平反、批判赫鲁晓夫以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向美帝国主义妥协），这令人遗憾。

感谢诗人与作家楚耶夫（Felix chuev），从1969年开始，他成为莫洛托夫的朋友与来访者，与莫洛托夫进行了140次（最后一次是致悼词）平均长达4、5个小时的对话，并作了详细的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莫洛托夫还记得：与楚耶夫的对话》（注2）。

楚耶夫把与莫洛托夫的对话分为四个部份：国际关系、与列宁共事、与斯大林共事、斯大林之后。虽然在某些细节上带有偏见，但莫洛托夫在每一部份都提供了唯一独特的史实与见解。可以说，此书是关于苏联兴亡的最直接见证。

许多进步人士或多或少受托洛茨基写作的影响，主观性地把所谓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截然分开，把苏联的必然灭亡归因于斯大林。莫洛托夫用事实反驳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在镇压反对派方面，列宁比斯大林严厉。捷尔任斯基是在列宁的命令下行动的，斯大林也受到列宁的训斥：“这叫什么专政、这是牛奶加蜂蜜政权，不是专政！”列宁不允许任何反对意见，有些未能完成任务（未按时把粮食从地方征运到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地方干部被就地枪决。我们今天容易想象列宁比斯大林仁慈，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列宁镇压的是敌人，但斯大林镇压的是同志。

但苏联灭亡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包括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等，都是俄罗斯革命的同路人。在布尔什维克与白卫军的内战



期间，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们虽然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却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反对白卫军。实际上，莫洛托夫承认：1921年邓尼金逼近莫斯科，情况危急，列宁召集大家，指示道：“完了。苏维埃政权结束了。我们党又得转入地下。准备好秘密文件与联络方式。”但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者 Makhno 出乎意料地猛攻邓尼金的侧翼，迫使邓尼金撤退，解除了苏维埃政权的危机。

列宁能够带领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确实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才略。实际上，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在一系列政策上反对列宁（包括反对十月起义单独夺取政权）；列宁也很不满捷尔任斯基，不让他进政治局，甚至威胁要开除他。列宁的最大“持不同政见者”当然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拒不担任列宁的副手，公开发表文章与列宁论战。但列宁知道，他缺不了托洛茨基的热情与天赋。当内战期间斯大林问列宁为什么允许托洛茨基唱反调时，列宁回答说：“我有什么办法？他现在掌握着军队！”莫洛托夫回顾道：在列宁去世之前，布尔什维克上层别的人都不可能与托洛茨基共事了；但托洛茨基毕竟有影响，如何处置他一直是困扰布尔什维克的难题。

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政权尚在形成之中，托洛茨基可以依靠党外（以及一小批党内）的社会主义者与列宁就政策展开论争。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面临布尔什维克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主流集团的排斥，为了争夺中统，必须无条件地拥护列宁。但这样使他处于更不利的局面，因为莫洛托夫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中坚份子知道托洛茨基并不是列宁的继承人。

作为列宁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举出许多事例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唯一可以保证苏联生存的继承人。在他看来，无论是清除左倾的托洛茨基、右派布哈林、机会主义份子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还是三十年代后期的大清洗，都是苏维埃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必须选择。换一个形式表达，就是自列宁开始，在斯大林手中成形并膨胀的苏联体制本身就是一个一党专制下个人极权体制。如果我们想到斯大林本人是沙皇统治下的“落后少数民族”（格鲁吉亚）出身，可以想象斯大林本人对于“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并没有多大作用。问题在于苏维埃制度转换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就必然会演化成专制与独裁。这种专制在经历过革命斗争的世代手中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新世代的统治集团被动地放弃（如戈尔巴乔夫）或主动地出卖（如叶利钦）革命成果时，这种专制，对此没有防范机制。

苏联能够持续 74 年之久，某种程度上也是靠外部国际环境促成的。德国的入侵加固了斯大林的统治，美国的冷战政策提供了苏联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合法正统性。莫洛托夫至死认为美苏之间必然爆发战争（支持

苏联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非此不可提供苏共继续统治，以及苏联继续存在的条件。对于党内赫鲁晓夫上台、党外沙哈诺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莫洛托夫不可能反省苏联体制本身的缺乏，反而加强了自己所持的“政治清洗不彻底”的观念。

但第二代以后当政的苏共统治集团不可能像莫洛托夫那样盲目。赫鲁晓夫、贝利亚等斯大林晚年的核心圈子成员深知苏联的危机。贝利亚在斯大林晚年不许其子女与斯大林子女成亲，就是因为知道斯大林死后会被鞭尸；而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非斯大林化”在斯大林死后马上就展开。从此之后的苏共上层的权力斗争摆脱不了两个选择：慢性自杀（勃列日涅夫时代）以及自取灭亡（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严肃的读者会联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重复苏联的历史吗？人们很容易看到在最高权力交替时类似政变以及特殊国际条件（如台湾问题）；但是，从政治体制的核心形式上看，能否在革命正统性、历史性尚未完全消失之前改变一党专制、即形成两个或多个基本上坚持同样原则诉求但采取不同政策，具有不同人事交替功能的政党组织，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前途的关键。进一步说，在目前的、所有带有政治性的反对运动最终不得不与华盛顿的统治集团发生联系的国际政治条件下，中国的“反对党”实际上成了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的代办。很显然，中国的当代政治正在呼唤一个类似于“社会劳动党”这样的政治组织。

注 1：参见赵京：苏朵普拉托夫《特殊任务》札记，《十月评论》，2001 年第 2 期，香港，2001 年 6 月。

注 2：此书 1991 年以俄文出版，1993 年由美国 Ivan R. Dee 公司翻译出版，正文长达 438 页。此书中译本已经在中国出版。

[2001 年 8 月 美国圣荷西]

## 15. 托洛茨基：问题与主义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别人比托洛茨基更具悲伤与浪漫色彩了，托洛茨基问题与托洛茨基主义同时又是现代社会主义历史不可回避的课题。

苏联解体后，我们得以知道许多原始事件的记录，关于托洛茨基的史料总是各个历史学者、相关政治派别的关注对象。尽管用英文出版的文稿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商业方面的偏见与嗜好，我们仍然可以谈到许多新的事实。我想，可以说，关于托洛茨基问题，即关于托洛茨基本人的政治生活，大家各方面的认识越来越趋于统一。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讨论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线索与基础。

例如，负责暗杀托洛茨基的原苏联国家安全部海外谍报局负责人 Pavel Sudoplatov 出版了《特殊任务》(注 1)，关于斯大林如何直接指示刺杀托洛茨基的基本过程与动机已经确定。苏联解体后被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情报公开委员会主席的 Dmitri Volkogonov 利用第一手资料出版了《托洛茨基：永远的革命家》(英译版 524 页，由 Free Press 出版)，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最可依据的史料记载，比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或 Isaac Deutscher 的英文传记都客观、中立。另外，许多西方学者在研究列宁、俄国革命历史尽管带有偏见与政治上的无知，但在诸如“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等具体事例方面也有不少新的发现。

Richard Pipes 算得上西方研究俄罗斯革命、苏联历史的权威。他从列宁的新解密档案中指出：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没有个人的亲密关系，列宁对于托洛茨基的政策性意见多置之不理(注 2)。自称或被称为“红军创建人”的托洛茨基在 1919 年 9 月 30 日写给列宁的备忘录中批评红军对邓尼金白军的战斗失利并预料进一步的撤退，被列宁批注到“神经病”。事实上，邓尼金的后方已经完全空虚溃乱，其军队北上已经到了尽头，一个多月后，就被红军彻底击败了。与托洛茨基相对应，斯大林从来不提出自己的理论或政策，而只是忠实地执行列宁的政策并提出具体建议请列宁指示。这正是列宁所需要的。政策会引起争议、混乱，方法却需要多方面考虑、建议以贯彻政策。在列宁病重期间，托洛茨基平常不去探望，在列宁去世时竟然在南部疗养而没有赶回莫斯科参加葬礼，让斯大林成为名符其实的“列宁继承人”。从这种意义上看，托洛茨基缺乏在一党专政的“列宁主义”体制下的基本政治技巧。

比列宁年轻十岁的托洛茨基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内游离于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只是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才得以返回俄罗斯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十年的西欧放逐、列游(及短暂的美国逗留)中，用外语生活的托洛茨基亲身体会到只有革命在西欧中心(德国)的胜利才能

确保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是流亡期间只局限于俄罗斯革命者圈子内(注 3)、归国后埋头于政权生存的列宁无法产生出来的。



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那时确实需要托洛茨基的天分，在列宁不能露面时，只有活跃在苏维埃的托洛茨基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把苏维埃置于布尔什维克的控制之下。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被赋予最紧迫的外交责任与德国进行为结束战争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插图为了托洛茨基 1919 年在波兰前线)。尽管客观上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筹码，托洛茨基已被证明不适宜行政与官僚的管理而被闲置起来。只是在内战中，托洛茨基的鼓动天才又得到进一步发挥，这是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两大主要功绩。但是，正如托洛茨基也明白到的，布尔什维克以及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准备让一个犹太人鼓动家成为其领袖。在 1919 年 3 月的第八次中央委员会选举上，托洛茨基只是第九名，而斯大林与布哈林并列第二。此时列宁掌握绝对权力，托洛茨基的命运实际上在“列宁体制”下就已经注定。

在承认列宁权威、一党专政尚未确立的条件下，托洛茨基的个性浪漫发展得以控制在布尔什维克容忍范围内。托洛茨基的才能，如果在一个民主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即允许多党制的条件下，以一个反对党的形式出现，可能会表现得更出色。但是，托洛茨基既然本人已经帮助了“列宁主义”一党专政的形成，在这个体制下，他必须显示出比布尔什维克更布尔什维克才有机会在与斯大林等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的争夺权力斗争中获胜。托洛茨基当然没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布尔什维克；同时，我们也不能期待托洛茨基真的会成为列宁主义的“党内反对派”，因为列宁主义体制下已经不可能存在“党内反对派”。真正的苏维埃内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左右派等)、苏维埃外的社会主义者反对派(无政府主义者等)以及非社会主义的各种社会势力(教会等)，已经在内战中被列宁、托洛茨基等从肉体上消灭或瓦解了。实际上，甚至白卫军运动也不是为恢复沙皇专制而兴起的。这致命的后果就是民众(包括一般党员)与政治的分离。当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试图“发动群众”时，没有基层党员与群众对此权力斗争感兴趣。至此，革命的精神已经彻底死亡了。对比今天的俄罗斯政治，那时的即使最右翼的社会主义反对派也显得非常革命。所以，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西方进步人士强烈谴责列宁与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葬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发展(注 3)。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多少接触到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的疑问，但他已经不可能否定自己的错误，更不可能如列宁在世时那样对列宁提出任何异议。例如，在镇压克朗斯塔特水兵起义（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弊端）的过程中，列宁、托洛茨基亲自下令执行，但托洛茨基却谎称这是捷尔任斯基的一手操办，别人无法插手。

相对于比较简单的作为历史的托洛茨基问题，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托洛茨基主义却早已成为（并不能说成功的）国际运动。这已经超越学究范围、不可能也没必要（过早）评议。唯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体制崩溃、毛泽东体制蜕变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衰退中，托洛茨基主义作为突出的反抗全球性政治倒退的一个方向，具有别的任何国际主义不可代替的功能。

注 1: Pavel and Anatoli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Inc. 1994, USA. 赵京：苏朵普拉托夫《特殊任务》札记，香港《十月评论》2001 年第二期。

注 2: R. Pipes, "Unpublished Lenin", V. N. Brovkin eds., "The Bolsheviks in Russian Societ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注 3: 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 Emma Goldman 1921 年回到俄罗斯见到列宁。她吃惊地发现列宁不懂英语。列宁向她表示布尔什维克没有、不会镇压“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1972.

注 4: 作为世界语言大师与无政府主义者，乔姆斯基在美国拥有 MIT 终身教授等头衔，这影响着他在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等时，下意识地以美国主流社会（如纽约时报）为对象、听众。

[2001 年 6 月 17 日 美国圣荷西]

## 16. 无政府主义对普遍政治自由的追求

自由似乎是美国的专利，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对于普遍自由却是相当苛刻的、压制的。在美国的“建国之父”中，最常被提及的是将军、商人、律师和政治家，出身低微的托马斯·潘恩被有意识地忽略了。实际上，比起绝大多数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逃税）而签署独立宣言的富贵人物，只有潘恩通过他的《常识》等简明扼要的宣传才使得“并非不可能”的美国独立愿望成为不可避免、无可阻挡的现实要求。独立后的美国却阻挠潘恩返回美国，表明美国的现实政治制度对于“建国之父”也并不是自由的，更不用说对于黑人奴隶和没有选举权的妇女了。实际上，美国的自由是在美国独立以后伴随着各种斗争逐渐扩展并巩固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内战（南北战争）、民权运动外，至今受到压制的无政府主义也贡献巨大并做出了非凡的牺牲。

无政府主义对于美国自由的激励当然以 1887 年 11 月芝加哥“干草市场”（Haymarket）广场惨案为顶峰，并且永不衰退。那些被无辜绞死的无政府主义烈士宣告了美国司法制度对自由的践踏，同时也教育了后起的自由主义者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对美国司法制度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注 1）。这些自由主义者中最著名的是移民自俄罗斯的犹太人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柏克曼和爱玛·古尔德曼。



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活跃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的移民团体，但直到 1892 年 5 月发生在匹兹堡的数千名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罢工才把柏克曼和“赤恶爱玛”推向了全美乃至世界斗争舞台。为了筹款，爱玛不惜出卖肉体，而柏克曼的廉价手枪未能置卡内基公司总裁于死地，也使自己幸免于死刑（左插图）。

比起在爱玛（右插图）影响下铤而走险枪杀麦肯莱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 Czoglosz，柏克曼认为自己的行动更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在经济利益斗争中采取直接的行动“宣传”）。从原则上讲，无政府主义既然以废除所有强制支配形式（其顶点是国家权力）为志向，也就自然地当以和平为手段。而且，在美国这样的实行初步民主（选举）的国度中，总统只不过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的个人人身不值得成为斗争的对象。然而，这也不能绝对地排除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以牺牲个人去“替



天行道”。例如，刺杀沙皇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个体，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目标。这个理由其实很简明：比起后来的俄国内战、“阶级斗争”、“肃反”等大规模暴力事件来，刺杀统治阶级最高执行者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或代价甚微，而道德感召力更大。事实上，没有刺杀沙皇的壮举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开端。

柏克曼和爱玛的热血应该说比较接近以上刺杀沙皇的道理。那个接替卡内基担任公司总裁的“无名之徒”（按照爱玛的话说，这家伙居然成为英雄柏克曼下手的目标，真是三生有幸）有权直接决定数千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妻小的经济命运，他把工人们全部解雇并赶出了工人住宅。这一切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同时也警告整个贪婪无厌的美国资产阶级。既然美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执行这种正义，柏克曼“以身试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柏克曼特别慎重以免误伤其他任何人，任自己被警卫毒打也不还手。

他们认为自己是“自作自受”，政府不应该由此迫害没有直接参与行动的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表现出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善良天性，同时也暴露出其政治弱点。实际的情况是：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除了对美国公民的压制外，对每一个进入美国的移民如同对纳粹分子、恐怖分子一样，一律警告说：无政府主义者不得入内！当然，任何选择无政府主义理想的人，谁会责怪那些被送上绞刑架、送进监狱的同志“连累”了自己呢？（注2）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中对立已久的两大潮流——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克鲁包特金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自杀，促成了列宁—托洛茨基共产主义派别的兴起与胜利。在美国受到压迫的无政府主义此时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反对美国参战。柏克曼和爱玛等在战争期间被投入监狱并于“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结束后被驱逐出他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注3），再次证明美国的所谓自由，并不如其宪法所宣称的：“保护所有身在美国的人”。（注4）

柏克曼和爱玛在美国监狱中，已经接收到关于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报告，但他们坚持为布尔什维克辩护，认为在帝国主义围攻条件下，列宁—托洛茨基的“暂时措施”即红色恐怖是正当的。他们充满希望地回到革命已经成功的祖国俄罗斯。在回国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们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布尔什维克以外的所有革命党人被处决、流放、监禁，列宁把言论自由嘲笑为资产阶级的特权，等等。直到克朗斯塔特 Kronstadt 水兵事件才彻底击碎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幻想。

被托洛茨基称为“俄国革命的光荣与骄傲”的克朗斯塔特水兵在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时保护了他们，在十月革命中执行

托洛茨基的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果断炮轰冬宫，直接摧毁了临时政府。他们也通告美国政府，并包围美国大使馆，促使美国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柏克曼。所以，当列宁、托洛茨基拒绝克朗斯塔特水兵的民主要求、并通牒他们缴械投降遭到拒绝时，柏克曼呼吁双方冷静并力图调解。列宁、托洛茨基哪能允许任何人用枪杆子向他们提条件呢？你柏克曼只不过是一个流亡人士，哪里有资格调解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铁拳？布尔什维克政权没有伤害他们，把他们礼送出俄国就算是客气的了。

1918年当爱玛仍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时候，惊愕地听到她视之为“俄罗斯革命之母”的老太太 Breshkovskaya 再访美国期间在名流聚汇的卡内基大厅抨击新兴的布尔什维克政权。1921年12月，爱玛和柏克曼黯然离开革命胜利后的俄罗斯，还得承受正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共产主义运动（注5）的责难。据伯特兰·罗素回忆，当爱玛刚抵达伦敦时，各进步团体为她组织盛大的欢迎会，但会后死一般的沉静，没人再理会她了。谁愿意听到一个象征自由、正义的声音责难正处于内战之中的新生革命政权呢？柏克曼和爱玛现在明白了：他们在美国监狱中的时光才是最幸福的人生。他们的生命正是在芝加哥“干草市场”殉难的无政府主义烈士生命的延续而已。

只要这个世界尚有一个奴隶存在，这个世界就是奴隶制世界。同样，只要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或任何人没有政治自由，这个社会就不配“自由社会”的称呼。

注1：在绞刑架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宣告：“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与西方文明之父之一苏格拉底的命运相同。

注2：当我今年被美国移民局官员拒绝成为（任何）一国公民的权利时（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我来美后的活动），我庆幸自己在美国的十年没有浪费。如果连联邦调查局对我都不屑一顾的话，也许我会怀疑我参与的那些追求中国民主、抨击日本右倾·军国主义政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战争的活动可能没有多大的价值。

注3：从美国的移民法角度看，爱玛的第一次婚姻是与美国公民结婚，早已成为美国公民。但联邦调查局为了驱逐爱玛，干脆将已经失踪的爱玛前夫的美国国籍也取消。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仍然拒绝上诉。柏克曼则一直是“外国移民”身份。

注4：日本的宪法倒是赤裸裸的，没有这个遮丑布：它只保护“日本国民”。连日本共产党的章程也写明只接纳“日本国民”。

注5：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诞生才刚刚开始。



[参考资料]

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Alexander Berkman, "Kronstadt: The Final Act in Russian Anarchism," from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Dell Publishing, 1964.

Alexander Berkman, "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from Marshall Shatz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Bantam Books, 1971.

[200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56周年 美国圣荷西]

## 17. 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

二〇〇四至〇五年期间，我受邀为西班牙当代史协会编辑关于中国当代史的专集，与 *Revista de Historia Actual*（当代历史评述）在西班牙 Cadiz 大学的编辑们有一些交流。其中负责网上出版技术的 Rafael Gomez 非常纳闷为什么西方的民主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容忍法西斯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终身统治西班牙直到 1975 年 11 月 20 日死亡。这是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与日本的天皇一样，佛朗哥看透西方“民主”阵营战后需要他铁腕统治西班牙以对抗苏联。正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一样，佛朗哥获得德、意法西斯的军援，但共和国却从英法那里得到“不干涉内政”的保证。1976 年，佛朗哥的残党在得到“不追究犯罪责任”的保证下还政于民，也算是聪明识时务，被亨廷顿声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始。Cadiz 位于西班牙的西南海岸，面对大西洋，邻近摩洛哥，在内战爆发时（从 1936 年 7 月 17 日摩洛哥的殖民军团反叛开始）属于叛乱地域。离 Cadiz 约 100 公里以北的内陆城市 Seville 在内战爆发时也属于叛乱地区。在 Cadiz 和 Seville 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叫 Casas Viejas（卡莎维哈斯）的小村庄，在这里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卡莎维哈斯屠杀”事件。Rafael 告诉我，他奶奶就住在卡莎维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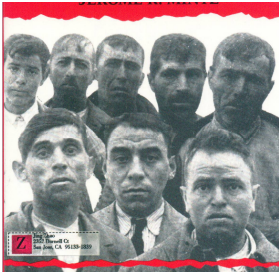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天主教和王权的残酷支配历史，当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激励起民众的共和理想时，拿破仑的刺刀却架在西班牙民众的头上。这也是西班牙产生了最早（在蒲鲁东等作出理论总结之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艺术家 Goya y Lucientes (1746-1828) 的原因（插图为其著名的油画 *The Third of May, 1808*）。



西班牙是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一种主要政治运动的惟一国家（注 1），而卡莎维哈斯被广泛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乡村起义的典型。自 20 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哲学在欧洲传播并在其边缘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发展成长，那些刚刚形成的大都市中的“无产阶级”穷人阶层最容易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激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被初步组织起来的工会自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力量。一九三三年，刚成为共和体制的西班牙仍然处于专制势力（特别是军队）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刚踏上政治舞台的都市劳工和村镇民众又不可忍耐地诉诸政治手段要求改善经济待遇。一月八日巴塞罗那、马德里和 Valencia 等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匆忙之中响应传闻中的铁道工人罢工而起义，认为可以一举摧毁旧制

度，遭到政府的轻易击破，但在卡莎维哈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村民却于三天后袭击警察局，宣布实现自由共产主义。

此时，以 Azana 首相为首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对于各地的来自专制势力和自由共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叛，只能下令镇压，却随各地的警察和军队按其意愿执行。当卡莎维哈斯暴动的消息传到城里，一个中士奉命带着十二名警察先被派来赶到村边。三个小时以后，一个中尉奉命带着十二名士兵和四名警察前来增援镇压。此中尉头一天刚到任，对于本地怀着恐惧不安，本能地感到每一家村民都是叛乱分子。军队和警察们最终在一个烧炭的茅房处遇到武装抵抗，他向省长要求进一步声援，晚上十点时，省长的特使与两名带着手榴弹、来福枪和一挺机枪的下士也赶到了。天色已晚，中尉不想无谓地伤亡，准备第二天天明之后再进攻。此时，另一队载有四十名士兵的车队赶到，这支由一个上尉指挥的军队在出发前一天刚从马德里被调到一个叫 Jerez 的小城去镇压那里的无政府主义抗议活动，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眠了，上尉曾拒绝来自内务部长的电话命令，但被迫带着士兵赶夜路到卡莎维哈斯去平息紧急状况。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原准备与成百上千的武装无政府主义者战斗，现在看到面前的敌人只是躲藏在茅房里的男女老少，杀戒大开，不等天明，立即放火烧燃茅房，并射杀往外逃命的八个无政府主义者。丧失理智的士兵们又报复整个村庄，射杀了另外十二个村民，酿造了震惊全西班牙的“卡莎维哈斯惨案”。



与几乎所有的政府犯下的罪行一样，随之而来的是由受到袭击的乡镇警察和参与镇压的政府官兵对每一户村民的审判，不少村民逃离了卡莎维哈斯，留下的人要忍受此后数十年的敌意和仇视，这是西班牙 Andalusia（安达路西亚）地域无地民工愤怒和牺牲的象征。后来，惨案的真相部分地被揭露出来，相关的官员都推卸责任，说自己没有下命令屠杀，最终导致 Azana 政府的辞职。这个惨案加剧了专制势力推翻共和体制的决心，佛朗哥在叛乱的第二天的广播声明中就声称西班牙被无政府主义和革命罢工摧毁了。在一九七三年至七四年制作放映的《大丈夫佛朗哥》电影中，就描述卡莎维哈斯起义是促使佛朗哥反叛共和国的决定因素之一。可怜的安达路西亚贫苦民众，你们在共和体制下尚不能得到公正，又如何专制独裁（教会加军警）下苟活生存？怪不得那些在佛朗哥死后采访该地的外国人都发现：安达路西亚山民最会撒谎，因为撒谎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本能了。

卡莎维哈斯见证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真髓：希望、叛乱、失败；再希望、再叛乱、再失败……而在这一系列看似循环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制度、人类的文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如果我们看到今天的共和体制在西班牙已经稳固，就是因为西班牙经历了卡莎维哈斯惨案、西班牙内战，特别是佛朗哥独裁反动时期。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政治实践与别的政治力量（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多数派别）有什么重要区别的话，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为了改进社会，常常不回避明显的政治失败。正如西班牙内战的参与者舒奇回顾到：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者遭受各种政府权力的迫害，一生都处于监禁、流放之中，好像一事无成。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许多我们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宪章和许多国度的宪法条文中，政府的权力进一步被制约。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随处可见无政府主义理想里闪耀着芝加哥干草市场、墨西哥萨巴提斯塔、俄罗斯克朗斯达特以及西班牙卡莎维哈斯殉道烈士们的光芒。

注：无政府主义成为重要政治运动，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另一个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乌克兰。以马克诺 Makhno 命名的运动在德军投降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乌克兰之前与白卫军殊死战斗，贯彻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此文主要参照 Jerome Mintz,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也从 Helen Graham, *The Spanish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和 Robert Graham, *Anarch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Libertarian Ideas*, Vol. 1. Black Rose Books, 2005 中得到一些知识。

[2007年1月1日 美国圣拉蒙]

## 18. 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

虽然安那祺主义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地域，但只有在西班牙才成为真正的大众社会运动。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安那祺主义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提供了作为实践的安那祺主义的经验和教训。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起源于1868年巴枯宁派遣来的使徒。与俄罗斯类似，西班牙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遭受国王之下天主教会和军阀、警察、匪徒联合体的统治。在1873年的Cordova议会后，国王Amadeo放弃王位并逃离西班牙。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西班牙于6月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并选出Pi y Margall成为总统。出身中下层的Margall深受蒲鲁东的影响，著书质疑权力的来源：“任何对别人行使权力的人都是暴徒”，“真正的秩序不能靠强制获得”。虽然Margall在从政过程中修正了他的安那祺主义观点，“至今任然被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者视为圣者”（注1）。Margall的共和政府很快瓦解，但联邦/联盟federal和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在1936年，拥有百万成员的西班牙最有影响的工会CNT（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也只有一个专职的书记领薪水。

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两个地域最成功扎根民众：最贫困的安达路西亚Andalusia山区（注2）和最工业化的卡塔罗尼亚Catalonia（以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巴塞罗那为中心）。CNT和西班牙安那祺主义联盟FAI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的成员多数也来自安达路西亚（注3）。1931年西班牙再度宣布共和，经过几度选举变更后，社会主义派、共产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一些地方主义派组成的联合阵线在1936年以34%比33%战胜执政联盟（注4），加上安那祺主义（CNT-FAI）、托洛茨基派（POUM）和一般共和主义派的支持，旧势力在共和西班牙内已经无法回复失地。经过一系列小规模暴力事件后，在摩洛哥殖民地等处的军队开始发动叛乱，引发了内战。

西班牙内战以法西斯势力得胜告终并使西班牙处于佛朗哥将军的专制统治下四十年。独裁者佛朗哥死后，恢复共和的西班牙不得不妥协，保证不追究佛朗哥党徒的罪行。所以，对内战的研究在西班牙本身就不充分（注5），更不用提在西班牙语之外的世界了。在英语世界里，在哈佛大学任哲学教授的Santayana可谓是西班牙最出名的知识分子（注6），但他的保守主义支持佛朗哥（同时也追随美、英的“反共”外交政策），由此可以想象对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研究的贫乏。除了舒奇等安那祺主义参与者的相关回顾（注7）外，原共产国际的奥地利成员Borkenau的《西班牙座舱》（注8）和著名自由主义作家奥威尔的《向

卡塔罗尼亚致敬》（注9）有亲身的记述。Borkenau 后来成为反共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减少他 1937 年就出版的报道，其中涉及许多安那祺主义实践的难题。

一、“1936 年 8 月 5 日晚 11 点，巴塞罗那：除了中央大教堂 Cathedral，所有的教会都被烧毁了。那些教堂的墙还没有垮，但内部已经被完全毁掉了。有一些教会还在燃烧。交通中心附近的意大利蒸汽船公司的大楼也被烧毁了，据说因为有人从那里放冷枪。不过，除此之外，并没有纵火。刚击败军事叛乱时，有人借安那祺之名抢劫，也有旧军人在烧毁教堂时盗走财物。CNT 立即发布公告，这在各建筑物墙上随处可见，对抢劫者现场格杀勿论。实际上，安那祺主义者对于所有教堂财物，包括银行支票，都统统付之火炬，比一般共和主义分子或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者清白。在回旅馆的路上，我看到一个教会的烧毁，非常吃惊。我先以为是一帮为非作歹之徒所为，其实是执行公务。火焰迅猛，有一小批人在旁观看，既不惋惜也没有兴奋。消防队的人也在场，防止火焰延到附近的建筑物，也防止有人进入教会。人们对此都变得麻木、顺从了。”（注10）



这个安那祺主义与教会关系的目击纪实，发生在西班牙刚废除王制的几年内，实际上把教会完全推向叛乱的佛朗哥一边，成为共和政府垮台的致命因素之一（插图为共和主义分子向耶稣塑像开火）。西班牙（包括今天的葡萄牙）教会在十一、十二世纪以来以修道院朝拜起家，积累了大量财富（注11），与王权结合，实施“异端裁判”等等，罪行深重，对其惩罚是不可回避的，但烧毁教堂是不可取的。连列宁都没有烧毁教堂，而是没收其财物拿到国际市场上去换取急需的食物、药品等。实际上，以安达路西亚山民为主的广大安那祺主义拥护者，在心灵深处，同时埋藏着对代表公正的千年王国的盼望，烧毁教堂的不文明行为，把部分没有文化的山民也推向叛乱势力。2004 年 11 月，年过八旬的墨西哥南部的贫穷省恰巴斯 Chiapas 原主教 Ruiz 访问加州，我们参与接待了他，与他有过短暂的交谈。他在主教任职期间获得原住民信任，调解萨巴蒂斯塔民族解放军与墨西哥政府之间的谈判，被认为“偏向”原住民（注12）。墨西哥政府连续三年迫使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放弃授奖给 Ruiz，声称那对墨西哥是耻辱的，并威胁如果 Ruiz 获奖，将撤毁对原住

民的承诺。我从他身上感受到西班牙语世界中天主教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注 13）。

二、“8月6日：到处是代表各政党和工会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如 1934 年的奥地利那样）由各工厂直接选出的苏维埃呢？CNT 有能力决定是否建立苏维埃，如果 CNT 愿意，社会主义党 UGT 等无法阻止。我意识到 CNT 已经通过强大的工会组织控制了工厂，如果举行苏维埃选举，只会让别的政党也到工厂去（试图）分享力量。其实，在俄罗斯，共产党人在通过政党掌握权力后也对苏维埃不感兴趣了。”（注 14）

“8月8日：安那祺分子的暴力不限于它的敌人，昨天它也攻击 POUM（托洛茨基派）。当 POUM 的军事组织带枪召开一个常规的会议时，武装的安那祺主义者乘卡车赶到，在会场门口架上机枪，解除了 POUM 的武装，宣布在此地没有必要让 POUM 从军事上威胁 CNT 的支配地位。POUM 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注 15）

不过，在军事这个权力行使的实质问题上，很难只责难安那祺主义者。实际上，由于苏联是共和政府的唯一实力支持国（提供包括飞机等重武器），到处都流传着“俄国人做主”的说法。俄国人顾问不到两千，但控制重要的位置（例如巴塞罗那电台、武器生产部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通过 NKVD（苏联秘密警察）先把托洛茨基派赶出去，再下一步，在 12 月 12 日的《真理报》宣称：“在卡塔尔尼亚，清除托洛茨基分子和安那祺分子的行动已经开始，并将以在苏联同样的能量展开。”更可悲的是，当西班牙社会主义党头目自以为是“西班牙的列宁”时，俄国人认为他们不如外国去的共产党人可靠，由这些不懂西班牙语、秘密行事的苏联警察（其头目、驻西班牙大使 Rosenberg 本人其实也不被莫斯科信任）操纵的共和联合政府，怎么可能与西班牙职业军队作战？

此外，如何组织军队，也对安那祺主义提出挑战。佛朗哥发动叛乱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共和政府宣布废除常备军，断送了佛朗哥及其手下的职业军人的前途（注 16）。面对这样的职业军事叛乱集团，共和政府是否创建职业军队以及由谁指挥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回顾起来，西班牙内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势力的德国、意大利马上支援佛朗哥（插图为毕加索著名的德国 1937 年轰炸格尔尼卡壁画），



但英、法等“自由民主主义”国度则采取“不干涉”的观望态度（法国的社会党政府在最初曾支持过但很快放弃了），而支持共和政府的苏联（以及墨西哥）力量不足，又带有狭隘的“保卫苏联”的政治意图瞎指挥。与巴黎公社的命运一样，西班牙共和的命运也难以有不同的结果。除了共和政府内部社会主义派别之间的不合作（未能建立广泛的苏维埃式联盟），社会主义组织与资产阶级共和政党之间的对立（未能组建有效的军队等），暴力销毁教会等教训外，还有不成熟的实验（如农业合作化、废除货币的交换等）。尽管如此，短暂生存的战时共和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注17）。兴许，共和西班牙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法制改革试验，正如安那祺主义者法务部长 Oliver 在 1937 年 1 月 3 日演讲的那样：“我们不是要废除法案和律师，但事实上律师太多了。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常时，没有偷窃和杀伤的必要。在西班牙的历史上，让我们首次宣布：一般违法者不是社会的敌人，他更是社会的受害者。”“法律是如此敏感的事务，我们只能用人的心去解释它。”（注18）

这就是安那祺主义的精髓：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自由意志遵守、接受的基础上。与所有安那祺主义运动一样，西班牙内战中的安那祺主义实践也由于主客观、国内外的因素没法达成这一理想，更悲烈地演示了希望、崛起、抗争、失败、绝望、再希望的过程。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对“如果社会主义错了，欧洲不需要社会主义”的疑问，回答道：“那就意味着野蛮倒退。”今天，我们更面临着文明还是野蛮的选择。在“全球化”的今天，当腐败的国家权力与欺诈的跨国界资本勾结，支配全球时，也只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制约，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安那祺主义的理想。

注 1：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71 页。这一段历史简介多来自此书。

注 2：见作者的“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萨维哈斯惨案”，比较政策评论第 11 期 2007 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7/casasviejas.pdf>。

注 3：例如，1882 年在 Seville 召开的安那祺地域联盟会议，代表近 5 万成员，有 3 万来自安达路西亚，1 万 3 千来自卡塔罗尼亚。引自 Gerald Brenan, *Anarchism in Spain*.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382 页注 13。

注 4：[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ivil\\_War](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ivil_War)。



注 5：许多内战后逃到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国度的共和派人士发表或出版了不少回顾，他们多少促进了南美学术圈的激进化。曾在墨西哥大学留学的 Hobbs 律师告诉我，他的人文科教授们几乎都是马克思信徒。

注 6：<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santayana/>。他虽然只在西班牙生活 8 年（另 80 年在波士顿和罗马），却一直保持西班牙的国籍。

注 7：见笔者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与思考”，比较政策评论第 7 期 2003 年 <http://cpri.tripod.com/cpr2003/souchy.html>。

注 8：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注 9：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alonia*, London, 1938. 我没读到此书。

注 10：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 493-494 页。

注 11：其修道院或教会的艺术建筑本身也是价值连城的艺术品，例如最广泛使用的英文教材 Marilyn Stokstad, *Art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1995 第 523、526 页。

注 12：参见笔者译文“战争状态下的恰巴斯”，《十月评论》1998 年第 4 期。 <http://cpri.tripod.com/cpr1998/chiapas.html>

注 13：我 2004 年圣诞节期间访问墨西哥城，也感受到民众对宗教的盲目崇拜。见我的“墨西哥之旅随感”

<http://cpri.tripod.com/cpr2004/mexico.pdf>。

注 14：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 497-498 页。

注 15：Franz Borkenau, *The Spanish Cockpit*. Marshall Shatz ed. *Essential Works of Anarchism*, Des Plaines, Ill: Bantam Books, 1971 第 508 页。

注 16：1973-74 年在西班牙制作的电影《大丈夫佛朗哥》就是一个证明。其中也提到卡莎维哈斯惨案作为职业军官们叛乱的理由。

注 17：例如，1931 年全西班牙只有 3 万 7 千名教师，但 1937 年新开了近千所学校，在共和西班牙就有 6 万名教师。1937 年，天花等疾病的预防注射在共和西班牙也得到全面推行。见 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518-519 页。

注 18: Hugh Thomas, *Anarchist Labor Federation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rving Horowitz ed. "The Anarchists,"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4 第 520 页。

[2008 年 9 月 28 日 美国圣拉蒙]

## 19. 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舒奇的传奇生涯

奥古斯丁·舒奇 Augustin Souchy 是二十世纪传奇人物之一，可惜，他的事迹和文章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世界外几乎无人知晓。1992年，芝加哥的 Charles H. Kerr 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列奥·瓦尔丁格 Theo Waldinger 翻译的舒奇自传的英文版，极大地丰富了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宝库。

舒奇出生在十九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员的工人家庭。这使得他在参与“主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同时认识到其局限性。主要在 Gustav Landauer 的影响下，他接受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意识到：社会民主主义局限于政治领域里的斗争，实行从上到下的“民主集中制”，受限于社会条件（如“爱国主义”等）的制约；而无政府主义更关注社会公平与个人自由，把自主权置于基层（主要是工会），不理睬人为设定的国界对人们的区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明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舒奇逃到中立国瑞典从事反战运动。这个时候，另一股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势力——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异军突起。

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无条件地支持俄国革命，但推翻沙皇和临时政府之后的俄罗斯内战却分裂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制，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怪物！舒奇于一九二零年以德国自由工人联合会 FAUD 代表的身份应邀访问俄国，用半年的时间亲身体会、目睹了俄国革命是怎样被出卖、利用的。

舒奇目睹到所有俄国的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被肃清、关押、流放或处死。当他被列宁召见批判他的“小儿幼稚症”时，他禁不住暗自责问这个新沙皇：“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奋斗牺牲，特别是克朗斯塔特的无政府主义水兵在关键时刻起义炮击冬宫，你列宁还在外国流亡呢！”当他要求列宁释放无政府主义者时，列宁教训他：“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他们不承认革命的国家政权，他们必须被当成反革命来镇压。”

舒奇被作为德国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但他明白共产国际的目的是布尔什维克为了控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设，除俄国之外的组织不但没有自主权，连请求释放同志的权利都没有。托洛茨基在第三次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痛斥法国和西班牙代表们：“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要求释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反革命匪徒？”这使得舒奇与许多到俄国来支持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很快就被迫离开了俄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当他访问古巴、南斯拉夫这些列宁主义一党专制的国家时，他受到热情接待，因为他是唯一受到列宁亲

自教导的老革命！这使舒奇不由得承认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共同斗争，列宁与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是 tovarish (俄语“同志”)。舒奇很遗憾地终生期待着：列宁采取的一些短视的、仅仅是为了保住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手段只是暂时条件反射，俄国革命应该回到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宗旨上来。

当列宁主义演化成斯大林专制时，舒奇知道在苏联指挥下的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已经不是“同志”了。斯大林在国际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出卖最先体现在西班牙内战上，而舒奇正是西班牙内战革命阵营的对外发言人之一。今天，我们已逐步地认识到，舒奇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提供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大致情节是正确的：一九三一年以后成为共和国的西班牙联合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佛朗哥将军如果没有德意法西斯政权的军事援助就不可能发动叛乱；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特别是炮火等重型武器）的处于少数地位的西班牙共产党如果放弃“布尔什维克策略”（单独夺取政权）而服从联合政府，佛朗哥的叛乱是可以被击败的。现在，通过舒奇等人的文章，我们知道，应该赋予只有短暂五年历史的西班牙共和国以象巴黎公社那样的地位。特别是今天，在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政治势力都退出政权时，西班牙共和国实践的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组织形态是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舒奇的生涯自然是其自传的精彩内容（例如他三次自愿或被迫在拉丁美洲生活和工作），但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二十世纪重要历史的思考。除了列宁主义及其延伸的古巴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所谓吉拉斯 Milovan Djilas 的“新阶级”论）外，舒奇也试图在墨西哥、以色列社会中找到非集权制的、非官僚化的社会主义组织方式。他的结论是：当然，这个世界离我们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但无政府主义者许多先驱性的诉求，甚至包括计划生育，已广泛地获得认可。可惜舒奇没能亲眼看到苏联的解体和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以无政府主义为主导的反抗运动。与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形势相似，无政府主义再次成为挑战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可能体制。

在挑战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恐怖”手段曾经被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使用，因而使其成了国家权力镇压无政府主义的借口。舒奇很幸运地与三位国际著名的“恐怖分子”交往，对此问题也有深切思考，值得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借鉴。

亚历山大·柏克曼 Alexander Berkman 是舒奇交往的“恐怖分子”之一，他出生于俄国，十八岁时移民到美国。在这里等待他的不是新大陆的梦想，而是十二小时工作制下的低工资且无医疗、退休保障。更激愤这个青年的是：一八九二年卡内基钢铁厂雇佣私人保安枪杀手无寸铁的十二名罢工的工人和儿童，却没有受到正义和法律的制裁。在社会丧失

了维护正义的功能时，个人就应该挺身而出，“替天行道”。二十二岁的柏克曼长途跋涉，赶到卡内基公司，连开三枪射击公司主管。事实上公司主管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柏克曼却在被捕时被打昏过去，并被判处十四年徒刑。舒奇一九二〇年在俄国时遇到柏克曼，并与他一同去见列宁。共产国际的书记拉狄克要求柏克曼将列宁的文章《左派共产主义的小儿幼稚病》翻译成英文，柏克曼提出要附加一个后记。列宁拒绝了这个条件。列宁提出资助柏克曼和另一位著名无政府主义女战士古尔德曼 Emma Goldman (也是从俄国移民去美国的，因反战被投入监狱后遣返回俄国) 回美国开设共产国际支部，遭到拒绝。

舒奇结识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 Buenaventura Durruti (刺杀西班牙国王) 和从俄国移民到阿根廷的 Simon Radowitzky (刺杀警察局长) 基本上与柏克曼一样，都确信在自上而下的正义以及集体意识不能履行的时候，个人意志就应该自下而上去执行正义。舒奇特别指出：与统治阶级的日常性压迫、榨取和列宁主义式的全面暴动、镇压相比，无政府主义的“恐怖主义”只是针对个别直接镇压民众的刽子手。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行使暴力手段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在抽象的社会主义理念驱使下铤而走险，很少有集体性的组织行为。应该说，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恐怖主义”并没有越轨，仍然从属于“建立一个非暴力的社会彻底取代靠强制和镇压维持的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舒奇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会欣慰地看到：社会毕竟有所进步，依靠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恐怖行为去牺牲个人的必要几乎已经不存在了。无政府主义就是和平主义。

当狭隘、只局限于政治斗争、特别是最高国家权力争夺的列宁主义及其变种——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主义等退出历史舞台后，关于人类组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上的分歧与论争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选项，具有更现实的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专注于政治运动(包括武装斗争)的正当性，但政治运动不可能代替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正如笔者逃离日本前夕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同志们在确立新的行动原则所确认的那样，不能因为理论上的分歧障碍与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包括一些斯大林、毛泽东的追随者)在实践上的合作与互助。为了社会变革，让我们回到第一国际的共同旗帜下吧！

[2003年10月23日 美国圣荷西]

## 20. 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人权就是人权，既没有什么来源，也不需要任何来源，不论它叫君王、国家、还是叫什么教会、政党，或者称为“理性”、“良知”什么的。确切一点，可以把人权定义为：在现实的社会契约状况下仍然保有的属于个人的自然权利。或者，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不可分离的，因为人就是社会性（即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政治性”）的动物。

为了清楚一些地说明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有必要借用物理学中的“理想试验”的方法，即把实际中必然存在的物体（如空气）排斥在外，只讨论相关物体（如苹果与地球）的引力关系（重力加速度 $g$ ）。这种基本的科学认识的方法，与牛顿同时代的卢梭、霍布斯已经做过了。而他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给“理想实验”中的每一个人都赋予了完全平等的权利和资格、设定了完全相同的条件，由此我们首先可以断定：人权的本质就是作为人的平等权利，为了个人的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契约、建立社会。但是，社会一旦建立，人就面临着各种不平等的社会条件的制约，而在不平等的社会中仍然必须保留的每个人的平等权利就是人权的自然属性。例如我们可以举出生存的权利、信仰的自由、以及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等等。请注意，任何最基本的自然属性都离不开社会属性的制约，人当然要生存，但他一出生下来能离开父母吗？人类的进步就是指自然属性得到更大发挥的过程。

关于人的自然属性没有多大的异议，人权一词之所以成为热门的国际政治术语，乃是因为其社会属性太复杂、丰富。人权本身是一个整体，其社会属性不过是自然属性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的具体要求和表达而已。在古罗马隆盛之后，以法律制度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这个文明就开始区分“罗马法”和“自然法”（也称“万国法”）的不同，因为行省的外族人必须用新的法律去统治。行省的外族人享受不到罗马人的权利，但也该享有一些“自然”的权利——当然，这些“自然”的权利也是罗马人认为是“自然”即天赋的，实际上还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限制的。关于人权的自然属性尽管争议很多，但可以指出：拥有私有财产是人权社会属性中最重要的因素。

偶然拜读严家其先生的《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除了对其文的“人赋人权”这样的用词感到不便外，此文中最大的错误就是把财产权定为“天赋人权”（即本文中所述的人权的自然属性）。我估计，恐怕是受民主中国阵线纲领中“发展私营经济”原则的影响。我个人对这一条敬而远之，免得受到经济学者的嘲笑。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形式的私有财产都是通过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关系获得的。既然人类社会本质上

就是程度不同的人对人的支配、压迫、欺骗关系，任何形式的“合法”所得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罪恶的社会属性。说的更准确一些，财产的本质就是盗窃，虽然在现在社会中，又被统治阶层加上了强权（其本质是抢劫）和名誉（其本质是欺骗）的装饰。当然，从概念上区分出私有财产是人权的社会属性，丝毫不意味着私有财产就不该、不必受到社会的保障。恰恰相反，人类发明了一种叫做法律的强制性契约形式来保障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个人的社会属性。我们知道，靠刺刀、炮火推行于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法典》，就是把私有财产从教会的任意掠夺中以法律保护起来。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到圣赫拿岛还能自嘲的就是这部《法典》：“我指挥过四十多次奥斯特里茨那样辉煌的战役，都被滑铁卢一役冲毁了，只有《法典》是永存的。”如果说人权是否受到尊重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的话，人权的社会属性的保障程度就是最明显的“晴雨表”。

人权的社会属性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于其每一个方面的论述又都必须联系具体的社会关系，我在此想以中国的情况略为分析一下人权的社会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主权中的个人人权属性。兴许，只有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得到人权保障的真正的中国人才能弄懂人权与主权的区别：人权是主权基石，一个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国家谈不上主权的尊严。由此可以推论到：只有在日本为维护中国人的个人人权斗争的人才是真正的维护中国主权的爱国者。有时候，读到有些成为美欧的二、三等公民的中国人写着“人权高于爱国主权”之类的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在日本，中国人的人权与爱国主义就是同一个本质。

为什么说人权是主权的基石呢？因为个人的人权是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的，但国家主权却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的形态总是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权国家”是指近代以来，伴随产业革命（英国为代表）和民主革命（法国为代表）而确立的，以民族（语言、信仰、地域等等）为单位形成的“国民（或民族）国家”。苏联的消亡表明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国家形态的失败，其中的内部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保障“主权国家”内的个人的人权。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曾经有过不少国家形态的变化，之所以在现代形成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民族国家”的形态，也是因为现代社会中保障中国人个人的人权的要求，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为了保障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人权，我们才同意组成以民族、地域为单位的国家：像苏联那样，当这个国家成为侵犯人权的暴力机构时，我们没有必要承认它，它也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对于中国的情况，我们必须防止苏联消亡的结局，使共产党上层集团的变动不至于带来共产党全体的解散，使共产党的解散不至于带来政府的解体，使政府的解体不至于带来中国国家的消亡（否则，我们留在日本的中国人首先就丧失了一切）。

由于中国的国家主权没有被正当地用于中国人人权的保障，才使得在国外的中国人的“国际地位”甚至不如伊朗、菲律宾、玻利维亚。例如伊朗人三个月内来日本不需签证，但中国学者来日本出席、主持国际会议，十五天的入境签证也必须有日本人的“保证书”！那么，我们会奇怪：拥有核武器、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又对日本有如此之恩义的中国主权跑到哪里去了呢？试想，如果周恩来总理先生来日本时，也被要求出具日本人的“身份保证”，他还会出卖民族大义宣布“放弃战争赔款”吗？正是由于缺乏人权的基石，中国的主权才不能得到维护，更有甚者，中国的主权被不当地用于向日本人“施压”来迫害中国人，使中国再次面临丧权辱国的危机。

去年十一月初，北京的国务院政府发布了一个《中国的人权现状》白皮书，就是一个以国家强权抹杀个人人权、曲解国家主权的例子。理解其文为什么贯穿着“强权就是真理”手法的关键首先就是概念：此文并不是论中国人的人权，而是完全抛开人权的自然属性，提示社会臣民所可能有的“人权”。我们知道，白皮书中所指称为“人民”的不包括地、富、反、坏、右，也不包括政治犯，随着时代的不同，甚至连国家主席也不是“人民”。“人民”的资格是人权可以剥夺的，也有的人干脆反感“人民”这个词，我们看到：去年有许多国家名称中的“人民”字眼儿被取消了。但中共政权对于他们称的“人民的敌人”是不讲人权只讲专政的，连呼吁人权的自然属性也会被剥夺自身的人权。共产党政权先把“敌人”排除在“人民”的范围之外，就可以永远伟大、正确地宣布它受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的支持了。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指政府的臣民。

其次，就人权的自然属性而言，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哪一项不是中国公民通过自身的奋斗、牺牲换来的呢？包产责任制是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首先施行的；提到差额选举，笔者一九八三年就是因为反对清华大学校方当局当时控制学生会选举、反对等额选举而被撤销了中共党员预备资格，毕业时被发配边疆。一九八四年以后实行的差额选举怎么能说是政府当局的赐与呢？

当然，我们在这里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维护人权的奋斗，陈独秀先生可以被称为中国人权运动的先驱。而他晚年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其“平民思想”，又表明人权在中国的艰辛。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运作的困难，为其每一个微小的成熟之处，包括此白皮书的公布，表示应有的热情，因为本身表明了中国八九民运对人权的追求不可能被镇压或出卖。中国的人权运动在追求社会性方面的意义，在于它完全与拯救祖国危机的事业的结合，也就是说：人权活动家通过对个人的人权来争取全体中国人人权的改善。这对一些以反对“人权的双重标



准”在从事他自身的“人权”地位的社会人士们，也应该是一种启示，一种反省。

[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5月]

## 21. 个体人权的尊重与民族主权的平等 ——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

今年九月，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域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部分地域，中华民国被迫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也正好经历了二十周年。今天，当我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危机首先在于政治方面的限制，即北京政府（以及二十年以前的台北政府）、东京政府都竭力阻碍中国人个人（不论其是否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中华民国护照”，或根本被这两个政府剥脱了护照资格的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八九中国之春之后，笔者经历的大量活动表明日本政府除了“保护”极个别者以作日本政府官方的鹰犬之外，对在日中国人进行了各种劝诱、胁迫，甚至连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也不予承认。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府手中的筹码“日本天皇”如何成为北京、东京政府的玩偶，更可认识到政府之间的“中日关系”于两大民族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益处。本来，正如日本共产党的申明所严正指出的那样：没有选举权、只不过是花瓶摆设的“日本天皇”根本不应该成为两个政府间利用的工具。如果那一对夫妇想与广大的日本国民一样去逛逛长城，在兵马俑前开开眼界也并非不可。找一位中国人邀请、担保一下，同时不要忘了为其畏罪不敢前往的老父向中国民众认个罪，肯定不会有什么难堪的。正因为“日本天皇”没有、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价值，他们夫妇也可以去韩国、台湾、香港等处走动一下，总之，这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兴趣管他们如何活动，却不得不关注他们被政治利用所从事的与其身份不符的活动将为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外交活动的展开常常得出违反普通人常识的结局，不过，只要我们盯准利益的主题，一切疑惑就会解明。如果老天皇不敢访中是由于自知罪大恶极怕遭报应倒可理解，其实，凭中国人的天性，倒也不会教训他的（他去韩国必死无疑）；但是新天皇“上任”以来，第一件仪式就是应该由其主动提出访中谢罪才是人之常理。这种“人之常情”却没有发生在中日关系上，表明了中日关系并没有正常化。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由全体中国人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也就是说，中国至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式的国民国家。台北政府自不用提，其首脑连过境日本都不被允许，而自称有资格“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北京政府在二十年前为了求得日本的外交承认，竟卖国到放弃战争赔

款的地步，今天又“连续七次以首脑之尊”（日本报道）邀请“天皇”访中。更不可思议的是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知，连江泽民会见“天皇”时发出邀请也不给面子。当然，这是因为北京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使自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有的尊严，在目前在中美关系的政府级别尚没有正常化之前，处于求助于日本政府的劣势，对于日本的傲慢只得忍气吞声。当然，我们对于今后北京政权如何回报今天日本政府的非礼并不感兴趣，只是要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以为在北京政权今天的处境中放出“天皇”的筹码去中国逍遥一圈就可以自吹自骗说“彻底了结了中日之间战争的历史”；如果我以将来的民主统一中国的立场来看，“天皇”的访问，严格按法律讲来，还是“非法入境”呢！不过，我们中华民族，非但过去“以德报怨”，今天同样“以恩报罪”，不会像日本政府那样，竟然逮捕乘船来日本的和平、善良的中国公民！

当然，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语），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虽然，今天，中日关系的主流基本上由北京、东京政府操纵，被栓绑在二十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政治交易之中，但不论从历史、文化、地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近代以来，在中日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抗争，无非是要求“平等待吾”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危机首要地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危机上，以是否“平等待吾中华民族”为心理基准，我们在对欧、美、日列强失望之际曾对苏联抱有幻想。不过，自以为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苏联也没有维持住在中国的势力，丢掉了“老大哥”的称号，这个简单的事实，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解释，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以此可以顺便提醒今天日本政治势力中各种“反共”、亲北京政府、亲台北政府的集团：你们以中国的政治情况达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的，如果以日本的政治力量达到在中国的政治企图是不会再得逞的，中国人集近代史悲剧的经验，就是坚决反对日本的任何政治势力的介入，特别是扶植中国的代理人、卖国贼的殖民旧习，更可能会带来日本的彻底毁灭。关于这个观点，让我们把中日关系的起点追溯到远远超越二十年前周恩来或四十年前张羣的时代，直接地从孙文开端吧！顺带想提请的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最好不要用日本人的姓氏“中山”二字。

孙文曾经在对欧美列强失望之余，无可奈何地对大和民族抱有最终的乞求，甚至不惜牺牲某些明显属于民族主权的尊严，留下了至今为止的

中日关系的阴影。我们至今没有心思苛求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的孙文的选择，他本人最后在日本（神户）的演讲已经彻底表露了他对日本的绝望并对自身在中日关系上的行为进行了清算。按照崛川哲男教授（他是我遇到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少数日本知识分子之一）的研究，叫“双手葬送了自己培植起来的中日关系”，此后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可称中日关系上抗日战争期的开端，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帝国的全面投降。我们从这一段期间的中日关系演变中看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某种方面承袭了孙文对日本的幻想，也更加看清了日本对华政策力图扶持什么样的中国政治势力。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客敢称自己是“亲日派”，而“亲日=卖国贼”也已成定论，这大致是因为日本的任何涉入中国事务的政治势力绝不肯平等待吾中华民族，更不会在人格上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什么平等，对于卖身求荣的亲日派总是当奴才、鹰犬来使唤，无论其放出的是堂皇的“满洲国总统”，还是今天的“某某大学副教授”这样的残饵。今天，当我提笔之际，正好传来日本法西斯投降四十七周年纪念（也是南北朝朝鲜独立、解放纪念日）的钟声。温故知新，我们不得不严正提醒日本的政府和国民：承袭殖民侵略的对中外交政策的日本如果再挑起战争的话，只会带来一个结局：日本的彻底毁灭。

正因为日本整个民族的几乎所有势力（日本共产党除外）都参加了对吾中华民族的集团犯罪，所以很反感、很害怕我们谈历史。那么，我们既然以德报罪，更干脆按照神的旨意，饶它个“七七四十九”次，彻底假设中日之间完全没有历史的交流，在这样的“理想试验”中，中日两大民族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当然不会超出中国人、日本人都是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这么一个基本事实，而关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西欧人的思考是正确的：不论是卢梭、霍布斯，都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契约关系，其首要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也是自《圣经》以来“天（上帝）赋人权”的近代翻版。这个简单的生活道理，对于接受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开创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大和民族来讲，丝毫不难于理解。我们再准确一些，指出人类历史、地球社会上活动的主题都是个人，而教会、政党、国家等等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附属产物，就可以得出国家（政府）不得剥夺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的结论（首出于穆勒《论自由》）。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日本侵略军在屠杀中国、亚洲的民众时，也没有区分其是否是某一特定政府（如重庆政府）的“国民”，也就是说，发生的事实是日本人政府与中国人个人的关系。所以正如最近那些韩国的军妓纷纷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日本政府再野蛮，也不能以什么“旧金山和约”、“日韩条约”等不公平的政府间交易中已经解决为借口充耳不闻。那么，我们谈

及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基于中国的每一个个人与大和民族的每一个人的交往，当然，这些人之中有过好几个政府，这些政府的功能，只应该是帮助处理好个人之间的关系、纷争，也包括个人对政府的要求。

回到现实国际政治中来，我们越来越明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很狡猾地利用了中国（和韩国等地域）的两大严酷的缺欠：（1）国土的分裂；

（2）政府的专制、独裁。严格讲来，当中国处于内战、分裂状况的环境下，任何政府级别的对日关系都是单方面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没有权力宣布全中国民众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正义原则。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由于民众意识的觉醒，已经开始要求日本对民间赔偿，北京政府的钱其琛外交部长声称“政府不干涉这种行为”表明了它的务实性，因为任何种类的政府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暂时性选择，我们可以理解二十年前周恩来先生的精明，但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的惟利是图的环境下，仍然僵守死去者的诫规就是今天李鹏政府智商的倒退；当然，中国政权的某些权势竟然利令智昏，以“老子放弃了赔偿，你该为老子效力”的心理，而利用中华民族的灾难向日本政府要求迫害中国人，彻底暴露其把一党之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王朝残念，只会把共产党引向“大清王朝”的结局。

日本政府虽然一时计谋得逞，声称“除北朝鲜之外，已经清算了战后处理”，但从韩国的反日情绪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以及它实际上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威胁数万在留中国人的行径，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奴隶娃子没有退路”（罗炳森将军语）的意志。如果有一天，真有一个国际法庭宣判日本国干涉中国内政、侵害中国人人权的话，笔者将第一个进行诉讼。日本政府口口声声“反省过去的历史”而不愿承担其在巴黎西方首脑会议上、在其国会上的“保护中国人留学生”的国际义务，却勾结北京政府迫害那些不认同北京政府屠杀政策的中国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大野蛮行径只会引导我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在日本几十年前的残暴中去联想：日本今天的对中政策、对亚洲政策与几十年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一年前，让我们每一个仍然爱着自己的中国同胞的人平静地为那位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国女性着想一下吧！或许，几十年前，绝对是非法入境的“日本天皇”的军队闯进中国烧死、活埋了她的祖父辈亲人，那些杀人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按照日本政府的强盗逻辑，是因为代表、统治她这样的普通中国民众的两个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惩罚侵略军的要求！从笔者个人的体验来看，当时正在小学三年级，听到田中访华的消息，绝没有任何念头，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祖父辈提及战争赔款之事，这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天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很不好意思提及这样的有损吾中华民族尊严的课题。但是，日本人却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这位女性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绝对不会对日本带来任何危害地踏上日本土地时，却被日本政府抓进收容村、剥夺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强制遣送到北京政府的监牢里！如果说，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竟然干涉中国内政到这样的程度：它认为北京政府有权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所以才帮助北京政府迫害善良中国平民，那么，中国民众（只有中国民众才有权要求战争赔款！）再善良，也不会愚昧到同意北京政府的卖国外交来迫害自己的程度！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实质就是：日本本来应该付给中国民众的赔偿的一部分残羹，由日本政府用于贿赂到北京政府手中了！这可以很明瞭地理解今天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平民被日本政府逮捕（没有护照就可以抓人？）、歧视（什么“不法在留”、“伪装难民”）、迫害（笔者曾截获一国立大学的警告：再搞政治活动就准备以“修业见こみなし”即“没有完成学业的可能性”开除学籍便于日本政府强制遣送）等等，而周恩来却被“中日友好人士”们大吹大捧，日本人怎么不感激周恩来呢？在这一点上，北京政府远远不如汉城的独裁政权，但今天为韩国的工业发达赢得五亿美元资金的《日韩条约》也成为韩国人心中的不公平的卖国条约。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人，其政权虽独裁却可称爱国，当时日本人狡猾地提出“物质支援”，送一些轿车、电视机，一方面收买韩国上层（因为平民根本不可能有此奢侈品），同时又控制韩国的工业（因为其部件、技术最终必须依靠日本），却被韩国拒绝，至今不进口日本的汽车。推想中共当局前几年大量进口轿车（据报道，四川省进口轿车的资金竟然高于教育投资），并不是比韩国政府愚蠢没有看出日本政府的计算，乃是丧失了民族尊严，趁自己官位在手大捞一把而已。

再来看看前不久日本国会违反日本宪法通过的PKO海外派兵法案，如果日本真的脱离、清算了其殖民侵略的本质，在今天的世界上派出军队到外国去，这是日本的内政，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但是，日本政府连在日本国内的受迫害的外国人都不肯平等对待，那些已经是第二代、第三

代的朝鲜族日本人、汉族日本人至今被歧视没有国籍，把政治犯押送到专制政府的牢里的同时，其派出的军队，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绝不可能是为了和平、救援人道等等的目的，而只是逐步地增强其军事存在，最终依靠其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反过来又以军事实力谋求践踏世界和平的一国经济利益，其结果只会引发全球性的、全面性的纷争，在毁灭日本自身的同时也导致人类文明的完结。从拯救日本、保卫人类文明的意义上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真正为中日友好忧虑的人，都必然会反对任何海外派兵政策、反对一切政府间的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径的，因为与这种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国家恐怖主义相比，“血光敢死队”这样的因受迫害无处申诉的“恐吓组织”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谴责的是那些逼使善良平民去铤而走险的国家政府的犯罪。按照平等的原则，既然日本政府可以抓捕乘船来日本土地的中国平民，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逮获乘机闯入中国神圣国土的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日本人——因为他们在我们未来的合法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法律里也是非法入境的。当然，我们不以日本人的逻辑对付日本人只是表明了中华文明高于大和文明而已，无它。但文明的高下并不能影响所有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个人的人权平等，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东京《民主中国》1992年10月]

## 22. 社会改进党人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展望

至今为止的一段时期里，社会改进党人或日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以及广泛的中国民主运动运作，保持着相当的沉默。

我们无意独立于中国民主运动，我们一如既往地承担起中国民主化的前卫牺牲，我们甚至不愿付出必须的代价阻止进一步的背叛与出卖。展望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不得不告示我们的历程与方向：纯粹地执着于由八九年民主运动中彻底表露出来的人格感召精神，任由任何政治势力集团利用其外延影响。这也是社会改进党人与别的民主运动同路人的唯一区分。

当今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进运动，无非是重复先行者们在人类历史上所付出的牺牲：启动俄国革命、唤起中国革命、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对新形成的美洲大陆国家注入彻底自由传统。所有的上述政治实践结果都背叛、辜负了作为政治“威胁”的社会改进党人。我们今天面临着同样的宿命。社会改进党人自觉扮演这种违反政治常识的功能，唯一的动力是拯救人类社会的信念。这种信念与基督教类似，只是没有自身获救的可能。

八九中国民运在海外延续，再现与应证了这个过程。“六四”镇压之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组织性活动只能公开存在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所谓海外民主运动成为暂时的关注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主运动主体的转移，中国民主运动永远只能在中国大陆本土上展开，海外的民主运动只具备声援、资助大陆活动的功能。当然，海外的民主运动也具有独立的斗争意义，因为八九中国之春所显示的世界历史价值决不仅限于反抗北京当局的斗争，它必然地同时反抗一切现存的国家强权对人性的摧残。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前，香港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形成了海外民主运动的生力军，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香港市民的参与，就不存在所谓海外民主运动而只有“海外政治运动”。以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为代表的香港各界民众的活动最直接地反映了海外民主运动的两个特征：一、短期地、暂时地、仅具有象征政治意义的特征；二、最终展现出来的代表中国本土民主运动的社会改进特征。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后，随着香港民主运动从“海外支持”变为中国民主运动本体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所谓海外民主运动的前一个特征即告终结。“海外民主运动”也不复存在(各种有意义的政治活动仍然保持下去)。

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为止的海外民主运动(当然，在八九年以前早已存在公开的反体制活动)的历史价值，就是一个象征性政治



特征消失、本质性社会特征呈现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政治制度不均衡的各西方国家里表露程度不同，社会改进党人在日本推动中国民主化所遭受的社会迫害以及我们被迫把改进日本的社会制度当作自身命运，最早且明确地显示出中国的民主运动必然地会面临每一个政府强权的欺骗、出卖、背叛与镇压。这同时意味着具有世界价值的中国民主运动，必须与世界上所有正义进步事业一同努力改进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

社会改进党人在“六四”事件这样的突发性政治事件中鲜明地表示，作为任何政治运动的先锋前驱的命运与天性，天生的“历史遗忘症”（不愿汲取每一次历史时间中被出卖的教训），使得我们全心全身投入单纯的政治斗争（如反对戒严令与开枪镇压）而不可能顾虑各种短暂同路人的图谋。每当历史性的变动告一段落，容得我们反者时，我们都忏悔自身的（根源于善良天性的）政治判断为运动本身带来的危害：没想到北京政权除了强暴还很奸诈（其在东京的代理当然不会直接利用暴力），没想到东京政权除了伪善还很卑劣，没想到同为中国人同类的内奸在国家强权的交易中会彻底丧失基本人性……但是，如果社会改进党人变得聪明起来，谁来发动变革并承担政治牺牲？没有中国青年的天良，就不会有八九中国民主运动以及任何变革的动力。

在象征性政治特征几乎消失的海外民主运动中，除了社会改进党人（并不是简单的成员区分而是人格特征）在抗争北京政权同时反对东京、台北、华盛顿等国家强权的社会迫害，其余的打着民主运动旗号的同路人都程度不同地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政府权力。虽然这些占据优势的民主运动“主流”派别之间为了各自的“原则”、“理念”水火不兼容，但他们同为台北当局的座上客，被其玩弄于掌上。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掩盖不了背后的附庸于强权的同一性，在其后的强权指使下，他们的活动加速着海外民主运动的终结。

在作为运动的海外民主连动最终结束之前，资源的枯竭会加剧为争夺资源的暗斗。实际上，华盛顿或台北当局已经把兴趣放在更能反映其意向的、与八九中国民运并没有多少直接关连的海外中国人的活动上。这些人的活动特征是：一、他们自身受到各种政权的保护或赞助；二、他们不曾抨击美国政治制度的黑暗（包括对中国人的迫害）；三、他们热衷于西方政客们乐于利用的兼具反中内容的反共题目（如围堵、制裁、诺贝尔奖等）。

社会改进党人没有任何资本或靠山与同路人相争，因为我们明白：不仅各政府权力不可能保障我们的人权，连它们的法律也最终服务于其统治集团。如果我们也需要政治资源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话，我们只是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受迫害的事实；社会改进党人的遭遇无

非就是起因对于普遍民主、人权理想的追求而受到北京、东京、华盛顿等各种权力的迫害。我们这样的实践最清楚地表明：只有中国大陆的真正民主化才可能改善我们自身的命运，无权(权力、权利、权益)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救自己。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中，只有我们能再次承担先导的功能。

随着北京政权正统性的衰落，它已经不得不放宽经济与思想上的统治以拉拢新兴的“中产阶级”，大批的没有直接涉入八九民运(以及少量的有海外经历的涉入者)的知识分子已经被统治集团收买并死心塌地为统治阶层效忠。北京的现政权正逐渐把对民主运动的直接镇压(威胁人身安全的政治恐怖)变为间接的社会歧视与广泛的社会迫害。中国的民主化运动逐渐由以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加上少数中共上层“开明良知”者)为先导的自由诉求，变为以工农下层平民为主体的利益抗争。中国民主运动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七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海外的预演，表明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民主化进程将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展开。占据主流优势的“民主派”将会在西方国家政权的扶植下，与占主流地位的中共统治集团结盟共同压迫、压榨平民大众。

下表虽然不能准确地表现中国将来的政治区分，但可以表达出不同的特征。请注意社会改进党人与其它三者的差距大于他们之间的不同。

毛派(政治专制, 经济平等)	社会改进党(政治民主, 经济平等)
邓派(政治专制, 贫富悬殊)	民主派(政治民主, 放任贫富悬殊)

社会改进党人在将来的中国民主化前景中，不可能扮演政治上的主角，因为随着“体制外”民主派的公开合法化，统治集团的正统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与加强(正如今年三月在台湾的选举后趋于更加保守、反动一样)，我们将面临着更大的利益集权。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也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阻止中国进一步资产私有化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如旧苏联、东欧这几年的进程所显示的那样)。我们还得承担因“六四”事件导致的政治性负面遗产：西方社会(特别是与中国有最深联系的日本)在政治上的全面倒退与军国(右倾)主义的抬头，他们直接地加强着中共现政权的统治地位，共同阻碍着中国的彻底民主化与世界上的一切正义事业。

面临着不容乐观的中国民主化前景，我们社会改进党人必须同时展开两方面的工作。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普遍的官商腐败堕落、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盲流、下层工教人员贫困化等)的进一步加剧，两大社会阶级即所有者阶级与非所有者阶级，正形成鲜明的不

同利益集团。我们必须在正在形成的阶级对立中维护非所有者阶级的权益：就业权、受教育权、免于贫困权、选举国家官吏权等等。只有通过这些斗争，我们才能把中国的民主主义扎根在现实生活的民众中，同时防止兴起的民族主义被统治阶层利用朝危险的大国沙文主义方向膨胀，从而刺激起美日列强的军国主义扩张。

其次，中国的民主化在抗争北京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将越来越显示出与西方各资本主义列强的冲突(中共上层容易看出台湾统治集团比较高明地用“民主选举”方法维系权益，将逐渐减少对“民主”的恐惧与抵抗)，我们更需要加强与世界上一切受压迫、受压榨集团(民族、人种、阶级)的斗争联系、互相支持。尽管各国统治阶层在压制民众上其有共同利益，但瓜分世界有限资源、市场的冲突威胁大于现存的各种“国际条约”保障。避免现存威胁的唯一途径是各国民众互相了解，不愿意充当本国统治阶层的工具，因为各国民众之间不存在威胁对方生存的利益冲突。最终地看，人类和平的条件之一是清除国界、国家，但近年来的、为各式国家御用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无国界化”却只迎合资本家及其代言人或附庸的贪欲而将普遍民众奴役、限制起来(如北美贸易协议)。

如果社会改进党人不加倍努力，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有效工作，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就无从展望，世界进步也无以达成。这就是我们的奉献价值，也是我们的信念。

[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合编【回归的挑战】1997年7月]

### 23. 日本红军来自狱中的声明

日本政府最近单方面宣称：“日本红军骨干份子五人在黎巴嫩遭到囚禁，不久将被引渡到日本来。”不过，至今为止、黎巴嫩政府并没有正式承认囚禁的事实，当然谈不到引渡之事。虽然如此，日本政府与日本的新闻媒介，却把与日本红军的关系都无法证明的四名合法黎巴嫩、日本公民也称之为“嫌疑犯”。请问，是什么嫌疑？就算她们与日本红军有关系，这又算什么罪呢？难道你们要把与日本红军有关系的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都以“嫌疑犯”对待吗？

在此，我们就冈本同志等五人被囚禁一事（如果日本政府的发布属实）发表下述声明：

1、停止对日本红军的“恐怖份子”的责难。日本的新闻媒介把当年的（以色列）利达机场战斗称为“无分别的恐怖行动”，但在冈本同志下落不明的今天，阿拉伯的新闻媒介仍然如此报道：“冈本在阿拉伯世界里地位特别，不能把英雄出卖给日本政府”。

我们再次向利达斗争中被无辜卷入的非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般旅客表达内疚，但请不要忘记被以色列军乱射所杀害的死伤者，更不要忘记这次行动是来自巴勒斯坦的对以色列军滥杀无辜、犹太复国主义者无分别恐怖主义的报复作战。

2、如果这一次日本红军被黎巴嫩政府囚禁的报道属实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报道所称的“日本红军已经成为谋求中东和平的阿拉伯各国的包袱”的原因，而是日本红军输给美国的情报战的结果。美国中央情报局把日本红军视为世界革命运动团结的中心，九五年以后加紧了毁灭日本红军的攻势，这一次很可能是美帝国主义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向黎巴嫩政府施压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在美帝国主义的一元支配下，阿拉伯各国无法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在目前的局势下，黎巴嫩政府的态度会有所变化，但这并不表明日本红军已经失掉了与阿拉伯人民、黎巴嫩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连接纽带。日本红军与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

日本政府正是害怕阿拉伯人民与阿拉伯新闻媒介的“反对引渡”舆论，才在未取得黎巴嫩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发表“囚禁”的事实，逼黎巴嫩政府引渡。但“引渡”迟迟不能实现，已经表明了日本政府企图的失败，这也表明了日本红军在中东的重要地位。

3、日本红军虽败犹存；即使我们全体成员都被逮捕，日本红军依然存在。日本红军二十五年来积蓄的革命思想是不灭的，不会因日本政府的镇压而消亡。

日本政府把日本红军描写为“国际恐怖组织”，向黎巴嫩等政府宣称日本红军与另一个完全不相关的“联合红军”一样，是“大量杀害同伙的恐怖集团”。日本红军的战斗，是行使反抗帝国主义的抵抗权；日本红军的目的是，不是武装斗争，而是实现日本的人民革命，即彻底实现人民的自治与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声明：人民不希望武装斗争的话，我们就不会拿起武器。

4、日本政府以“杀人嫌疑”非法通缉利达斗争中的冈本同志并要求引渡到日本。但冈本同志并不是恐怖事件的“交换人质”，而是由国际红十字会与奥地利作中介，基于日内瓦条约交换的战争俘虏，日本政府完全没有理由以“杀人嫌疑”通缉他。就连以色列军事法庭在一九七二年判处冈本同志“无期徒刑”，禁锢了十三年于一九八五年释放后，也没有发出逮捕令。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与日本宪法第三十九条。

5、日本红军不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为敌。一九七六年日高同志在约旦被害，我们也没有敌对约旦政府。日本红军真诚地期待中东和平，以及黎巴嫩内战的终结与主权的恢复。如果日本的报道属实、日本红军被黎巴嫩政府囚禁的话，我们在此要求黎巴嫩政府释放他们。

6、为了人民的自治与共存，我们将战斗到底。

日本赤军：浴田由纪子、吉村和江、丸冈修  
1997年2月28日

译者注：此文译自声援日本红军囚徒的“归国者裁判再考会”发行的月刊《护照是什么》网址 <http://plaza4.mbn.or.jp/~hannichi/ekita/>。

[香港《十月评论》1997年第4期]

## 24. 论恐怖主义

1927年8月21日，无政府主义者万塞蒂 Vanzetti 与他的同志沙科 Sacco 在被执行枪决的前两天，从麻州监狱死刑囚牢中为其儿子留下遗嘱：“……假如我们在忍受了七年四个月十七天惨无人道的折磨与冤屈之后，还得非被处死不可的话，那原因我已经告诉你：因为我们站在穷人一边，反对这个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他们在临刑前向所有支持者发出号召：以一切形式推翻这个制度！为我们报仇！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当麻州州长自己不敢签字而请求以哈佛大学校长为首的委员会做决定时，美国的法学院教授们还是站在穷人的敌对面维持这个制度。在这样的社会公正已经不可能期待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保留或行使“替天行道”的最后手段（暗杀或恐怖行动），不但无可厚非，某种情形下还应拍手称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购订返回意大利的旅票后驱使一辆装载炸弹的马车冲向华尔街的贸易大楼，炸死炸伤上百余人。美国当时没有能力追查“凶手”，此“凶手”从此在意大利安居，无疾而终。在这个事件中，很显然元凶是处决万塞蒂与沙科的美国司法制度。

在某些极端的历史条件下，暗杀是唯一的行使社会正义的手段，特别是在不伴随无辜者伤亡的情况下。例如，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表达出朝鲜志士不甘当亡国奴的国魂。所谓恐怖行动，只是一种特殊的、敌我势力极为悬殊条件下弱者迫不得已采取的战争方式。所以，对于恐怖行动、恐怖主义的谴责，并没有超越反对战争的范畴。再看1996年圣诞节时秘鲁游击队突袭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事件，游击队明确地把行动控制在人道主义的政治目的下，当场释放妇女、小孩、普通工作人员、甚至包括没有直接支持藤森政权的加拿大外交官等。相反，藤森在解决事件的过程中，蒙骗包括红十字会、加拿大政府等国际社会，残暴地屠杀毫无抵抗准备的每一个游击队员。在这一类事例中，不论是出于胆怯或者是不赞同恐怖行为，都可以宣称脱离恐怖主义，但我找不出谴责“恐怖份子”的任何理由。

恰好在一百年前的1901年6月，日本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家幸德秋水在《暗杀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公法如此缺乏判决国际纠纷的能力，经济制度如此缺乏调解劳资冲突的手段，社会法律与良心

如此丧失判断与制裁个人或党派行动的力量，则对此社会绝望的人，或者隐遁、或者发狂、或者自杀、或者诉诸暗杀行动。暗杀确为罪恶，但把他们推向绝望的社会不是更罪恶吗？”实际上，如果我们不忘记恐怖份子已经首先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这个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谴责把他们推向死亡选择的这个罪恶制度呢？

如果你把恐怖主义视为粪便，彻底清除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停止人的生存。恐怖倒更像是一个人身上的伤病，你不能因为手上生疮而切断手指、不能因为耳朵发炎而拿掉耳朵。这个关于恐怖主义、恐怖事件性质的常识，并不因为事件的具体特殊性而不同。

2001年9月的前几个月，具有中国与日本研究背景的日本政策研究所创办人查尔默斯·约翰逊 Charlmers Johnson 出版了题为《反戈一击》（Blowback）的普及性读物，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并预测到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戈一击。连 Blowback 这个字典里没有收录的词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用于评估美国外交政策的副作用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当今世界上最具爆破性的三个国际性冲突点（中东、台湾海峡与朝鲜半岛）都是美国外交罪恶的后果。曾经为克林顿当局出谋献策的约翰逊比绝大多数的只是直接为主人效劳的“思想库”（think tank）高明，深为美国国家的利益忧虑。

既然美国扶持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既然美国十年来持续轰炸伊拉克，既然美国收买萨达特·穆巴拉克军人集团镇压埃及穆斯林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法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军人集团推翻民主选举中获胜的伊斯兰政治组织，既然美国扶持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落后、反动的君主制而前往驻军，等等，从阿拉伯世界中产生向美国宣战的军事组织是必不可免的。美国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战争状态中的。

在这种战争状态下，美国的政治中心（白宫、国会）、军事中心（五角大楼、CIA）、经济中心象征（世界贸易大楼）成为攻击要点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在这些建筑物中，有许多迫于生计从事清扫或者低级秘书事务的劳动民众，他们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广大广岛、长崎民众一样，是遭到直接攻击与被统治阶级利用而牺牲的双重受难者。那些在广岛、长崎经受原子弹爆炸的亚洲民众从来没有咒骂美国；即使是日本民众，在没有首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之前就谴责美国，也丧失了道义基础。

我们看到巴勒斯坦普通民众怀着解放了的喜悦庆祝“9·11”事件的巨大成功，连任何伪善者也不能抵赖阿拉伯民众的这种正当的感情。读过《古兰经》的人更明白，那些执行战斗的战士以此清除了自己生活中的罪过，得以升入天堂。对于那些没有理解、同情阿拉伯民众苦难的人，如果要谴责这个恐怖行为，就必须同时谴责美国在中东的反动外交政策，必须同时要求美军停止轰炸和侵略阿富汗，必须同时要求美国停止

轰炸和制裁伊拉克（那些十岁以下的儿童凭什么要为侯赛因的政策受难呢？）。必须同时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必须同时要求美军撤出中东、撤出亚洲、撤出一切非美国领土的地区……；否则，除了伪善者，或是被愚弄者，都不应该跟随华盛顿的节奏去痛骂。

我们再看看美国全军“最高统帅”的表现，在听说第一架飞机撞击世界贸易大楼后仍不知事态之严重继续向孩童宣教；在听说第二架飞机撞击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事后知逃到印地安那和那布拉斯加州的地下了）；在得知敌人都已经死完后又宣布战争，把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都投入一场毫无道义的恐怖屠杀中，对那些“9·11”事件的牺牲者，进行再一次的亵渎。

正如对待各种战争一样，对待恐怖主义也要具体分析。不过，从恐怖主义行为常常带来的更大恐怖罪恶的历史事实看来，恐怖行动一般不应当被赞同、被鼓励。和平抵抗才是更有效的反对暴力的形式，更值得提倡。

[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4期]



## 25. 瓦德·丘吉尔对西方和平主义政治的病理分析

硅谷之都圣荷西的市中心（以墨西哥裔居民占多数）相当激进，除了郡政厅、市政厅以外，教会也相当活跃。在小布什当局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的当天，Sandy（他介绍我加入美国劳动党，主持无家可归者的住宿）和 Scott 牧师等主持的紧靠市政厅大楼的教会马上挂出强烈反对战争的巨幅标语，使人感到连市政府也反对联邦政府了。我注意到这些历史悠久的教会过去都是白人教徒的聚会场所，现在被以墨西哥裔为主的信众取代，其政治取向也很明确。除了美国国内的事务（如医疗、住房、失业等问题），许多国际性的问题（如移民、战争与和平，伊朗、中东问题等）也常常由几家市中心的教会举办。

二〇〇六年的夏天，在一家教会里举办过一场关于印第安原住民文化和安那祺主义运动的别开生面的晚会。我赶到那里，遇到几位前不久在 De Anza 学院组织抗议第一位黑人国务卿鲍威尔将军演说的安那祺主义活动人士。我本来也参加了他们的准备会议，但因为我知道自己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黑材料阻碍我拿到一份护照，就没有去抗议。三十多岁的白人 Andy（他有一份正常的公司工作）告诉我：他们去抗议（“扰乱会场”）时，警察对他很客气，弄清他的身份就把他放了，但有三个来自东南亚的穷学生（被疑为有伊斯兰背景）被关了三天。我记得在郡政厅工作的官员朋友（他曾经是托洛茨基分子）告诉我说，他们要求警察抹消关押那些学生的记录，免得那些学生以后升学或就职时会遇到麻烦。

晚会除了印第安食品（募捐），还表演印第安部落的传统舞蹈，其中有一名很漂亮的中国长相的女子也跳得很娴熟。这使我想起在墨西哥城广场上看到的类似情形，让我们更能感受天、地、自然对人的养育之情。

演讲开始后，我感到一种在美国的社交场合少见的严肃气氛，因为三个演讲者都有独特的背景。第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日本裔安那祺主义女战士（我现在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她用自己的生命在冷战期间的公民运动、反战运动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第二位是黑人安那祺主义者，讲述自己“城市地下（‘非法’）游击战”和坐监牢的体验。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以下结论：“我并不以自己的被迫害经历作为资本。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靠吃老鼠为生，就别与我谈革命！”这句话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在引用“经典”信念。

当然，晚会的高潮是同为原住民出身和安那祺主义战士的 Ward Churchill 丘吉尔的演讲。同时也是学者的他因为坚持自己的激进观点并付诸实践（如携带枪支），被科罗拉多大学解除了教职。身材魁梧的丘

吉尔一拍身上的枪带，向听众致意：“我是一个安那祺主义者，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你们不怕自己的敌人（警察）带枪，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同志带枪？”一下子打消了大家的紧张气氛。他的演讲多少促使我改变了“绝对和平主义”的念头，大致能够理解在西方被描述为“恐怖分子”的激进自由主义战士的选择。今年初我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意大利武装激进小团体被逮捕的报道，其中一个美貌的女大学生在回答为什么要加入武装斗争时平静地说：“因为爱（穷人）”。正是因为爱和平、生命才使他们选择了常人和同志都难以接受的牺牲。美国历史上唯一因为政治信念枪杀总统的安那祺主义者 Leon Czolgosz 在被问及动机时只是淡淡地说：“我不能容忍有人这么特权。”“他是善良劳动人民的敌人。”是啊，所有的特权，包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特权，都是人类自由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权势（特别是国家权力）和富贵都不惜手段迫害安那祺主义者的原因。

丘吉尔为了证明暴力手段的正当性，在成为经典的《和平主义病理学》书中（注1）引用了几个历史事例。一、犹太人在被纳粹屠杀时，没有人反抗。犹太人头目们争先恐后去讨好希特勒当局，以为“和平主义”可以带来较好的结局；二、甘地的和平运动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大英帝国军力的衰落和财政的枯竭（注2）；三、马丁·路德·金之所以被美国主流突然承认和吹捧，就是因为民权运动中“最好的”部分如 Malcolm X 和黑豹党已经拿起武器，暴力抗争，迫使美国政府选择“较小的魔鬼”（金）作为谈判对手，立法保护公民权。丘吉尔的结论是：“暴力是改变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成分”（第45页）。

丘吉尔在痛斥西方“霸道的和平主义” hegemonic pacifism 阻碍第三世界的武装解放运动后，明确提倡要采取一切手段，甚至攻击性的军事行动（例如消除重要的国家设施，瞄准政府或公司的关键人物等）（第91页），正如英国特种空军的座右铭所指明的那样：“谁敢（行动），谁就赢”（第88页），实际上把自己置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丘吉尔的加拿大白人战友 Mike Ryan 甚至把美国、加拿大境内的原住民部落称为“第四世界”、“内殖民地”，把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美国西南部的州称为“北墨西哥”，建议：既然“60%的北美铀资源埋藏于原住民土地上”（第152页），如果把这些力量都动员起来，至少对于美国的军备生产是一个牵制。

丘吉尔对于国际局势、当代历史的判断不一定让人接受，他倡导的追求自由解放的战略也不一定让人信服，但我们不得不理解、尊重他的选择，而不必跟随“主流”社会去非难他。实际上，正是他对于那些力图把西方进步运动限制在“舒适领域”（comfort zone，即“合法”的行为）的主流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批判，刺痛了那些人士。对于那些不愿意

冒个人风险但有一定善良意愿的人士利用写信、请愿甚至集会抗议等方式表达对政府权力不满，本身值得尊敬。问题在于：有不少参与运动的人以此作为“职业”或个人机会，为了选举或媒体名声等目的，站在国家权力一方，攻击采取“非法”策略的同仁。这涉及到任何社会运动中必然面临的艰难选择，本来我们可以与他们在具体的行动中合作，但一定不能把主动权交给他们，因为他们最终会利用我们，与权力者分赃或者干脆出卖我们的事业。前几年，我曾关注过声称提高亚洲种族权益的“80-20”协会 <http://www.80-20initiative.net/>。这个由前任“第一位华人副州长”（德拉瓦州）发起的选举团体发出大量广告，其实最终目的是为民主党拉票。有一次，此前副州长要来硅谷募款，发出许多动听邮件，使我也动心准备前往。我直接给他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明作为一个安那祺主义者，也愿意支持（捐款给）他。没想到，他顺手回复到：“走开！我们有安那祺主义无关。”

我也不由得回想一九八九年，我们在日本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是因为一个学贼混入我们的运动，骗取了名声、捐款，最后向北京和东京的两个政权出卖了我们，教训惨痛。进一步看，“六四”以来的中国民主运动，主要也是由于少数由此民族悲剧获利的“名人”在美国、日本、台湾等国家权力面前争相出卖，迅速卖空了本来很有基础的民众运动，导致北京政权变本加厉地压迫民众。当一党专制完全失掉任何合法性的外衣，成为现代的奴隶制的今天，我们如果接受起码的洛克的“人民有权推翻暴政”的观点，就必然面临如何用各种手段结束一党专制的难题。虽然我自身没有任何暴力手段和意愿，但如果此时有中国的约翰·布朗挺身而出，我们有什么道德标准非难“暴力”呢（注3）？

丘吉尔很赞赏绿色和平、Earth First!（地球优先！）和 Friends of the Earth（地球之友）等不惜自我牺牲的环保团体。因为目前没有国际法保护地球，所以他们“以身试法”以改变法律，其实倒不一定非要诉诸暴力。另一方面，如门诺教派那样的传统的和平主义再洗礼派，每当社会动荡时，总要被主流教会询问对国家的忠诚，现在他们在强调首先效忠天国的同时，也不免表白对国家的义务，如投票、一定范围内的军备、忠实地缴税（注4）等。在西方世界，对于和平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了。一般说来，安那祺主义尤其反对“权威式的”或“霸道的”极端和平主义（注5）。我们一般地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但也要对具体的抵抗运动和形式具体分析。我在日本和美国二十多年，置身于不少进步事业的政治社会运动中，见识了不少西方的人物和组织，由于背景差异很大，很难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是，无论有多大差异，我学会了用一个标准来判别：他/她是否付出个人的牺牲以追求社会的公正。以

此为标准，丘吉尔、Ryan 以及为丘吉尔此书写前言的 Ed Mead 都是我在西方社会的同志。

注 1: Ward Churchill,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Winnipeg, Canada: Arbeiter Ring. 5<sup>th</sup> printing, 2005.

注 2: 丘吉尔没有读到印度独立中关于军事斗争的记叙。据说英国首相艾得礼承认，在“赐与”印度独立时“完全没有考虑甘地的因素”。

注 3: 前不久，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国内“企业家”来访问我，谈到中共政权负责公安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用军车撞死自己的发妻以娶新欢。此事无法证实，但看看中国的治安状况，可知中共政权的警务系统之腐败。

注 4: 见 *Christian Leader*, September 2008 第 17 页。其中带有狡辩地批驳有的信徒拒绝缴纳属于军事开支的部分（在联邦预算中高达 60-70%）税额，这同时表明教派内的动摇。

注 5: 例如，参见 1996 年去世的英国安那祺主义者 Albert Meltzer 的传世之作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dinburgh, Scotland: AK Press, 7<sup>th</sup> revised edition, 2000.

[2008 年 9 月 21 日 美国圣拉蒙]

## 26. 作为外交政策的美国民主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注1)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1997年3月4日晚来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讲演，能容纳600人的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更多的人只好在舞厅看现场录像转播。这是笔者来美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盛况(在领取座位票时就奇怪排这么长的队伍)，正如笔者从一篇介绍这位当代语言学大师、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时读到的那样：这是当代耶稣在讲道。

乔姆斯基(插图)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批判主要反映在他的《防范民主》(Deterring Democracy, 1991年初版、1996年第8版)一书中。乔姆斯基强调：美国一方面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不受挑战的超级强权、同时其经济实力却不断下降(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日本和德国)，这个政治(军事)、经济的不平衡关系迫使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更露骨地谋求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的世界“新秩序”(布什语)的特征。



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首先发射人造卫星)达到顶峰后开始衰退，并不具有与美国争霸世界的的能力。六十年代的“古巴危机”以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政策就是求和的表现。进入七十年代以后，苏联社会内部的经济停滞、政治不满更加深刻，而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地位牢固确立。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冷战”局势。越南战争以后，这个局势开始解体，美国一方面在军事上不必顾虑苏联的反应，同时又必须迫使日本、德国从经济上支持美国的行动。正如国防部副部长 Lawrence Eagleburger 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这是一种新的外交实践：美国出动军队、别国付款。波斯湾战争就是这种外交政策的实践。乔姆斯基引用美国劳工部的报告说，美国教育系统的进一步衰落使美国更加依赖本国的打手(“世界警察”)和跨国公司的外国技术人才。

乔姆斯基对于美国的亚洲政策没有详细的评述，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本身缺乏如其中东、南美洲政策那样一贯的政策，同时也因为在欧洲发生的“正-反-合”辩证逻辑还没有在亚洲发生。在欧美复兴的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新思潮尚没有得到日本、中国的回响。在亚洲，代之而起的“市民主义”、“消费者保护运动”、“新党”政治等时尚泡沫。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当以克林顿外交事务顾问、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亨庭顿 S. Huntington 为代表。正如亨庭顿的同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傅高义(E. Vogel)所称：坐在哈佛大学教授的交椅上，自然就会发生影响。而自负为“当代马基亚维里”的亨庭顿在其成名之作《士兵与

国家》(1956年)就开始关心“秩序问题”。他此书的结论是：“军事价值正是美国最需要的价值”、“如果市民们鼓励士兵们坚持军事规范，国家就会在此规范中塑造自身、获得满足与安全”。现在，冷战结束了，这位“冷战政治学大师”本该退休了，但是亨庭顿却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使命：寻找新的对峙构造以防止美国与其同盟国的“道德衰退、文化自虐、政治分离”，这就是他的1996年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亨庭顿当然知道，所谓“文化分析”正是马基亚维里等经典政治分析所鄙视的。亨庭顿大概想从这一领域出发超越马基亚维里。遗憾的是，比起相对容易定义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即美日、西欧)，亨庭顿眼中的“文化西方”(以聚会在瑞士 Davos 的“世界经济论坛”的商人、银行家、教授、官吏与记者为模型)却不能构成政治分析上的可用术语：日本是“文化西方”吗？东亚的新兴工业区域属于哪方呢？

作为与“文化西方”对峙的中国，其传统文明程度不如日本、台湾、韩国，其正统政治体制来自马克思、列宁，目前正急剧地接受亚当·斯密的政策，怎么可能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呢？亨庭顿把伊斯兰教列为另一个“文化西方”的对峙者，但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亚与西方发生过“文明的冲突”吗？已经加入北约的土耳其会与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吗？已经被定义为“恐怖分子”、“独裁者”的中东原教旨主义者和伊拉克的侯赛因只能给美英等国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带来骚扰而已。

亨庭顿还不至于把古巴也列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墨西哥过去作为“美洲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领袖”没有挑战美国，现在它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作为“北美一员”反而成为美国的直接“威胁”，克林顿不得不下令增强边境警备、不得不拒绝签署废除地雷公约。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者干脆称“有麦克唐纳店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胆敢挑战“民主国家”(美国及其同盟)的都不是民主国家。

除了亨庭顿抽象“教导”外，作为美国传道理念的民主主义如何具体地操作呢？《推进九十年代的民主》(注2)简要地介绍了美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协调、补充政府政策的财团、学术与政治机构)推动民主的实践。很显然，冷战时代美国所惯用的直接(军队)或间接(CIA)干涉方式虽然仍然不得不保持，但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原来在“对抗共产主义”名义下实行的各种政策不能在民主主义的名义下推行了。这迫使美国要支持、培养、鼓励“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例如，此书表1列出1992-93年度一些机构用于“推动外国民主运动”花费掉的来自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款项，其中包括哥

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用于“印制和传播由中国学者写作的关于制宪与法制的论作”等。从中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曾经多多少少地代表过民众呼声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们不得不堕落为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附庸的实际过程。为了争夺美国政府的这一点施舍，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们竞相在美国国会这样的“神圣”场合出卖人格。

或许，相对于作为外交工具的美国民主主义，比较具有实质内容的美国国内民主主义的政治成果可以为我们改善美国的经济民主与外交民主提供一线希望。

注 1：对于 anarchism 这个词的翻译也成问题。日语已经不用“无政府主义”的汉字表示而改用片假名注音。乔姆斯基对此答复到：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实践正确，误解总会消除的。

注 2：副标题是“表演者与手段、课题与职责”，Larry Diamond 著、卡内基财团 1995 出版，免费赠送。

[此文曾经发表在 1998 年 4 月《国际日报》，1999 年 2 月 15 日修订]

## 27. 陈独秀：问题、思想以及“复兴”的可能

2001年5月29至31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温州举行。有27名中外学者参加。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6月的《简报》第9、10页介绍如下：

[以座谈会的形式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42年逝世的陈独秀复杂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弄清了这个时期的陈独秀思想不是传统上所說的“对革命悲观失望”、“与托派相结合，转向反革命”，而是试图在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连续三次“左倾”错误指导路线之外，寻找另一条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直到1930年，陈对形势的估计(革命低潮)和策略(退却)的认识及主张与当时的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相比，比较正确。]

[中国托派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统治方面，始终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与中共的矛盾，本来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但是由于受到斯大林肃托斗争的影响，却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对此，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佐佐木先生向会议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托派政党与本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及参加竞选的情况。]



日本的《劳动者力量》杂志2001年7月10日第136、9月10日第137、138合并号就此发表了对佐佐木的专访。佐佐木寄函给我，希望我进一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这次会议的实际操办者是一位温州出身的老托派分子。温州实际上是托派的据点之一，至今还有不少托派分子住在那里。这位老人四十年来(包括狱中期间)一直很健康，这一次却因为准备这次会议而病倒了。会议以自由发言的形式进行。中共的官员首先

声明：发言无禁区，发表有纪律。实际上，自从1952年12月21日深夜在全国大规模逮捕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托派分子自由、公开地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也是首次以成为托派以后的陈独秀为对象的会议。其背景是自从天安门事件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内民主的讨论，与陈独秀后期民主化思想联系起来。1989年以来，陈独秀著作集两次被编辑、多次被印刷，就是证明。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三项议题：



一、陈独秀是怎么成为托派的？在 1929 年发表的“告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书”中展示了陈独秀因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引责辞职后的深切反省和托洛茨基文献的影响。在斯大林支配下的中共只得把他开除。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关系：陈独秀在 1940 年 11 月 28 日发表的“我的根本意见”中明确反对没有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对列宁的党组织论(民主集中制)也有所批判。这一方面可以归属到他自 1915 年以来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一方面也与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托洛茨基相通。

三、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派吗？第四国际的文件等都表明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这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实际上，从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直接信件上看，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郑超麟由陈独秀 1942 年 5 月 13 日去世前留下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一文中断定其为真正的托派。]

[一位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大胆地发言到：“从今以后的中国必须在陈独秀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上建设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自从毛泽东开国、邓小平建国以来，陈独秀的后期思想的复兴，将为人民中国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提供探照灯。]

我把上述专访译成中文、送到香港《十月评论》。《十月评论》编辑部于 2001 年 12 月 8 日回复了一封很详细的信件，希望佐佐木重新考虑“陈独秀最后脱离了托洛茨基派主要是因为上海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托派分子的宣传”以及“陈独秀比别的中国托派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提法。编辑部除了引用陈独秀的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外，还特别引证王凡西 1998 年 2 月在《陈独秀最后论文书简》英译本前言所示：“陈独秀的思想、见解一定还会改变。”“在基本上，他将回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来”。

我把上述《十月评论》编辑部的信件译为日文寄给佐佐木。佐佐木拒绝改写，认为《十月评论》编辑部是“派性主义”。我明白两者的分歧是方法论上的：佐佐木从思想上看这个问题、多少也从感情上断定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两大领袖应该一致；《十月评论》编辑部从政治路线、组织行为上考虑，认定陈独秀不属于已经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托派。佐佐木以东京大学科学哲学教授的身分组织“日本陈独秀研究会”(2001 年 11 月 9 日成立)，是中国政府的嘉宾；《十月评论》作为中国最早的“持不同政见者”至今不能进入中国本土。我知道无法调节、说服两方。这也是我通常在国际进步阵营中经常遇到的遗憾。

作为中共内部历史的“陈独秀问题”似乎已经基本上定案：关于陈独秀后期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不一定达到一致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重要)。至于陈独秀思想的“复兴”，我个人不抱佐佐木那样的期望。陈独秀不是“东亚的卢梭”，甚至也不能列入思想家的行列。当然，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两大革命的结合点，陈独秀的名字应该和另外两大先行者孙中山、毛泽东并列。

[2002年1月8日 美国圣荷西]

## 28. 毛泽东主义

在多如牛毛的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或 Maoism（毛主义）论述中，提出“毛泽东主义”并以此为视角，主要是试图从方法论方面确立一种新途径来研究老问题。

“毛泽东主义”这个提法最早只可能源于毛泽东本人。据王明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注1）中记载：“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起，毛泽东在同政治局同志的谈话中，时常说他要搞一个‘毛泽东主义’。”王明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领导人没有个主义，活着就会被人打倒，死了也还被人反对。有个主义情形就不同了。”“我搞毛泽东主义还是要马克思主义，只是不要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想结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或者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此时，日本尚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美国并没有对日本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前景并不明朗，“毛泽东主义”出笼太早。

当刘少奇等人为了个人目的制造并推行“毛泽东思想”这个用语的时候，中共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斯大林正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顶峰绝无仅有的领袖地位，所以，这个“思想”用词低于用于马克思和列宁之后的“主义”的级别。今天，当我们正视中国革命这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实践时，把其无可争议的绝对领袖“提升”到“主义”的层次来考察，并无不妥。其实，任何具有特殊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的人物的思想（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卡斯特罗等），称其为“主义”，都未尝不可。当然，对活着的人冠以思想或主义之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中共开了先例，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所以，延安整风之后，首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注2），是空前之举，遭到国际共运的普遍抵制。以至中共建国后六、七年间，都没有再提这个造语。

对于毛泽东主义，首次根据其自身的逻辑研究其（自相）矛盾的，恐怕要归功于王凡西的《毛泽东思想论稿》（注3）。这本流传非常有限的论著的历史价值在今天的任何读者眼中都可谓有目共睹，不必重复。我只想在此略为提及由于王凡西特殊的流亡背景所造成的局限和政治信奉（托洛茨基主义）所造成的偏见。

王凡西在批判、揭露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神化丑恶时没能对马克思、列宁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而是把后两者作为神来崇拜，并把他们等同于社会主义。例如，王凡西在批判《红旗》杂志主要理论家施东向（多半代表陈伯达或毛泽东）时赞扬到，“施东向有一句话说得对：‘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政权问题’”。这可以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宣言，与社会主义传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马克思

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论)不同。王凡西进一步断言：“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表示出最无远见，因而被事变驳斥得最为残酷的，恰恰是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立场。”这应该可以被认为是王凡西对毛泽东主义理解偏差之典型。毛泽东在此“根本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列宁相当的远见。

另外，王凡西虽然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养，但他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流派却几乎是无知的。例如，王凡西套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断言：“不难看出，这段文字里提及的蒲鲁东、劳麦、小资产者，毛泽东当然和蒲鲁东一样，是‘和小资产阶级观点有关的’。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堕落，以及斯大林官僚制度与官僚思想的普及于全世界共产党，也大大促成了毛泽东那种貌似辩证的、蒲鲁东式的诡辩主义。”这对于蒲鲁东和毛泽东都不公平。这里，引用这段指责并不是想指出因为蒲鲁东比马克思高明，所以王凡西搬用马克思嘲笑蒲鲁东就是错误的。我想说明的是王凡西在方法上的局限：如果你自身没有理解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就随意嘲笑蒲鲁东，那么你怎能反驳陈伯达、毛泽东不理解托洛茨基主义就批判托洛茨基呢？

戴着托洛茨基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凡西，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整整七年才由刘少奇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为例子，讥笑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离开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已过了整整七个年头。在胜利以前，毛泽东固然看不到中国的革命专政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事实，而在胜利以后，当这个事实摆在面前时，也还需要长长七年的教训(其中不少是悲痛的)，才使他(经过刘少奇之口)终于认识到人民专政已经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实质。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伟大的一个革命战略家，仅凭这一点就完全可以测定了。”今天，中共自己也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基本原则”而改用“人民民主专政”，而作为中共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已经彻底暴露出独裁的本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进一步迈向个人独裁的理论借口，而不是他“进步太慢”的说明。这进一步证明王凡西用以衡量中国革命、衡量毛泽东主义的那把“尺子”本身是不科学的。

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的二十七年间，在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于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影响深远，从其中概括出反、正两方面的毛泽东主义，并非没有益处。但其难度较大，且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注4)。相对而言，建国之前的毛泽东主义比较单纯且具有不可替代的正面价值，可称为毛泽东主义的精髓(注5)。具体说来，毛泽东主义的形成，可以从毛

泽东等人（主要作者是陈伯达）于一九三九年冬季合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此论的第二章“中国革命”第五节“中国革命的性质”里，第一次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概念：“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此观点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论》中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正如列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布尔什维克奠定了一党专政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从而确立了“列宁主义”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并统治、发展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言以蔽之：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它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主义”。没有此理论，就没有领导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没有我们今天认识的中国革命。



毛泽东主义的实践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且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是对列宁主义的运用和发展，指明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的人民都可以直接用政治、军事手段推行革命、夺取政权。如果我们对照古巴、菲律宾、秘鲁、尼泊尔这些不发达国度的情形，毛泽东主义比列宁主义更具普遍意义。

提到毛泽东主义，自然离不开在毛泽东身边与之共事三十多年的“大笔杆子”、“天才理论家”陈伯达。直到被毛泽东的“第二张大字报”（注6）打倒为止，陈达伯作为中共的理论权威，是毛泽东主义的第一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周恩来、毛泽东推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位子上，官列中共第四名，但很快以“唯生产力论”罪行被打倒。毛泽东抛弃陈伯达，启用张春桥、姚文元这样的“理论家”，以为可以为毛泽东主义创造出新的思想，但张、姚等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反观陈伯达，在其晚年的十八年狱中期间，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写出了不少令人称绝的好文章，如“《石头记》里的一件公案”，“‘青州兵’与曹操”，“一部历史悲剧——《水浒传》”，“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中的顿、渐两派”（注7）等。至少我们可以说：陈伯达之后，中共的理论就没有它自身的逻辑，中共也就没有了理论。

注1：引自《中国之春》1986年12月第60页。

注2：据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505页）考证：1943年7月8日发表的由毛泽东布置并经他审阅的王稼祥的文章，首次用“毛泽东思想”代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何方引自徐则浩著《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注3：《毛泽东思想论稿》，王凡西，香港信达出版社，1963年10月初版，信达出版社1973年再版，新苗出版社2003年再版。

<http://marx.org/chinese/20/marxist.org-chinese-wong-1964.8.htm>

注4：对建国以后的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还涉及到评价邓小平集团主导中国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四项基本原则》，需要大量的亲历者的有意义的反省。至目前为止，公众连许多基本事实都无从得知，遑谈评论和分析。何方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算是一个开端，其出发点就是因为经历了延安整风、长期在张闻天手下工作的著者“深有所感，总想一吐为快，表而出之”，基于“现行主流中共党史很难算得上信史”（第697页），“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成为良史”（第701页）。

注5：二00四年我在H-Diplo网上论坛<http://www.h-net.org/~diplo/>与美国、英国、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的国际政治学者们就中国革命、毛泽东、陈伯达等展开过冗长的论争，促进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观点的形成。

注6：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于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在九届三中全会印发后就注定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难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陈达伯的政治命运。此“意见”的全文见注5的书里“附录一”，第128—1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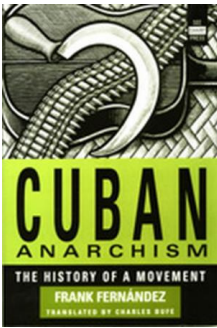
注7：《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陈晓农（陈伯达之子）编注，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在这些文章中，陈伯达指出：林黛玉的悲剧在于她没有财产，曹操的发起靠镇压、收编黄巾军，

梁山泊好汉们的悲剧在于小生产者的政治局限，佛学的顿悟、渐悟两派源于社会地位不同等等。可惜，他不能对毛泽东、对自身的经历进行一番马克思主义的反省。

[2005年5月10日 美国圣荷西]

## 29. 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与教训

自从 1959 年卡斯特罗掌权以来，地处美帝国眼皮下的弹丸之地古巴一直是世界局势的热点之一。从 1961 年的猪湾登陆入侵、1962 年的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不断发生的难民逃亡（注 1）、签名改革事件（注 2）、教皇访问（注 3），委内瑞拉等中南美洲国家反美政权的兴起，卡斯特罗的身体状况以及前两天胡锦涛的到访，都不断引起国际注意。国际上的关注多集中于卡斯特罗何时死去、古巴的一党专制如何结止、以及美国的制裁如何完了，除了西班牙语世界，没有多少人关心、理解、知道古巴短短的历史上，自由社会主义（安那祺主义）扮演的角色和付出的牺牲。



Charles Bufe 翻译的 Frank Fernandez 西班牙语原著《古巴安那祺运动史》（注 4）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权威文献。这本简练的记录从 1865 年开始，因为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结局，阻止了美国南方把古巴吞并的企图，迫使古巴走上从西班牙分离的独立道路。幸运的是，受西班牙影响的古巴社会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接触到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自由社会主义，其最具代表的人物是 Roig San Martin（1843-



1889)。



Martin 先投稿于古巴最早的具有安那祺倾向的刊物 El Obrero《劳工》，并在 1887 年 7 月 12 日开始发行更有影响的 El Productor（《生产者》，见插图），特别在烟草工人中组织宣传。1887 年 10 月 1 日，具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古巴劳动者协会在哈瓦那成立，签署六点声明，互相支援，组织罢工等。1890 年 5 月 1 日，大约 3 千名劳动者在哈瓦那成功举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显示出在拉丁美洲世界中最先进的工人运动。

1895 年，受到佛罗里达的商界支援的古巴独立运动在 Jose Marti 的指导下爆发成战争，持续数年。Marti 作为“自由斗士”，向安那祺运动作出许多承诺，把大部分战斗性很强的工人拉入“独立”战争中。这是刚成型的古巴安那祺运动第一次面临“社



会革命”与“政治斗争”的选择，其结果是惨痛的教训：社会经济方面，没有达成任何成果；政治上，很多人附属于支配“独立”战争的资本家阶级，为其付出了牺牲，独立的安那祺运动不复存在，而“半独立”的古巴脱离了西班牙的殖民主义，却受控于美国的帝国主义。1899年12月，当著名的意大利安那祺主义者 Errico Malatesta 从美国赶到他为之战斗的“独立”古巴，却被占领古巴的美国军事当局告知：“西班牙统治时期制订的禁止安那祺主义宣传的法令仍然有效”，Malatesta 不能在古巴讲演。当美国最终允许“古巴共和国”于1902年5月成立时，古巴的宪法却被塞入一条 Platt 修正案，其中规定美国可以随意视政治、经济条件变化干涉古巴和其他原西班牙殖民地事务。

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又得重新出发，再组织罢工、游行、宣传等，当“自由/免费教育”运动的创始人、西班牙安那祺主义教育家 Ferrer 在1909年被处死时，引发了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公开抗议活动。1910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对古巴蔗糖业工人的政治觉悟影响深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得以发展壮大，在1918-19年的哈瓦那，就组织了四次总罢工；在古巴的不到3百万总人口中，有8至10万的工人属于安那祺一工联主义派。1925年8月成立的古巴全国工人协会 CNOC 代表128个组织的20多万工人，其结构、章程和原则，都强烈受安那祺一工联主义影响，而刚成立的古巴共产党 PCC 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派别。不过，训练有素的古巴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蓄意夺取 CNOC 的领导权。据不同的参与者证实：“共产党人象对付 Machado（古巴总统）一样对付安那祺主义者。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消灭 CNOC 中不是共产党的所有成员，即使把他们出卖给 Machado 的警察也在所不惜。”（p. 57）在 CNOC 的优秀安那祺领导者 Lopez 和 Varona 被绑架暗杀后，共产党彻底掌握了 CNOC。剩下的仍然坚持安那祺一工联主义的 FOH 工会，在1933年被在苏联指令下的古巴共产党分子火力攻击，彻底终结了安那祺与共产党的本来就脆弱的合作关系。

1933年，在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强人 Batista 上校推翻腐败的 Machado 上台。Batista 没有政治势力，提出“左翼民族主义”的腔调，拉拢共产党，操纵选举，共同排斥安那祺运动。例如，刚通过的“50%”法，规定业主必须雇佣至少一半以上的古巴人，迫使众多西班牙身份的安那祺主义者离开古巴，削弱了安那祺主义运动。

1940年古巴的新宪法取消了 Platt 修正案，从政治上摆脱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的借口，在社会经济上也实行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例如，允许安那祺运动独立合法化。安那祺主义者解散两个主要的组织 SIA 和 FGAC，联合成立“古巴自由主义协会”ALC（注5），安那祺运动又恢复活跃起来，在1948年举行的全国会议上，有155个代表出

席，著名的老朋友 Augustin Souchy（注 6）代表国际工人联合会 AIT 出席讲演。从现存的文献记录中，可以读到反对共产党、反对天主教、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美苏帝国主义的纲领。

1952 年，已经下台的 Batista 发动政变，推翻了腐败的 Prio 政权，古巴共产党和控制古巴工人联合会 CTC 的领导人默认或支持政变。随着 Batista 独裁和腐败的加深，冒出来一个出身资产阶级、本身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律师政治家——卡斯特罗来填充反对派领袖的角色。卡斯特罗并没有打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牌子，只是要恢复 1940 年宪法。他的“M26J”（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吸引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安那祺主义者，也接受古巴大资本家如 Hermanos Babun Ship Builders 等的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他的所谓“山区游击抵抗运动”，从来没有得到贫穷山民或“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主要是为古巴资产阶级服务的。

尽管有安那祺主义的刊物指出卡斯特罗与 Batista 一样，只关心权力，不尊重承诺，但几乎所有的 Batista 的反对派都认为卡斯特罗是必要的、暂时的、可控制的政客，但卡斯特罗证明他超过了马基雅维里。Batista 逃走后，卡斯特罗凯旋进入哈瓦那，成为无可争议的最高领导人。他成立各种“革命委员会”和“革命法庭”，先把 Batista 派，再把中立派肃清，并恢复被 1940 年宪法废除的死刑，由超法律的刑警队执行枪决。他派出共产党员到工会来“暂时”帮忙清除 Batista 分子，却永久地占据着位子不再离开。古巴被迅速落入红色恐怖中。

最著名的是 Manuel Urrutia 法官的命运。Urrutia 同情 M26J，被 M26J 任命为革命政府的总统。但是，Urrutia 反对共产党控制政府，并拒绝“任命”卡斯特罗出任“最高革命领袖”，结果被污蔑为“贪污”，被迫辞职并逃到外国的大使馆避难。此后，卡斯特罗过去的那些“亲密战友们”，包括起义军司令，都被逮捕或枪决，几乎所有反对 Batista、支持 M26J 的有实力的人物都被肃清。在这个推动古巴转向斯大林（列宁）一党专制的过程中，卡斯特的弟弟劳尔（国防部长）和切·格拉瓦（国家银行行长）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卡斯特罗嫉恨格拉瓦的国际声望，趁格拉瓦去刚果推行“世界革命”在非洲丛林作战之际，卑劣地公布格拉瓦的遗书，使得回到古巴休整的格拉瓦发现自己已经被标为“烈士”，无法出现在古巴公众面前，只好再次离开古巴，去丛林战斗，最终被玻里维亚军队杀害（注 7）。在这样的独裁者统治下，可以想象古巴的政治生活。CTC 被改名为 CTCR（古巴革命工人联合会），在 1959 年底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虽然在 2854 名代表中只有 265 名共产党代表，但革命政府的劳工部长以及卡斯特罗亲自出面，主导大会，改组机构，葬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自己组织、维护自身利益的历史，古巴的工人阶级由此被绑架在政府

的机器上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帮助卡斯特罗奴役工会的机会主义者，最终被卡斯特罗以同样的“反革命活动”关押起来，或流放国外。

1960年8月，Souchy以农业专家的身份（注8）应邀访问古巴，他在考察期间，对于古巴农业的苏联化模式感到不安，批评这种缺乏个人自由、个人动力的集中化会萎缩农业。他的“古巴革命见证”被印为小册子发行，但当他离开古巴后三天，就被政府收集起来全部烧毁了。幸好此文后来被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发表。1960年12月15日，ALC的机关报在最后一期中对古巴革命出现的专政（专制，独裁）提出警告：“所谓工人阶级的集体独裁，或者用今天的时髦用语，叫人民专政，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用语。因为各种专制，包括人民或无产阶级专制，都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而不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权力。独裁者不仅对被镇压的政治、社会阶级有绝对的权力，同时对所谓的执政阶级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权柄。不论你怎么称呼，从来不可能有一天实现一个叫做工人、无产阶级、平民或学生的专制。独裁者的权力落到每一个人头上：资本家、地主、种植园主以及无产阶级和一般的人民，也包括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革命家们’。”（p. 85）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一党专制的卡斯特罗政权，以革命之名实行的是任何革命的敌人（包括美帝国主义）都不可能施行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种红色恐怖中，美国中央情报局1961年4月17日策划的“猪湾登陆”作战遭到可耻失败，成为卡斯特罗彻底镇压古巴一切反对派的借口。过去在Machado或Batista独裁政权下，人们还可以声称自己中立或不管政治而生存。现在，卡斯特罗为古巴人民只提供四种活着的选择：执行枪决的刑警队刽子手、顺从国家独裁的奴隶、监狱犯或者流亡。卡斯特罗在5月1日劳动节，无耻地宣称自己终生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式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为向斯大林式专制体制的转换。令人震惊的是，安那祺运动领袖之一Manuel Gaona Sousa于1961年11月24日发表“古巴自由主义者的澄清和宣言”，彻底背叛他自己的历史和同志，在国内和国际上帮助卡斯特罗体制。后来流亡的古巴安那祺人士们，成立流亡自由古巴运动（MCLE），不得不异常艰难地面对古巴政府和Gaona这样的叛徒的国际宣传攻势，几乎没法得到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多数安那祺主义团体）的理解和支持。Abelardo Iglesias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安那祺刊物中悲愤地呼吁：“剥夺资本家的资产，把它们交给工人和职员，这叫革命；但是，把它们转化为国家垄断而生产者只有服从的权利，这叫反革命。”

（p. 101）难道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连这一最基本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都不知道吗？古巴的安那祺运动，在经历被出卖、镇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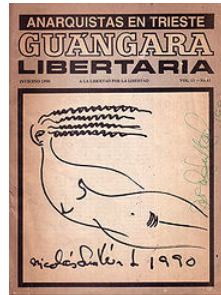
流放的命运后，又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包括安那祺主义）歧视、偏见、诽谤的受害者！

通过古巴这个典型的个例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一党专制是卡斯特罗统治的本性，而“社会主义”只是挂在门前的羊头以维持一党专制；一党专制（不管它叫“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等花样）不仅与社会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即安那祺主义）毫无关联，反而是极端对立的畸形堕落制度。这对我们理解苏联的形成和消亡以及今天中国的走向，都极具参考价值。

流亡在迈阿密的古巴安那祺主义者们最后的奋斗是于1979年11月创刊 *Guangara*

*Libertaria* 季刊，一直坚持到1992年秋天，总出版50集，印刷225,000册。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国际上进步运动终于对卡斯特罗体制、对古巴安那祺运动的历史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来得太晚，很难对古巴的安那祺运动的恢复有实质上的帮助，但我们确信，与其他地方展开的安那祺运动所经历的希望、挫折、

失败、再希望的过程一样，只要人类渴望自由，就一定会见证安那祺主义的复兴；吸取了惨痛教训的安那祺主义在复兴中，会学会重新组织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更公平、更自由的社会秩序。



注1：1980年4月4日凌晨，有一小群古巴民众冲入哈瓦那的秘鲁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秘鲁政府拒绝交出这些人，古巴就撤走了警备。当人们知道此事后，有上万人涌到秘鲁大使馆要求避难。这是对卡斯特罗统治集团的严重挑战，卡斯特罗不得不亲自发布声明，允许任何想离开古巴的人走掉。几个星期内，有三十万左右的人乘船逃到迈阿密。

注2：2002年5月10日，有1万1千人向古巴议会递交签名书，要求就一党专制和一些基本社会经济政策进行全民投票，被国际上称为

“Varela 行动”（Varela 是古巴19世纪的传教士）。美国前总统卡特为此访问古巴，面见卡斯特罗，希望古巴政府不要因此镇压签名者。卡斯特罗以技术困难（无法一一证明签名人的真实性等）为借口拒绝签名书，反而动员大众，就是否坚持“社会主义”进行全民公决，达到“永久坚持社会主义”（即一党专政）的目的。见笔者“*The Cuban Question*”，<http://cpri.tripod.com/cpr2002/cuba.pdf>。

注3：与在别的中南美洲国度一样，天主教在古巴仍然有广泛影响。

注4：Frank Fernandez, *Cuban Anarchism: The History of a Movement*. Tucson, Arizona: See Sharp Press, 2001.

注 5: Asociacion Libertaria de Cuba.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义者为了回避迫害开始用 Libertaria (自由主义) 一词, 与安那祺主义同义。1970 年代在美国成立的 Libertarian Party (自由党) 与安那祺主义完全没有关连。本书译者在开首专门说明这一点。

注 6: 见本书第 19 章“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的终生追求”。

注 7: 这也成全了格拉瓦。今天, 他成为许多中南美洲民众心目中的耶稣(救世主)。即使在墨西哥裔聚集的场所, 也随处可见格拉瓦的头像。

注 8: Souchy 写过《以色列合作社》小册子, 对犹太人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 Kibbutz 进行过考察, 广为人知。

[赵京 2008 年 11 月 24 日 美国圣拉蒙]

### 30. 劳动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我来美国后第一份正式的“永久”工作是在电话上销售电视天线与节目，报酬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虽然劳动时间不好，业务却相当轻松，平均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为公司工作。按照经验，每当工作量不足时，公司总会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实行裁员（lay off，不同于因为职工个人理由而离去的辞职或开除性解雇）。我们都预感到将被裁员，只是因为那时相同待遇的工作比较容易找到，也没有心理压力。

一天晚上，我接到公司经理电话，让我第二天提前一个小时上班。我意识到可能会宣布裁员事项，并期待着一顿免费午餐。

第二天我到达公司时，发现同项目的职工都到齐了。公司宣布：因为电视公司取消了此项目合同，从今天起，所有职工全部被裁员。我们在签署了以后不得控告公司声明后，领到相当于两周工资的遣散费，并可以申请州政府的失业保险。

这对在日本公司里工作过的我，是一个记忆深刻的体验，美国的雇用制度竟然允许一个公司只是为了一个项目而雇用或当天解雇职工！

我也曾在一个“地球上最好公司之一”的纯软件开发公司 Adobe Systems（其人均产值超过五十万美元）工作过。我感到自己无法适应人品恶劣的经理。也很惊奇为什么职工同事们为讨好上司竟然不择手段。我当面向公司总裁建议公司考虑改善管理制度，适当地评价、检查对职工握有太大权势（从雇用、提升到解雇）的各级经理。当时，美国的泡沫经济正达到顶峰，这个有两千职工的公司声称下一年将要招收一千名新职工。所以，我这样的资本主义体制异端也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得以生存下来。我同时预感到美国经济也有泡沫破灭的时候，为了能够在跨部门范围内组织职工应付可能的冲突，我积极组织全公司范围的乒乓球比赛、参加演讲俱乐部等，特别希望有可能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内也组织起工会来。不过，事态的展开完全超出个人主观设想之外。

2001年9月11日，我较早赶到公司，知道了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事件。公司总裁当即决定当天放假（付工资），大家都惊恐、慌张地往回赶。我留下来与警备、清扫的工人（他们不属于公司职工）“坚守阵地”，因为我知道没有人会来此公司找麻烦。就连美国略有头脑的学者如 Chalmers Johnson，都预测到同样性质的攻击行动（他在事件之前刚出版了一本叫做《反戈一击》的书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我当时很可惜公司为此损失上百万美元。现在想来，公司此举是为了保护公司最大财产——职工，因为公司大楼或设备并没有多大价值，且不能创造剩余价值。我可以预知国际政治的大体趋向，却不能控制公司的随

之而来的变动。当我被经理告知我处于“再配置”过程时，心情很欣慰，期待着新的经理和工作无论如何都比目前的好。但是，我最终还是被解雇了。因为在美国的公司里，得罪了经理就不能在公司里留下来。对于英美式资本主义而言，欧日式资本主义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欧洲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经常执政，工会也十分强大，在普遍萧条之际，一般采用降低工作时间（降低收入）的方式“同舟共济”。日本的《劳动基准法》只简单规定“必须在解雇前三十天通知”，但按照东京高等裁判所的判例，还必须考虑“人员削减的必要性”、“选择解雇方式的必要性”、“确定解雇对象的妥当性”、“劳资协议程序上的妥当性”等基准。这就是日本资本主义“终身雇用”特征的法律基础。我也向公司建议此方式，一般职工也很赞同。公司管理阶层其实也不反对。但是，华尔街不高兴，不允许这样做。

日本的上市公司每年只须公布一次财务报告，且股东大会都选在同一天举行以防止股东们有理无理的控制或干涉。再加上多数公司都隶属于以银行为主力的所谓六大系列，公司之间交叉控股，公司管理阶层直接受股票控制而改变经营、削减职工的压力不大。相反，美国上市公司每个季节必须公布财务报告，一旦出现亏损，就必须最终以裁员的方式反馈给股票市场。特别要指出，几乎所有上市公司都以“股票选择权”

（即股票数额）的形式奖励员工以及管理阶层，典型的公司总裁甚至不要工资，只要“股票选择权”以示对股东的忠心。这种经营方式，已经远远脱离传统资本主义的“朴素”信条，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营越来越多地置于甚至连传统金融产业也控制不了的股票投机上。

很显然，越贫穷的人越没有本钱和胆量参与市场投机；而市场投机的最终全体平均回报或亏损，不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而是由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政策决定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属于成熟、腐朽型，把政治上的民主形式（主要指选举时的一人一票制）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形式（即消费时的一元一票制）完全脱节。“民主政治”提供了垄断经济必须的劳动力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同时，也制造出大批没有“买主”（雇用公司）的劳动者“库存”——其中许多人拥有高等学历与技能。总体而言，我们所听到的还没有被淘汰的美国公司都很有竞争能力，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与浪费。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战后的日本、德国的经济完全被抛向市场，不但不会有所谓的“经济奇迹”，恐怕会陷入墨西哥今天的处境，或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德、日的统治阶层因为战败，也没有能力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比较“谦虚”地吸取教训，把全体劳动者的就业视为社会秩序安定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保障了雇用，又极大地促进了增长。这对美国式资本主义而言，确实是奇迹。

冷战结束以后，支持日本过去成功发展的国际条件不复存在，骄傲自大的日本资产阶级追逐的泡沫经济加速了日本经济的衰退。随着日本政治上进一步附属于美国，来自美国经济政策改变所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日本一步步效法美国经济，同时在政治上更加军国主义化，以防止、镇压社会矛盾即将带来的动荡。但民众的抵抗仍然顽强，焦点就是雇用与解雇的制度改变。

依靠一国霸权地位的美国因计算机通讯技术的突破（美国高科技公司45岁以下的技术员绝大多数来自外国），得以拖延经济的崩溃，但更加剧了社会分化。在高科技产业工作的阶层，人数并不为多，尚没有工会那样的组织方式，许多人被解雇后失去了居留身份，不得不离开美国。一般美国人工作在我第一次正式就职那样的略高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公司，或者根本没有正式的工作，即使被组织在劳联-产联的工会旗下，根本没有权力与公司交涉包括受雇用权在内的劳动权。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任何工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参加过三次罢工，就可以被开除解雇。

作为一个产业，如果它整体上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不是劳动行为。所以，按照“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股票投机行业即使禁止不了，也不能让它膨胀得足以支配、影响经济。目前世界经济的危机来自于它的政治制度：广大的迫切希望提供自己的劳动力的劳动者找不到“买主”。这告诉我们这个制度已经破产。

任何制度都必须确立在劳动权这个基本人权之上，只有这个基本人权获得了保障，才有可能为进一步的社会政治权益，如受教育权、基本医疗福利等提供基础。劳动权其实就是生存权，因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须劳动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劳动权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类的制度；与奴隶制度一样，这样的制度应该被废止、被摧毁。

[香港《十月评论》2001年第4期]



### 31. 中美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困误

三月十七日上午，我赶去奥克兰 Oakland 的 Niebyl—Proctor 马克思主义图书馆参加由社会主义者 Ann Robertson 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座谈会。她主要是根据自己 2003 年写成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展开，开首以在美国校园中流行的“乔姆斯基热”为例说明美国的年轻人受乔姆斯基影响之肤浅，进一步介绍马克思对巴枯宁的批判。约有二十人参加了座谈（几乎都是白人，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因为奥克兰是美国黑人政治中心之一），除了与图书馆相关的美国共产党同情分子，有半数接近无政府主义的人士。多数发言人的意见如下：(1) 目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倾向影响青年参加反战等运动，是可喜、难得的，不懂马克思的理论无所谓，如果再象第一国际或西班牙内战中那样争夺领导权，最终都会失败；(2) 巴枯宁在理论上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突出代表，蒲鲁东的思想更深刻一些；(3) 我介绍自己在最后逃离日本时，松散的 3A (Asian Anarchist Alliance 亚洲无政府主义联盟) 曾经开会决定，终止一切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共同斗争，这引起与大多数人的赞同。在州立大学教哲学的 Robertson 女士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学习，又说她还有事就提前离会了。（我后来注意到她在停车处与美国共产党的一个活动分子谈了很久。）

我第一次决定参加由美国共产党主办的活动，有些犹豫。因为我自从到美国来，虽然参加过十多个社会主义·和平·进步组织，目前仍然是劳动党成员，但对美共一直敬而远之。这一方面是因为不赞同其理论，粗知一些其内部斗争丑闻；另一方面也不想联邦调查局 FBI 和移民局 CIS 收集我的一大选材料中再加上一份麻烦证据。但我这次终于决定造访此地，乃是受到 D.E 律师邀请，为一个“不速之客”（中国共产党中央编译局代表团）当翻译，一举两得，实地考察美共和中共的理论逻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下午的会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望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度的影响”，有六位编译局和六位美共的人士先后发言。中共人士主要是介绍中国的情况，以“政府仍然占有多数经济体”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经济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时也附带统战宣传，说西方的右翼抹黑中国、左翼不理解中国。我因为被当作美共的翻译，不便发表意见，只能在结束时提出主要观点：政府、政党（特别是一党专制下的政党）控制的经济并不等于公有制，没有新闻自由、政党自由的政治制度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更接近“国家社会主义”的东西。

美共人士的代表是美共“学术委员会”的负责人 Erwin Marquit，他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当我介绍自己原是物理系学生、是从日本逃来的政治难民时，他说他是逃离纳粹的政治难民（注）。一位女士推崇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使我感到可笑，她承认“斯大林也有错误”，我只好附和说“斯大林也有功劳”。另一位女士介绍了美共代表团前不久访中的观感。另一位教授宣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文。我对这些出于狭隘信条论述他们并不知道的中国没有任何评论。最后，我的朋友 D.E 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来自我辩解中国是不是还要搞社会主义。虽然他的切身观察已经告诉他中国不是社会主义，他的感情却必须支持他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信条。我们在旧金山的反战游行中相识，我知道，这位在越战时期投身越共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老战士不可能没有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支持来抗衡美帝国主义。他呼吁美国人民在他预感的即将到来的“美日同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冲突中以生命保卫中国、打倒美·日帝国主义。我对日本、美国左翼朋友的这些感情、心理、精神状态见识不少，学会了不以他们的各种荒唐逻辑来嘲笑他们，而是以他们的人生经历来尊重他们。毫无疑问，那些真正献身本国民众反抗自身国度政权的西方人士在真正认识中国之后，会站到中国民众一边的。

最后，如果要以一个共同点来结论的话，那就是那位中共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的断言：“中国人民大多数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抛弃这些价值的政府就会被推翻。”这实际上也是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危机：中共的“三个代表”（姑称之为“理论”）、一党专制的统治，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在奥克兰几十公里以南的硅谷每天可以看到最发达的中国资本主义实践），以及外交上的出卖（例如勾结日本政权迫害中国公民的罪行），把社会主义真正的价值（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等）践踏得一钱不值。失去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持下去吗？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维持多久呢？

注：我后来从同为 Human Agenda 理事的 Hobbs 律师处知道，Marquit 到处邀请美国的官员、律师等去中国参加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类的学术会议。

[2007年3月20日 美国圣拉蒙]

## 32. 从挑战 Yahoo 的案例看监督超级大公司的可行性

当我九十年代初期任职于一家日本的中小上市公司时，曾被公司派去股东年会帮忙。公司总务部长特意交代我们这些年青男职员听从他的指挥，万一有股东闹事就由“服务员”变成“警卫队”维持秩序。日本的股东年会是所有公司头头们最难过的关头，为了防范所谓的“总会屋”（即专靠在“总会”期间闹事为职业的股东），所有的日本公司都选在同一天上午召开股东年会，使绝大多数公司得以逃脱无法分身的“总会屋”的攻击。会后，我们可以从报道中得知，有些大公司为了封口，暗地里支付了“总会屋”多少钱。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害怕被描绘为黑社会的“总会屋”呢？因为他们都有什么把柄掌握在“总会屋”手中。按照资本的逻辑，股东就是投票日必须被讨好的选民。

美国的“总会屋”则完全合法，实际上是由职业律师干的。例如，前不久有一个律师代表一个股东以公司的某个行为违反了股东的利益为由控告 citi（花旗）集团的董事会，citi 无法公布相关的会议记录，只好请退休的纽约大法官私下调解，以支付两百万美元律师费了结，这实际上损害了绝大多数股东的利益。

日本的公司股份主要由公司之间相互控股，一般人很少直接购买股票。我在日本学习、工作十年，没有任何股票。日本的上市公司一年才公布一次业绩，公司对于股票市场的变化基本上无动于衷。但在美国，上市公司必须每季度公布一次业绩，实际上把公司的运营置于华尔街股票市场的操纵之下。美国复杂的税务制度又迫使婴儿也开始持有股票。特别是美国人的退休金，几乎都投入股票市场。象我这样的一般人因为持有的份额太小，对于股东大会、年度报告都置之不理，反正没有影响。不过，我因为近年侧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开始阅读自己持有（微不足道）股份的超级大公司的报告。我立即注意到有不少与自己同样的、只有数十百股的“超微小股东”（一般在纽约上市的大公司发行上亿甚至上千亿股）以良知在挑战超级大公司的 corporate governance（公司治理）：几乎每个公司的股东年会都有人提案限制高级主管的薪水等等。虽然这些提案获通过的机会不大，但从公司董事会的反对声明中，可以感受到股东提案是除了法律之外对公司运营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正如普通市民很难挑战政府但必须监督政府一样，微不足道的小股东也必须监督大公司的运营。实际上，象股东投票成功地影响过美国公司对南非种族制度制裁一样，细小的涓水也能汇成滔滔洪流。我的目标是改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运营。

我首先去参加二 00 三年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年会。此公司的 CEO 说起来还是我的校友（UW-Madison），我也认识不少中国人在此工作。有两个还爬上高级职位。更有趣的是，原美国驻日大使也坐在其董事会的位子里，我过去还想就美日关系向他请教呢！虽然它与别的半导体公司一样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打交道，但毕竟没有太大的政策性影响，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二 00 四年，我去参加 eBay 的股东年会。一个黑人妇女代表其工会股东宣读提案，要求减少高层主管的报酬。公司的年青创始人很象一个普通软件工程师，不会应酬；但其 CEO 却是哈佛毕业的气派女性，很会控制会场，指点两个股东提了不痛不痒的问题就宣布散会把股东们打发掉了。eBay 在中国并不成功，与阿里巴巴的官司还没有解决。从政策层面上看，它收购的 Skype 网络电话系统不存储通话记录，还没有造成通讯自由方面的受害案例。二 00 六年六月四日，我们在圣荷西公共图书馆举办公开论坛，用 Skype 接通在中国的黄琦、赵昕、马步芳等维权人士，畅通无阻，还得感谢 eBay 呢！（补注）

二 00 六年我出席 Sun Microsystems 的股东年会。会场气氛紧张，因为其股票下跌太厉害。几个老人在会场上发作，说对 Sun 公司及其热爱和坚信，把大部分退休金投入 Sun 舍不得抛售，现在落得如此下场。我愿以为“投资者”都是精打细算的理性动物呢！其实大家都是摆不脱感情控制的人。那次股东年会后，Sun 的创始人也只好下台。这有点像去年美国期中选举后被迫下台的原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二 00 五年我出席 Yahoo 的股东年会，在会上口头发言询问其人权政策。Yahoo 的 CEO 有点紧张，不流畅地花了近十分钟为其在中国的运营辩解，大意是必须服从当地法律等等。作为全球点击率第一、带有新闻性质的网站，Yahoo 实际上同时也在制定网络通讯的规则，所以很有必要监督其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二 00 六年四月七日，我与 Ann Lau 女士等伴随从欧洲飞来的“记者无疆界”记者们访问 Yahoo 总部，要求与其公共关系主管面谈其网络自由政策，被其警卫工人阻挡在外。我计划出席同年五月召开的股东年会，没想到在年会过后才接到相关的资料，看来 Yahoo 在提防我。这坚定我的决心，挑战 Yahoo 的公司运营。

Ann Lau 女士曾在 Cisco Systems 股东年会上提出人权提案，她介绍有经验的 Carl Olson 先生起草文稿，于二 00 六年十二月七日和十日向 Yahoo 提交我和 Andrew Zhao 的 Resolution on Freedom of the Internet Worldwide（世界范围内互联网自由提案）。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接到 Yahoo 来信，说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U.S. Securities &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 SEC) 第 14a-8 条款，我们提交的 TD

Ameritrade 股票公司的复印不合格，要求我们十四天内提交拥有 Yahoo 股份的新证明。这个要求并非刁难。我立即用电子邮件要求，并很快接到 TD Ameritrade 电子邮件回复，确认我们于二 00 四年购买了 Yahoo 股票并保有至今。我同时又从网上打印出我们的账号证明，显示我们持有包括 Yahoo 公司在内的股票，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传真给 Yahoo。我打电话给 Yahoo 时，没人接听，就留言。二 00 七年一月五日，我接到 Yahoo 的传真确认收到了我的上述传真。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到厚厚的一叠材料，打开一看，是 Yahoo 二月七日写给 SEC 的复印件，原件要求 SEC 就 Yahoo 忽视我们提案的愿望不采取任何行动。我才意识到，Yahoo 在这一个月期间写出这么厚的材料，用 SEC 的条款 14a-8(b)，14a-8(f)，14a-8(i)(7)，14a-8(i)(10)，14a-8(i)(6)，14a-8(i)(11) 和 14a-9，14a-8(i)(3) 分六个理由把我们的提案从二 00 七年六月十二日将要举行的股东年会上排除。我对于 SEC 条款完全没有知识，只能指望 SEC 能够秉公判断，但经验丰富的 Olson 认为不能干等，必须反驳 Yahoo 的谬论。Yahoo 二月七日致 SEC 材料的六大理由，实际上有两个要点：(1) 我们的股票证明虽然标明是从二 00 四年拥有至今，却没有 SEC 条款 14a-8(b) 中要求的 continuously (连续) 一词。对此，我们除了诉诸 SEC 官员的逻辑判断能力 (二 00 四年购买了 Yahoo 股票至今没有卖掉，不是“连续”拥有吗?)，又要求 TD Ameritrade 专门写一份“连续”拥有的证明；(2) Yahoo 用别的 SEC 条款攻击我们的提案内容不值得反驳，因为那正是必须在股东大会上由股东投票才能决定的。所以，在收到“连续”拥有的证明后，我们又于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致函 SEC 并转 Yahoo。

三月十二日，Yahoo 又致函 SEC (并转我们)，仍然坚持要排除我们的提案，但口气变得缓和。从其转印的名单上，可以知道 Yahoo 在雇用知名的 O' 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事务所 (该事务所有上千名专业律师，在中国也有分所) 来处理我们的短短一页的卑微提案。另外，从 Yahoo 二月七日致 SEC 的一大叠材料里，我们知道纽约市政府代表属下的行政、教育、警察、消防等广泛部门的退休基金股东也于二 00 六年十二月五日提交了类似的 Internet Censorship (互联网检阅制度) 提案，而 Yahoo 同样阻挠将此提案提交股东年会。我于三月十五日致函 SEC 并转 Yahoo，建议 Yahoo、我与 Andrew Zhao 和纽约市政府三者妥协，提出单一修正提案诉诸股东大会表决。与此同时，我们都在不安地等待着 SEC 的表态。

三月三十日，Yahoo 直接致函我和 Andrew Zhao，准备了两份类似的董事会反对我们提案的声明，打算放到股东年会表决书中。我们的努力

没有浪费，起码 Yahoo 董事会在倾听我们的要求了，在反对声明中也许下新的诺言。Yahoo 董事会的反对立场并不离谱，我们完全放任所有股东的判断。但 Yahoo 的反对声明中罗列了一大堆公司、大学、非赢利机构，包括“记者无疆界”的名册作为同盟，真是又可气又好笑。我们分头联系其中的各机构，获得“记者无疆界”的回复，说他们与大赦国际准备联名就 Yahoo 滥用他们的名义阻挠我们的互联网自由提案表示抗议。我于四月四日再次致函 SEC 和 Yahoo，要求 Yahoo 取消这一串机构的名字以免误导股东大会。

四月六日，我们接到等待已久的 SEC 的回复。这份来自 Special Counsel（特别律师）的传真只转印了一个叫 Derek B. Swanson 的律师顾问三月二十九日写给 SEC 下属的公司财务部总律师的简短意见。这位律师顾问认为 Yahoo 二月七日的材料表明提案者（我们）似乎没有在十四天内提出令人满意的材料证明我们拥有 Yahoo 股票，所以如果 Yahoo 忽视我们的提案，他们（公司财务部）将不向 SEC 推荐强制要求 Yahoo 加入我们的提案。至此，老练的 Olsen 结论到：让我们明年再挑战吧（插图为笔者与友人在 2007 年雅虎股东大会上）。



当然，如果我们在政治上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可以直接游说 SEC 的主席（从加州选出的国会议员 Cox）。不过，我们的原则要求我们尽可能回避政治家，而这一次并没有同时也挑战 SEC 的准备。这次了解了整个过程，可以说达到了主要目的，没有必要与 SEC 计较。实际上，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么多大公司的股东年会表决中，除了一两项公司董事会提案（主要表决新的董事、决定会计公司），大多数的良知提案都来自象我这样的“微小股东”，美国的企业界和其代理利益团体正在设法改变 SEC 的较民主的条款，提高提案所需的股份额（目前只是两千美元），以消除这次 Yahoo 为排除我的提案所付的“麻烦”。对我们而言，趁 SEC 还没有完全被大企业集团控制之前，除了联系更多的“经济公民”（股东）继续挑战 Yahoo 外，还准备对跑到美国股市来上市的中国大公司（如百度等）教育一番。没有制约的超级大公司，与没有制约的政府一样，都会堕落成腐败的权力，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的途径监督、制约、改进他们。

[注：本文中提及的相关原始文件，都可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址 <http://cpri.tripod.com/yahoo.html> 上查到。]

补注：多伦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ronto 研究人员 Nart Villeneuve 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发表在 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以及 OpenNet Initiative-Asia 上的报告称，他们掌握的证据显示中国一家 Skype 合资企业一直在监控用户在互联网上的文字聊天纪录，并把那些包含了政治敏感内容的讯息储存在可以从公司外部进入的服务器上。这种监控和储存行为导致数百万条纪录被暴露，这些纪录包括 Skype 中国服务用户以及 Skype 语音通讯使用者的个人信息。此消息使人吃惊意外。

[2007 年 4 月 17 日（美国个人年度付税截止日） 美国圣拉蒙]

### 33. 出席 Chevron 雪佛龙公司股东大会

两年前，当我刚搬到旧金山海湾东部山峦美丽的 San Ramon 圣拉蒙市时，发现 Chevron 的总部竟然在这里。去年，我有意图地买下了 Chevron 的股票。今天早上不到八点，我开车到 Chevron 总部正门时，遇到我预想到的近百名抗议人士。这些以年青人为主体的戏剧性的衣着（白大褂）、美观的设计标语以及音乐般的口号，正是我熟悉的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的抗议方式。实际上，我三月十六日（周日）去 Chevron 在 Richmond 港湾的炼油设施抗议时，就知道了这些以伯克利大学学生为主的人士。那一次有近三百人参加，象征性地把炼油厂的道路和港口都堵塞、封锁了起来，大家载歌载舞一派节日景象，把我带回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日本组织声援中国民主运动的情景。我当时与他们的组织者约定，要来参加今天的 Chevron 股东大会。比起我们都敬佩的美国无政府主义斗士柏克曼，今天我们不必持枪去惩罚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代理而坐牢了。另一方面，比起抗议那些躲藏在层层装甲警卫包围中的全世界统治阶级的代理人政客们，在股东大会上直接推动人权政策等，更有效果和价值。

除了公司正门外的警车，我注意到公司里也停了两辆警车，沿途有不少保安人员和公司职员，颇有“如临大敌”之感，我的手机和相机也被要求放回车内。当我在会场入口看到几个印第安装束的人士，一下子意识到这家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在全球争抢资源时，积怨不少。

近来油价不断高涨为 Chevron 带来丰厚利益，其 2007 年总产值达到 2141 亿美圆（与八千万人口的越南整个国家的总产值接近），股票也上升 27%。公司的管理层很自信，会议很快顺利地通过了董事会提出的选举新董事会、承认会计公司、增加股票发行的三个提案。

第 4 号提案要求 CEO（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由不同的人担任。总部设在德州的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也是世界第一大公司）Exxon Mobil 今天也同时召开股东大会，其原初公司的创始人洛克斐洛的家族等大股东提案也要求 CEO 和主席由不同的人担任。这两个相同的提案都被否决了。我今天观察 Chevron 的 CEO 兼主席 D. J. O' Reilly 主持会议的表现，发现他不擅长应对 Chevron 这样的超级跨国公司必须面对的政治性事务，确信有一个独立的董事会主席（例如十名董事之一的原联邦参议员 S. Nunn）是必须的。近年来，相同的提案在别的公司股东大会也不断提出，可能会花上几年努力，形成一股强大趋势才行。

第 5 号提案是要求采纳全球性的人权政策。这个提案在 2006 年和 2007 年的股东大会上已经被提出，虽然没有被通过，但达到了相对的比例，故可以重新提交。一位旧金山大学的教师发言，说明这是旧金山大



学提出的唯一提案，鉴于 Chevron 在那些内战、无法制、腐败蔓延、没有劳工和环境标准等国度操作，有必要采纳人权政策维护股东的价值和公司的形象。我站起来发言，首先感谢 Chevron 股东大会给我发言的机会，因为我虽然想出席在北京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 4 月 15 日的股东大会，我的清华校友胡锦涛、吴邦国等权贵十几年来非法剥夺我的公民权不让我进入中国。我以自己在中国、日本以及美国受到的人权侵害的亲身经历，说明公司不能把保护人权的责任推脱给国家权力，因此支持这个提案。此提案受到 24% 股东的支持，虽然这一次没有通过，明年还会被提出。去年在 Yahoo 股东大会上认识的纽约市政府的 Dougherty，上月在 Google 股东大会上认识的大赦国际的 Tony，后来也发言支持此提案。

第 6 号提案要求公司报告在加拿大开采油砂时的环境影响；第 7 号提案要求采纳温室天然气排放的目标值；第 8 号提案要求制定选择所在国家操作的纲要；第 9 条提案要求报告所在国家的法律状况。整个会议变得炽烈起来，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很多发言因时间限制被强制打断，不得放到表决后的问答时间里进行。最多的发言抗议围绕 Chevron 在厄瓜多尔的环境污染问题，那几位从厄瓜多尔来的原住民实际上正在与 Chevron 打官司。有一个代表缅甸的妇女要求 Chevron 向军政府施压以改善人权，O' Reilly 说 Chevron 已经要求 EU 和 UN 向军政府施压，并捐款救灾。最火爆的情形是 O' Reilly 与一个来自尼日尼亚的黑人的对骂：O' Reilly 声称黑人属于犯罪集团，绑架 Chevron 的雇员；黑人则指责 Chevron 雇佣警察直升机杀害当地居民，他们也正在起诉 Chevron。我座位边的一个妇女问我，是否大家都有发言权，我鼓励她讲。她是伊拉克难民，说 Chevron 去伊拉克采油，当地人没有工作了。所有其他的董事都保持沉默。董事之一的原联邦参议院武装事务委员会主席 Nunn 与基辛格等美国退休官僚今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废除核武器，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很想就核能源问题请教他和 Chevron 公司。最后，O' Reilly 见事态不妙，在十点钟打断发言，说有诉求的人可以留下来继续与公司的头脑们对话，宣布结束股东大会。

我们从会场出来时，公司不愿股东们在正门遇到抗议的人士，让我们开车绕道从旁门出来。我把车停在附近的商店停车场，到正门口与抗议人士交流，看到那几位印第安和尼日尼亚人士出来与大家联欢并接受记者采访。晚上我从网上读到各媒体的报道，多数都如实地介绍了会场内外的抗议情形。看来，跨国公司的股东大会正成为全球动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场。

[2008 年 5 月 28 日 美国圣拉蒙]

### 34. 国际经济学的政治条件

今天我们所知的国际经济学，只是围绕着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展开的理论，除此之外并没有“马克思主义国际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它目前有两个明显的矛盾特征：一、在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及较小范围内的世界银行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机构、体制）支配下的国际经济政策与实践越来越深入地影响世界各国的民众的远远超过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二、作为理论的国际经济学越来越显露出狭隘的利益局限性，堕落成权利与财富拥有者的工具。

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则成为国际经济学的出发点。从抽象的理论意义上看，社会分工论与自由贸易都可能为全体人类带来更大利益，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不同的国家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时自觉或无意识地强加或利用了不同的政治条件。遗憾的是，国际经济学本身放弃了经济活动中的政治、道德研究而屈从于被国家操纵的“主流”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学虽然越来越多地强调经济因素，但几乎没有政治学者研究经济学本身、没人过问国际经济秩序的非合理性（注 1）。

不可否认，国际经济学的技巧、方法方面可谓相当发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数学模式、计算机分析甚至极大地丰富了数学·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但它也带有两个负面效应：一、精于计算的经济学者往往忽视经济活动的人的属性，甚至以除去价值判断因素为目标，实际上使他们屈从于最肤浅的价值判断；二、许多没有受过较严格数学训练的经济学者误用、滥用数字表格自欺欺人。当然，这后一项缺点也是许多别的人文学科的通病，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国际经济学的最大理论缺陷在于当它从最简单、抽象的（因而也是不易为人们所反对的）“自由贸易促进全体利益”的李嘉图模型逐步推演到复杂的、现实的国际经济活动（如美国-西哥贸易、中美贸易谈判）时忽视了制约这些经济活动的国际政治条件。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与杂志（注 2）都只谈物与钱的周转而避开人的移动或者把人的移动至于钱物的移动之下。如果说普通经济学不得不面对雇佣与失业、资源与人口、教育与贫困以及税收、环境等人的因素而多少体现出“一人一票”的民主主义精神（注 3），国际经济学则完全偏注于竞争、汇率、资本、市场等“一美元一票”的利润关系，不能控制钱·物的人没有资格谈国际经济学。怪不得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学家在任何国家都异口同声地非难政治家、利益团体不懂科学—国际经济学。实际上，他们本身已经成为最高级、虚伪的利益集团在世界范围内为自身追逐最大利益。

国际经济学的毕业生们在任职西方政府的商业、外交部门时也谈到“人权”，例如，囚人的产品是不能进口欧美日市场的。在这一点上，与其指责其虚伪性（即不发达国家的囚人产品因价廉而挤垮发达国家的市场），到应该承认这是一个进步，即它们多少联系起国际经济学中的人的因素。更进一步，应该明确指出：与别的经济学分科一样，既然经济活动的产品·服务都是人制造·消费的，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就是“人”。当代国际经济学的缺陷、或者说是堕落，就是它脱离了“人”（即人类整体的利益）而附属于物·钱（即控制财富的越来越少数的“精英”阶层）。

与囚人的产品一样，奴隶的产品也不被认可为“自由贸易”的交换产品，因为它不符合李嘉图的自由贸易论原旨。实际上，自由贸易的首要前提是自由劳动，即劳动者的自由移动。如果美国内有一半的州保有奴隶就只得靠内战来解决的话，如果美国人在不同的州间自由移动是美国经济正常运行的不可缺少的条件的的话（注4），如果欧洲联盟（EU）在货币统一的同时允许劳动者自由移动寻找较好的待遇的话，为什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亚太经济合作 APEC、世界贸易组织 WTO 内的劳动者就不能自由地移动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劳动者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自由移动，跨国公司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被限制了移动权利的廉价劳动力。对于被限制了移动权利的劳动者而言，他们还不得不欢迎跨国公司来剥削它们，因为他们的所在国政府早已被跨国公司所收买。这就是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及为这个体系服务的国际经济学的本质。

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广泛的政治运动外，必须改变整个经济学、特别是国际经济学的价值取向，使它为“人”服务。从窄意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的改革诉求上，“开放国界”或“人的自由移动”应该是自由贸易的必要政治条件；否则，所谓的“自由贸易”只是变相的奴隶贸易，必须被摧毁。

注1：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除了利益支配下的不同政治观点表述外，研究者往往用“台湾半数以上的 FDI（外部直接投资）代替对海峡两岸经济活动的研究来说明其政治含义。

注2：如 Paul R. Krugman &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Addison, Wesley, 1997. 这是目前最时髦、最权威的专著！

注3：实际上，随着冷战结束后英美式的股市驱动型资本主义的“胜利”，日式式的注重福利型的“社会资本主义”被迫转向，资本主义中

的经济民主性已经趋于死亡。

注 4：前几年高科技经济兴旺时，有不少人从别的州搬到加州来工作。贪心的加州政府收取它州汽车四百美元的“环境保护费”。不服的人控告到联邦法院，法院以“妨碍州际贸易”的罪名判决加州政府要赔偿损失。

[ 2002 年 6 月 17 日 美国圣荷西 ]

### 35. 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治条件

从钱里赚钱是一种“原罪”，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教义。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源泉古希腊也谴责“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行为，伊斯兰教对于金融交易的禁止更苛刻，至到今天，这种“原罪”意识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影响深远。从事金融交易最频繁的犹太人被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描述成“高利贷”吸血鬼，这个描述成了历史上世界各地排犹的一种工具。

虽然古罗马、中世纪的威尼斯、近代的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等已经存在着“国际性”的金融交易市场，但只有在大英帝国炮舰支持下的伦敦交易市场才首次成为真正的全球性金融中心。1720年第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伦敦市场的交易资本已经达到五亿英镑。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仍然长期受制于英国的美国，是伦敦金融市场扩张的最大市场。今天，“工业（制造业）革命”发祥地英国只剩下金融“产业”在国际经济中依然还最有“竞争力”，这种安格鲁-萨克森式社会·经济自由竞争模式，在美国进一步成熟、扩张，直到冷战结束后击败日本·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正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复制，主导目前的全球化进程。

不过，金融资本如何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市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是由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在美国，早期所谓摩根财团担保美国金融市场的神话是基于美国殖民扩张（特别是铁路开发）的天然优惠条件。精明的摩根看到：经济上脆弱的政府不可能提供资金开发新市场，在经济剧变（不管是获利还是风险）条件下，靠固定利息不容易、也不便举债（debt），而股份式基金（注1），既投合投机者的欲望，又不承担破产时的还债义务。从这一点看，资本市场的扩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问题是如何制约。美国直到1929年纽约交易市场的大跌落，经过数年反省，才迫使联邦政府于1934年不顾金融行业的反对，制订《证券交易法》，并于次年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督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如果说英国在1720年、美国在1929年体验并明白了不受制约的金融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可怕影响，日本则直到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之后才制订相对全面的法律规制股票交易。这也说明金融市场在日本还不“发达”。笔者1986年至1995年在日本学习、工作期间从未购买过一份股票，当我在公司里读到诸如“禁止内部交易”之类的通知时，感到这与自己毫无关系；绝大多数日本人也不购买股票。日本的上市公司，多数股份被所属企业集团的银行或公司持有或互相持股，很少交易，只提交年度财务报告（不象美国公司必须提交季度报告等），不必担心股东大

会的挑战。由于可交易的股份很少，加上各公司用以担保的不动产资源（土地）在日本奇缺，日本的股市主要被银行直接地和政府间接地操纵，在1987年10月底，几乎没有外国资本的日本股票市场，股市价值换算成美元后，首次超过了美国的股票市场，由此也可见金融“产业”远离实际的商业价值，是特殊国际政治条件和畸形经济体系的产物和象征。回顾起来，如果日本、德国战败之后，在强大的“行政指导”下复苏的经济体系不压抑、“指导”金融业（让其只作为“服务”行业），哪能有它们的“经济奇迹”？

1987年以前，各国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但自从同年十月的全球性股票市场同时跌落之后，西方金融市场已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1992年9月，试图维持英镑价格的英格兰银行灰头土脸地被“防避”基金（注2）投机家索罗斯击败，象征着连英国这样的超级主权国家也不能控制自己的金融政策，更何况象墨西哥这样的第二流国家，在1995年的比索贬值危机中，连讨价还价的手都找不到！墨西哥政府就这样被“市场”抛弃了。到2007年，我们已经面对这个事实：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在内的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已经逃脱不掉国际金融“产业”的摆布了。

所有的美国股票投资资料（以华尔街日报为源泉）都津津乐道地列出以道琼斯工业平均DJIA指数，S&P500指数等经年变化的上升图鼓励人们将资金投入股市，而很少或回避不提股市上升是由于投入股市资金增长的结果这一基本事实。对于英美而言，自从八十年代撒切尔夫人一里根执政以来，把年金和退休基金完全开放给金融市场，让没有接触过股票的几乎所有有固定收入的家庭，都通过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股票。据统计，美国家庭在1980年时只有5.7%持有共同基金，到2001年，此比率达到52%（注3）。在2001年，英美投入股市的年金和退休基金总额超过其GDP的半数，平均每个美国人投入股市的个人管理资金达到\$23780，而德国只是\$3800，法国只是\$1600。因为欧洲的年金都由政府掌管，德国从2002年开始才允许个人拿出免税收入的1%投入保险或共同基金。这就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德法的金融市场软弱不振。不过，没有受到金融市场摆布的欧洲经济，以欧元对美元的强劲上升比率来看，是更正常发展着的。

金融“产业”的这种不扩张就衰亡的特征，在2007年得到明白的印证。一方面，美国金融行业不得不盲目、愚蠢地延伸到自2001年来高科技产业衰退以来增长到尽头的房地产业，引发了次级贷款市场的危机。由次级贷款市场引发的危机导致了金融行业的危机，华尔街的所有超级金融机构，除了Goldman Sachs外，都在房屋贷款投机中损失数十以至上百亿美元，其股价跌了一半左右，等待着中东产油国、新加坡和中国

的不透明“主权”国家控制基金或者专制王子的解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行业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南美等地扩张了市场，勉强维持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微弱上升趋势。但是，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几乎已经达到尽头。例如，中国的股市价值，已经超过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本的股市价值（注4），其代表性的上海证券指数，在达到六千点以后，下跌了百分之二十，现在虽然有所回升，但不可能重复2007年那样的膨胀。那么，问题就是：已经全球化了的国际金融市场会如何发展呢？答案很简单明了：这取决于国际政治变化的条件。

如果美国政府仍然被小布什那样的人物（例如与中东专制政权联系密切的前任纽约市长Giuliani、本人为金融大亨的现任纽约市长Bloomberg和靠自己的风险投资财富竞选总统的前任麻州州长Romney）控制，华尔街会推动联邦政府把最后一笔由政府掌管的大型公共资金——社会安全基金——私有化，投入股票市场。这是迫使政府放弃对人民的最大“社会契约”，把联邦政府变为五角大楼的附属机构（目前联邦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都与军事相关）。所幸的是，所有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以及在爱荷华首战胜出的共和党候选人哈克比都反对政府的这种自杀行为。一般人也普遍预测民主党会赢得2008年总统大选。这也是华尔街日报连日来对总统大选焦躁不安的原因。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应该不至于为了“救市”而放松社保基金的管理，但其控制的规模2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公司CIC的民主化决策过程却是国际金融关注的一大焦点。它的第一笔投资就是在正式成立之前的2007年5月20日用30亿美元买下第一个在美国股票市场公开交易的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黑石集团Blackstone（也叫百事通集团）的非投票权股票（注5）。这个代号为BX的公司在2007年6月21日定价每股31.00美元，22日以每股36.45美元上市开盘（IPO），当日冲到每股38.00美元，此后一路下跌，在2008年1月9日跌到每股17.30美元。当我们读到中国投资公司头头自我陶醉的第一笔投资公告时，第一个反应就是：黑石集团用什么手段收买了他们？中国政府有什么法制监督他们？中国公众有什么权力制裁/撤换他们？

在非政府的实际运营层面，也有很多作为。极个别有远见的公共人物，如前副总统戈尔，就利用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机会，投身普通人不可能介入的风险投资行业，试图带动富翁们进行“良心”投资。近年来越来越活跃的“防避”基金、私募基金等投资行业，对世界经济的支配越来越加强，却又几近黑箱操作，没有任何主权国家或国际机构可以制约它们，如能有戈尔这样的公共人物参与，会得到某种信任。但是，戈尔的主要目的，是在已经衰落的互联网产业之外，用金融资本再兴起的“绿色产业”，以帮助美国和民主党。这种作为，一方面遭到政治

上强大的能源等传统产业的抵制，一方面也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参与。对于大多数持有一定股票的美国住民，如何利用 SEC 这样的较民主的保护绝大多数小股东利益的规制机构和法律监督、制约“一美元一票”的非民主运营的上市公司的运行，更显得迫切。笔者从去年开始，尝试在国际公司（如 Yahoo）的股东年度大会上以微小股东的身份通过提案发言等机会在政策方面影响公司的决定，产生了超越微小股票份额限制的效果。从理论上讲，如果很多小股东都这样行动起来，大公司不考虑这些要求就很难运营。何况，SEC 毕竟由国会议员控制，民众可以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影响议员，甚至改变金融政策。

当然，从根本上看，在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全球性的民主化（例如，各个国度的民主化、对证券管理委员会的民主监督和选举，以及无钱者在各个国界之间的自由移动以寻求工作机会）才能彻底克服金融市场全球化（如有钱者可以无视各国法律在国际上自由移动）给世界带来的危机。连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主席也开始呼吁政府和公民社会来参与全球公司的社会责任（注 6）。如果我们不急迫在政治上行动起来，整个人类的前途可能很快就会陷入操纵在一小撮跨国利益集团之下的国际金融资本的奴役之中。

注 0：本文写作时主要参照了 Mark Smith, *The Equity Culture: the Story of the Global Mark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和 Hirt-Block, *Fundamentals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 Eighth Edition, McGraw-Hill, 2007 两书以及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注 1：英文里的 equity 这个词，用在金融行业，指“平等地”分担风险和利润的机会，而不是结果。

注 2：hedge fund 这个用词本身就很诡秘。有些中文译为“对冲”或“套利”基金倒很形象。

注 3：Fundamentals, 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 Research In Brief, Vol.12/No. 4, October 2003 (<http://www.ici.org/pdf/fm-v12n4.pdf>)。

注 4：英国《金融时报》Geoff Dyer 2007 年 8 月 29 日上海报道：“中国股市市值超过日本：如果算上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日本股市昨日收盘的市值为 47000 亿美元，而中国市场的合并市值为 47200 亿美元”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13767>)。

注 5：China's State Investment Company to Acquire Non-Voting Minority Stake in Blackstone ([http://www.blackstone.com/news/press\\_releases/05-20-2007.pdf](http://www.blackstone.com/news/press_releases/05-20-2007.pdf))。



注 6: Klaus Schwab, Global Corporate Citizenship, Working With Governments and Civil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2008 年 1 月 13 日 美国圣拉蒙]

### 36.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二〇〇七年一月四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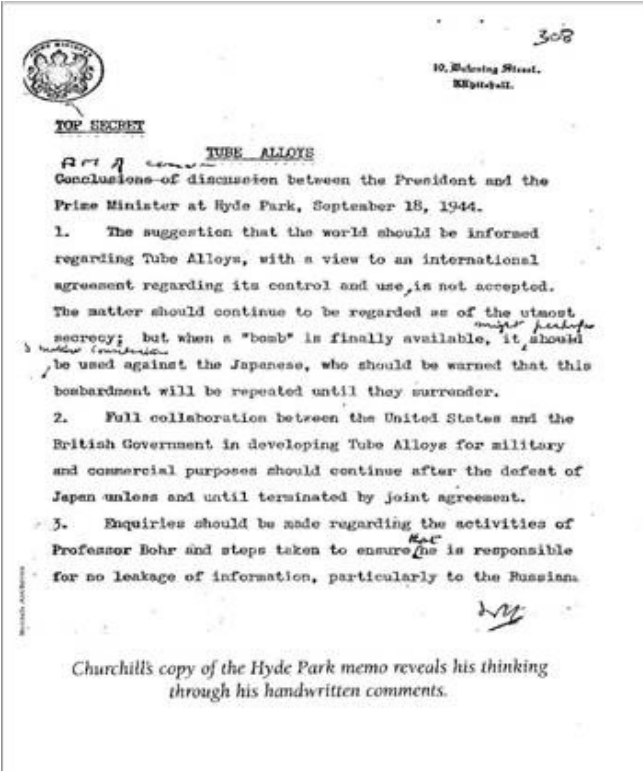
今年一月十五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在十九——二十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核武器

([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http://online.wsj.com/article_print/SB120070618605501959.html))。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几乎同时(二〇〇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产生于战争，战争产生于人类的罪恶政治制度。只要人类依然摆脱不了国家机构的暴力宣传，以为国家暴力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核武器这个战争最极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认识到核武器对全人类威胁的正是最受尊敬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 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致函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坦等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

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 FBI 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一九四四年底，纳粹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学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家 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 155 名科学家要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入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己威力的理由？当 Joseph Rotblat 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一九四四年圣诞前夜离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核医学研究，并创立 Pugwash 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一九九五年与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 2009 年财务计划 <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总计 9876 亿美元的预算中，国防部占 5154 亿，国土安全部占 376 亿，退伍军人事务部占 448 亿。不计能源部 250 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 5978 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61%。与此同时，商务部与国际项目 383 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4%；教育部 592 亿美元，占总预算的 6%。我们还可以比较：从 2001 年到 2009 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国防部（3025 亿）、安全部（140 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224 亿）的开支从 3389 亿到 5978 亿，猛增 76.4%，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到足够的信息教育，知道我们（包括交税的笔者）的联邦税大多数用于军事开支，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和平！核武器不能废除，战争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民众（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败、压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动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最新的美国联邦政府预算数据(单位：亿美元)

主要部门	2001实际	2008实施	2009要求	变化			
				2008 - 2009		2001 - 2009	
				美元	百分比	平均	累计
农业	192	218	208	-11	-4.8%	+1.0%	+8.0%
国防	3025	4795	5154	+360	+7.5%	+6.9%	+70.4%
教育	401	572	592	+20	+3.5%	+5.0%	+47.6%
能源	200	239	250	+11	+4.7%	+2.8%	+24.9%
健康与人事	540	719	704	-15	-2.1%	+3.4%	+30.2%
国土安全	140	349	376	+27	+7.7%	+13.2%	+168.8%
住房都市开发	284	374	385	+11	+2.9%	+3.9%	+35.7%
法务	184	227	203	-24	-10.7%	+1.2%	+10.4%
国务与国际	217	329	383	+54	+16.5%	+7.3%	+76.2%
退伍人员事务	224	394	448	+53	+13.5%	+9.1%	+100.1%
宇航	143	171	176	+05	+2.9%	+2.7%	+23.6%
总计	6438	9414	9876	+462	+4.9%	+5.5%	+53.4%

当我一九八〇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没有采取强制

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 FBI 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 2004 年申请十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 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 FBI 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 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与一切人类罪恶。

[2008 年 2 月 25 日 美国圣拉蒙]

### 37. 美日安全保障合同委员会(注 1)

美日安保条约的核心是第六条，体现第六条的是《驻日美军地位协议》，而实施《地位协议》的机构就成为平时美日军事同盟的实际执行者。

#### 1. 合同委员会的来由与构成

《地位协议》第二十五条第 1 项规定：“一个合同委员会将被设立作为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协议关于实施本协议的所有必要的事项的机构。特别地，合同委员会作为协议机构将决定美国为了实行安保条约目的所需使用的日本的设施与区域。”实际上，合同委员会的存在，早于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条约及《地位协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之后的一九五三年，为了确保占领期结束后仍然赖在日本不走的美军的“合法”特权，按《行政协议》第二十六条成立了合同委员会。很显然，从一开始，这个合同委员会就具有主（美国远东军方）、从（日本政府）关系性质，按照美军的要求维持、强化美军基地。《地位协议》第二十五条完全是沿用《行政协议》第二十六条的内容，同一组织(包括在《行政协议》有效期间所作的决定)继续运营。

《地位协议》第二十五条第 2 项规定合同委员会的构成，由双方的代表与其下的事务机构或分科会组成。实际上，合同委员会的代表们通常每两周碰头一次(多在东京)，开会时只是确认、签署分科会的报告，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注 2)。

美国政府代表是在日美军参谋长，代表助理包括在日大使馆公使、在日美军司令部第五部长、在日美军陆军、空军、海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参谋长等六人，七人中只有一名文官。而日本政府代表是外务省北美局长，代表助理包括外务省北美局审议官、防卫厅参议官、防卫设施厅副厅长、法务省办公厅主任、大藏省大臣办公室审议官、农林水产省构造改善局长等六人。这体现了在美国占领下的行政协议的不平等关系，日本政府从外交、国防、法律、财务、土地等相关领域配合美国驻军的需要。对于美国来说，合同委员会协议的事项只不过是服从五角大楼在亚太地区军事战略的战术性选择，与美国本身的政治、社会状况没有多大关系。

日本政府的代表成员，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官僚实权机构(注 3)。他们的任务并不是代表日本的民众或国会、政府与美国交涉，而是如何完成美军指定的“任务”，特别是防止那些伴随美军驻留带来的事务性、技术性问题政治化而危害美日同盟关系。1995 年冲绳少女被强奸事件后，日本政府不敢答应民众要求通过合同委员会与美国交涉修改《地位协

议》第十七条，只得到美国方面的没有法律效力的承诺：以后出现类似残暴事件会“好意地考虑”在起诉之前把嫌疑犯交给日本警察。

更进一步讲：这个在北约军队地位协议中没有提及、在驻菲律宾的美军地位协议中也不存在(注4)的合同委员会的设置本身就是美国占领政策的隔代遗传。

## 2. 合同委员会的目的与任务

比起北约的驻军地位协议等类似协议，只有二十八条的《驻日美军地位协议》相当简略，为合同委员会付与了广泛的权限，许多与安保条约或《地位协议》没有直接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事项也在合同委员会里协议、决定。

合同委员会在《地位协议》中被规定为协议机构，合同委员会本身不能直接决定美军驻留事项。美国方面明确声明：合同委员会关于美国主权的事项必须由美国政府和国会决定(注5)。当然，由美军主导的合同委员会不会、也从来没有为难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本本来也应该持相应立场，特别是因为协议的几乎所有事项都涉及到日本的主权，但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在国会遇到反对党的抵抗或日本民众的注意，肆意曲解为：

“合同委员会关于与《地位协议》通常运用相关事项的决定(即所谓合同委员会“合意事项”)，作为实施细则，对于日美两国政府有约束力”(注6)；合同委员会的日本代表同时代表日本政府本身，所以其署名的文件既代表日本的合同委员会方面又代表日本政府，要忠实地去履行协议之决定。

例如，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才被迫公开的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关于提供冲绳基地的合同委员会合意，只有合同委员会的美、日方代表的一次性署名。本来，美国在归还冲绳的施政权与主权时，应该把在冲绳的美军基地也一同归还给日本。关于这些基地，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安保条约及相关法令是否适用于冲绳？第二、如果适用，按照《地位协议》第二条的规定，日美两国政府必须就冲绳的88个基地每一个单独地协议是否允许美军使用。不用说，这样的涉及日本主权的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日本国会审议(注7)。但日本国会直到25年以后才知道：连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也没有审议通过，导致美军继续强占冲绳235平方公里专用基地(占驻日美军专用基地的75%)的、制约着日本的主权“国际协议”，只不过是合同委员会的日本代表吉野文六签署的合同委员会“合意事项”而已。

负责旧安全保障条约与《行政协议》交涉的原外务省条约局长西村回顾说：“《行政协议》比安全保障条约更直接地影响国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行政协议》必须不断根据实施的情况改善下去，合同委员会作



为协议机构的意义即在于此”（注 8）。但实际上，合同委员会的协议事项却不断朝着更密切地配合在日美军驻留、展开而“改善”下去。合同委员会“协议”的事项，只要与美军驻留有直接或间接（甚至包括其亚洲太平洋战略）的关系，整个日本领土、领空、领海，都可以被考虑为美国驻军服务。

例如，地位协议并没有具体规定美军的航空管制权及优先飞行权，正是在合同委员会里做出的决定出让了日本的领空主权。冲绳首府那霸机场因为离美军嘉手纳基地和普天间飞行场（注 9）太近，为了避免冲突干脆完全由美军把领空管制起来。这也是由 1972 年 5 月 15 日的合同委员会决定的。再如，日本法律禁止制造和使用有毒的有机化合物 PCB（C6H5C6H5 的钠置换体），美国方面在 1977 年的合同委员会环境分科会询问日本方面是否有 PCB 处理装置。日方合同委员会本应该就此要求美军停止在日本（当然包括在基地内）使用 PCB，但日本政府不敢这样做。结果，美方又于 1985 年要求日本合作、撤走含有 PCB 的变压器，1987 年干脆要求日本政府代为保管 PCB（因为美国国内法禁止）。直到 1992 年 4 月，自 1986 年以来放置在嘉手纳基地田野里的变压器中漏出的大量带有 PCB 的绝缘油污染了附近住民的饮用地下水，才迫使合同委员会认真考虑“改善”，由日本代为处理。

对于美军明显超越、违反《地位协议》的行为，合同委员会日本代表从来没有要求美军遵纪守法，而是曲解协议或者干脆重新制造违反《地位规定》的规定以配合美军行动。例如美军在基地外的行军开始时被解释为“基地之间移动”，但有些行军并没有在第二个基地停留而是回到了原出发基地（注 10），这样的行为最后都由合同委员会追认。

### 3. 黑箱操作的秘密机构

由合同委员会产生的协议结果被称为“合意事项”，外务省说明其为对美日两政府有约束效力的“决定”。据外务省回答，至今已经产生了约四千件“合意事项”，但在一九五二年五月七日的第一次合同委员会会议时通过的第一个“合意事项”就是“不公布合意事项”。至今为止，外务省只公布大约一千项的并非原文的“合意内容”或“合意概要”。只有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公布过关于机场噪声的合意事项“全文（日语试译版）”。合意事项的正文都是英文。

有些场合，日本政府的官告与美军的实际演习训练内容相关太大，当地政府与住民向美军提出抗议。美军告诉住民们说，美军的行为是根据多少多少号合同委员会的“合意事项”。住民们向日本政府询问，外务省才公布相关合意的概要，住民们才知道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觉中被外国军队限制了起来（注 11）。1973 年 4 月 24 日开始，美军常常越过冲绳

县道 104 实行实弹演习，但日本政府防卫设施厅第 12 号告示只是通知：“在不妨碍美国的活动的条件下，允许当地住民通行”，没有人想到这是基于 1972 年 5 月 15 日的合同委员会决定。

经过许多次抗争，冲绳的民众逐渐意识到他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受制于 1972 年 5 月 15 日的合同委员会决定。1997 年 3 月 25 日，桥本首相在大田知事的直接要求下，被迫公布了《昭和 47 年 5 月 15 日合同委员会关系文书》共 257 页(英文)、加上 263 页图表。不用说，这是冲绳民众几十年反基地抗争的一项重大成果，日本民众以及日本国会才第一次知道这一天的合同委员会决定了许多丧权辱民的事项：电气通讯、电波、税务、军事银行、雇用、航空管制等等（插图 2004 年美军直升飞机撞坏的冲绳国际大学建筑）。



相对于关于日本本土内的事项，1972 年 5 月 15 日合同委员会关于冲绳基地的决定还显示出日本政府为了保障美军继续享有自军事占领以来的特权对于“内殖民地”冲绳的歧视和出卖。例如，被疑为储存有核武器的边野古弹药库基地，只标明使用目的(弹药库)，没有规定使用条件，连日本的《火药取缔法》中规定的消火、保安措施也没有；在 24 个允许冲绳电力系统职工出入的基地中，“美军对于所有因为许可使用或伴随使用发生的财产损害、损伤或死亡，……不负责任”。

1995 年 12 月，美军为了改造以佐世保基地为母港的强行登陆舰，突然通知佐世保重工业公司(SSK)要专属、无偿地利用其第三船坞六个月，这将给 SSK 带来三百多亿日元的损失。整个 SSK 公司、工会与佐世保市议会都群起抵抗。美军出示至今不为人知的、由美军海军佐世保基地司令、日本政府佐世保防卫设施事务所长与 SSK 公司社长三者 1968 年 8 月 13 日签署的合同委员会秘密“合意事项”，上面明记到：“以七天之前通知为条件，第三船坞或者美军可以接受的代替设施，……可以被美军无偿优先使用”。

原来，合同委员会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而存在的。

#### 4. 合同委员会中体现出来的美日同盟关系

合同委员会黑箱操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日两国政府不愿将合同委员会中体现出来的美日同盟关系暴露于众、引起日本民众的抗议。在隐藏情报方面，日本政府比美国政府作得更严密，日本的研究者或民众有时可以从美军的报告书中知道某些驻日美军冲突事件的缘由。

例如，1994年，美军飞机沿着高知县早明水库上游的河川进行120米高度的超低空训练而坠落，日本政府强辩这是“地位协议上允许的通常飞行训练”，不敢通过合同委员会要求美军终止，只能“向美方提供地图等告诉什么地方人口稠密，美军也在参考我们的情报”（注12）。“去年12月在这里举行过低空飞行训练。我们在合同委员会上，告诉美方在大鹿村、长谷村地域有电线或者架设电线的直升飞机，也提供了人口密集分布状况等情报，请求美军考虑”（注13）。

几十年来，在安保条约中规定的那种对于日本的进攻事态或威胁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没有发生的可能。这本来就是对合同委员会、《地位协议》以及安保条约的存在意义的否定。但自从1996年克林顿-桥本共同宣言以及所谓“安保再定义”以来、直到1997年的新防务合作指南，美军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也作为“日本周围”地域适用于安保条约的体制，《地位协议》成为把整个日本作为美军全球战略的后方支持基地的同盟分工协议，合同委员会的作用也必将随之扩展。

例如，关于美军对民用机场、港口的使用，合同委员会虽然决定限于“紧急的场合”，但在没有任何紧急事态的时期，美军飞机竟然可以一年内“紧急”利用日本的民用机场上千次，对于具有重要意义的机场（长崎机场）甚至一年利用三百多次。过去，日本政府还能区分美军基地与日本民间设施的不同，“如果美国方面要利用（民间设施）于战斗目的或军事基地的用途，我们将不含糊地拒绝”（注14）。现在，对于同样的问题，日本政府连过去的立场也不肯确认，只是回答：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研究之中。

按照这样的发展，更令人担忧的是：《地位协议》第十七条第11项规定：“当适用于安保条约第五条规定的敌对行为发生时，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的任何一方，有权在提前六十日通知对方后停止本条中所有规定的适用。美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在行使此停止权后，必须立即协议达成适当的规定代替已经停止适用的规定。”外务省秘密文件解释到：“发生适用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事态时，有必要扩大军事裁判权、军事警察权。以此念头才做出此规定”（注15）。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当美军在“日本周围”发起军事行动时，合同委员会有可能扮演起宪兵的角色，甚至“冻结”一部分日本宪法的权利（注16）。

如果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把日本置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之中，只是潜在地、间接地把日本民众拉入与亚洲民众的军事对立格局，《地位协议》就是直接地，现实地为了保障在日美军的全面行动自由而制约日本

主权、侵害日本民众基本人权的辱国丧权契约，而保证这一契约得以执行的机构就是美日安全保障合同委员会。

注1：英文名称为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有时也被译为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本文为了准确基本上按照日语的名称翻译。此文中的基本内容初发表于我1998年4月为 H-USA 写的书评 <http://www.h-net.msu.edu/reviews/showrev.php?id=1888> 以及发表在《中国与世界》1998年10月号的同名文章，2005年2月经大幅修订后收入《美日同盟》第四章“在日美军地位协议”的一节。

注2：参阅《选择》月刊1995年12月号。

注3：1995年美军士兵强奸日本少女事件后，当时任首相的社会党委员长村山虽然已经完全堕落到日本统治阶级的附庸，但面对冲绳民众的怒火不忍心动用国家权力再次强制征用已经到期应该归还于民的土地，竟然被“部下”防卫设施厅长官训斥一番。

注4：日本政府很委屈为什么美国连给予菲律宾的地位也不肯同样给予日本，杜勒斯回答说：菲律宾是美国战时的同盟国。1967年2月生效的美军驻韩国地位协议引用驻日地位协议设置了合同委员会，但仅限于实施条约、不能协议新事项。

注5：美国拉斯克参议员：“合同委员会的决定如果妨碍了美国的权力行使，就是对美国主权的重大限制，必须经过国会的承认”。

注6：外务省条约局与美洲局编《日美地位协议的解释》（秘密），1973年。

注7：即所谓“大平三原则”。

注8：西村熊雄：《论安全保障条约》，时事通讯社，1959年。

注9：嘉手纳町82.85%的土地为美军基地，被称为“基地中的国土”。普天间飞行场位于市区中心且设施陈旧，噪音等公害很严重，一直是军民冲突的根源。1995年以后，美国政府在冲绳民众的抗议下表示愿意归还飞行场，却附加另建一座先进的海上直升飞机场为条件。

注10：一九九五年夏天笔者与友人家小游览象征日本和平的富士山时，也曾遇到全副武装的美军战车。

注11：我刚到日本从事研究时，有一次参加平民区的夏令营，由衷地赞美日本的成就。一位年迈的女工听了责问道：“哪一个国家的民众在外国军队的占领下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注12：外务省北美局安全保障课长重家1988年12月8日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的答辩。

注13：外务省北美局长有马1989年11月1日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的答辩。

注 14：运输省大臣中曾根 1968 年 3 月 2 日在众议院运输委员会上的答辩。

注 15：上述内容直接引自地位协议研究会《日美地位协议逐条批判》第 166 页，新日本出版社，1997 年。本文还有许多间接引用此书之处但没有一一标出。此处的秘密文书应该是指外务省条约局与美洲局编《日美地位协议的解释》（秘密），1973 年（见注 7）。

注 16：1995 年《读卖新闻》刊登的「宪法修改草案」就包含有“紧急状态”下限制日本国民的部分宪法权利的内容。

### 38.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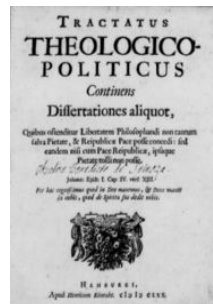
黑格尔说过：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是不可能的。我也同意一些斯宾诺莎研究者的观点。如果基督再生于十七世纪，他就是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 1632-1677)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 Espinosa, 因其犹太种族出身, 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那些居留于西班牙的犹太人, 为了享受与别人同样有公民权利与义务(主要是税务), 必须在表面上改宗、私下里奉行犹太教。继承这样的精神遗产的斯宾诺莎对宗教当然有独特的感受。

斯宾诺莎的祖先由此离开西班牙, 到葡萄牙避难。其祖父一代又逃亡到荷兰。斯宾诺莎诞生时, 其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进出口贸易, 在犹太人社区颇有地位与资产。这使他得以进入专门培养拉比的神学校, 掌握了希伯来语法、犹太法典(Talmud)以及中世纪犹太哲学等。斯宾诺莎也曾在德籍家庭教师指导下掌握了拉丁文, 这是当时欧洲思想界的通用语言, 斯宾诺莎的哲学著作即用拉丁文完成。斯宾诺莎后来又在正式的拉丁文学校进一步学习拉丁文以及广泛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同时代的笛卡尔哲学)。

斯宾诺莎二十四岁时, 终于因为坚持自由思考, 为犹太教会所不容, 被开除教门。市政当局也应教会要求下驱逐令, 他只得搬离犹太社区, 移居新教徒居住区。斯宾诺莎由此离开其父亲留下的商务, 以磨透镜谋生, 这多少损害了他的健康, 在四十五岁时因肺病去世。我有时候想: 如果斯宾诺莎按照法庭判决, 继承其父遗产而不是让给其姐姐, 或者, 在后来接受普鲁士候选帝的邀请到大学当个教授, 他可以为人多思考几年。不过, 那就不是斯宾诺莎了。

依我看来, 斯宾诺莎的工作, 主要分为三类: 自然科学研究(《笛卡尔哲学的原理》等)、认识论哲学(《知性改进论》、《伦理学》的一部分)以及宗教、伦理学(《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的一部分、未完成的《政治论》)。第一类工作于今天价值不大, 第二类工作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而只有第三类工作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关于人类生活的一些永恒命题的思想贡献。更进一步说, 斯宾诺莎关于政治的思考, 在三百多年的近代世界历史变迁后, 已经基本上有了结论, 其局限与历史进步价值已为世人所共识; 唯有其关于宗教、特别是《神学政治论》一书中关于《圣经》旧约的研究, 仍具有迫切的时代意义。



《神学政治论》(注)由三部分组成：一、如何对待、接受《圣经》，二、《圣经》旧约的研究，三、政治评论。第三部分引伸出来的关于政·教分离、思想自由的观点，已广为普及，无需赘述。关于《圣经》新约，斯宾诺莎只用一章的篇幅解释新约的使徒与旧约的预言家不同：前者借自己的天赋与判断论证、劝诫人们；后者传达神命与启示，超越普通人类理智。斯宾诺莎也指出：犹太人看不起哲学，使徒们对犹太人传道，迁就听众的脾气，所传内容与思辨完全无关。只有保罗（其并非基督直传弟子）具有哲学教养，并在犹太人之外的罗马世界与希腊文明中传道，才真正在实际上完成由基督开启的、把只适应于一个种族的犹太教转换成所有人类得救的普通福音。斯宾诺莎不懂希腊文，且深知新约涉及的思辨内容与水准都超出他个人的知识范围，没有进一步展开。

如何看待、研究、解释、接受《圣经》，对于所有的具有思考能力的非基督教背景的人，都是一个挑战。我们都自然地以普通理性出发，最终面临两种选择：如要贯彻下去，就得告别《圣经》如要选择在任何一个教派下的教徒生活，就必须对理性的普通原理加以限制。我本身于一九九二年决定接受洗礼，成为门诺 Mennonite Brethren 教派的成员，但我始终动摇于两者之间。当我认识到自己接受斯宾诺莎的观点，我也就成为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

斯宾诺莎以世界（自然）本身说明世界，以《圣经》内容与历史解释《圣经》，并达到这样的结论：“在我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我发现《圣经》的教义没有与我们的理解力不合、或矛盾之处。我发现预言者所说的无一不是极其简单，容易为大家领会的。而且，他们用种种理由以证实他们的教义，所用的文体感动人心极其深切，使人敬奉上帝”（P. 15）。斯宾诺莎能够达到这个结论。除了把神启与理智截然分开外，同时也对《圣经》旧约的内容、对神的观念重新认识，从基础上否定了世俗社会中各教派对《圣经》解释的垄断与争执。

当我读到《圣经》（特别是旧约）中的神迹或荒诞故事时，我试图跟随教友们，认为理智在此是一个妨碍。斯宾诺莎则相反：如果神迹要用违背理智的方式出现，这说明其不是神迹《圣经》中之所以出现神迹的记录，是因为人为的无知与错误。

例如：教徒们广泛认为《圣经》前五书是摩西所作，称为“摩西五书”。斯宾诺莎在第八章运用其“以《圣经》说明《圣经》”的方法（“凡是无《圣经》上的根据，或无《圣经》的基本原则以为保证，我们不可遽下断语。” P. 136），证明此五书不可能为摩西所作。实际上，不仅此五书，斯宾诺莎从内容、语法等方面考证出：“所有各书的题材之一贯，各书的联贯，以及各书都是书中所叙的事情发生许多年代以后编纂的，我们得一结论，如我方才所说，即所有各书都是一个史家的作

品。这位史家是谁，不大容易说。但是我疑惑是以斯拉”（P.136）。斯宾诺莎进一步指出：“以斯拉并没有把书中的叙述作最后的润色。他不过是把历史从不同的作家搜集了来。有时只是把各历史记下来，留待后人检查与整理”（P.142）。我不得不接受斯宾诺莎的方法以及一些基本结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圣经》中神迹的荒诞性。例如《圣经》有一处提到以色列返回迦南时渡河前夜，在梦里与上帝摔跤，打了个平手。类似这样的故事，只是反映出《圣经》旧约作为一个民族宗教，参夹着不少加强“选民”意识的人为之作，并不必认真计较。进一步引伸下去，既使在基督到来之前，在希伯来人的国家灭亡之后，希伯来人不必遵守摩西戒律（他们实际上也没有遵守），上帝与希伯来人的约定已经解除了。

这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中东冲突，非常有帮助。以色列建国，就是一个纯粹的国际政治斗争产物，与上帝赐与完全无关。当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物色一块属地“建国”，并没有考虑中东，因为那里多为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居住。基于犹太人对于反法西斯斗争的贡献，苏联考虑把克里米亚半岛设为“犹太社会主义共和国”并由此吸引犹太人的头脑与资金建设苏联经济。但美国与英国既不愿大量接受犹太移民，又不愿让犹太人跑到苏联境里，于是就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耶路撒冷建国。这当然与上帝完全无关。

斯宾诺莎对于《圣经》旧约的编纂也有不少疑问。例如关于两卷《历代志》：“我一向觉得奇怪，那些《智慧书》、《透比》和别的称为伪书的书摒之于《圣经》之外的人倒把这两卷书包括到《圣经》里”（P.158）。“有些法师想把《箴言》和《传道书》摒除于《圣经》之外，想把它们都归到伪书里头，……想到圣书的处置操在这般人的手里是很可叹的”（P.158）。

斯宾诺莎偏向于同意以斯拉的注解，认为约伯不是犹太人，《约伯记》也是从某种别的语言翻译成希伯来文的，《但以理书》的前七章是用迦勒底文写的。斯宾诺莎举出这样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圣经》之为神圣的，是有赖于我们对书中表示的教义的了解，不在表示教义的文字与辞句。也可以证明，凡是教导讲论最高圣善的事物的，不拘是什么，哪样的书都一样是神圣的，不管所用的文字是什么，或属于哪个国家”（P.162）。

至于《圣经》之为神圣的教义，就是极为简要的普通价值：一心一意服从上帝，履行仁义，或按基督所教导：爱上帝、爱邻人。为此，斯宾诺莎声明：“若是摩西和上帝面对面说话像一个人和他的朋友说话似的，基督就和上帝心对心交谈。”“上帝的智慧（那就是说，超乎人类的智慧）在基督本身具有了人的性质，基督是得救的道路”（P.25）。



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中国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传教，更扩展了对神的普遍意义的认识。例如对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能够理解为了使每一个个人直接服从于基督，必须如此认知。对于“接受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世主”这样的教义，我既不承认，也不否定。因为，实在说来，尽管我尝试过，却未能体会其含义；但我确实尊重别人这样选择，也相信不少人确实如此实践他们的人生。我想进一步引伸，有些基督教派注重关于对“不敬神”、无神论的最终惩罚，也并没有多大价值。我倒宁愿相信，那些自称基督徒，以基督的名义达到自己的政治世俗动机的偏执狂们更会受到惩罚。如果我们以历史的整体来比较基督教政治集团与非基督教政治集团的功过，比较以色列“选民”种族与阿拉伯民族的冲突，谁能说上帝是站在哪一边的呢？我当然可以断定：如果基督徒对于他们的同类所犯的罪过更多地忏悔，如果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信仰的持有者）们对于他们的同类所犯的罪过更多地反对，天国不就会更早到来吗？

被称为“自然神论者”的斯宾诺莎此书的意图当然是修改人们对《圣经》的解释以便提高（或恢复）神的本来地位。作为客观实践而言，斯宾诺莎知道“托名宗教所怀的成见是如何根深蒂固”，“所以，大众或与大众脾气相投的人请不要读我的书”（P.17）。这流露出斯宾诺莎本人的先知性格（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不过，在今天的时代里，即使一个不愿意成为“斯宾诺莎主义者”的人，在阅读《圣经》之际，也应该把此书作为《圣经》的补充思考一番，看能与斯宾诺莎有多少共识。

克鲁包特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1922年）目睹自己为之献身的俄罗斯革命异化成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的红色恐怖形态，企图写作《伦理学》来改善人的心灵。他当然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但仍然以耶稣为人生最高境界，面对现实政治，发出“如果基督再生他必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哀叹。这对那些投身当代政治生活并为耶稣生活感动的人，都指明了实实在在的、不具任何虚幻神迹的个人解救之途。

注：此书1670年以拉丁文 *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 出版。中译读本根据1883年的 *Elwes* 英译版 *A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转译，译者温锡增，1982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版发行。

[2001年5月20日 美国圣荷西]

## 作为科学的比较政策研究

### 一代《比较政策评论》发刊词

文德尔班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中把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具有普遍规律的、可以在相同条件下重复发生的事件；而历史科学(即广义的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则是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因为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只发生一次(如耶稣、拿破仑)。几乎在同一时代的同一普鲁士，拉普拉斯发明了动力学原理并宣称可以推广到人间社会：只要发现了“人类运动方程”，就可以由初始条件预测任何时候的任何人类事件。

拉普拉斯的“机械唯物主义”被证明是过于乐观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以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为标志的量子力学告诉我们：连数学、物理学这些严密自然科学所研究、观测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然而，随着不断进步的数学(特别是计算机科学)被广泛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如经济行为)，使得对政策进行科学性研究成为可能。当然，政策研究具有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科学研究那样的特征。

具有科学意义的近代政策研究可以认为是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马基雅维里曾既“置身高山”参与围绕意大利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统一)的政治过程，又被冷落在“平原”，得以独立观察君主、国家的权力行为，归纳其合理(或非合理)特性，使得他的论述具有超越现实要求的普遍价值。

这样的实践性与独立性是政策研究的对立统一特征。当然，马基雅维里的方法本身依旧无法摆脱传统的“借古预今”的模式，从罗马史去查寻人类历史的共同本性。在最发达的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布思独自组织了17卷的伦敦贫民调查研究报告，促进了英国的贫民法案的形成，成为维持并改进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先导。一般地讲，在今天，属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社会政策研究以及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政策研究，在各个微观部门(如医疗、教育、住宅等)都相当普遍地运用科学原理与方法。特别是自六十年代以来，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专门处理人文、社会数据的方法论也相当发达，成为一门独特的非严密科学。(不过，我们在阅读这一类文献时，要注意许多没有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滥用或误用计算机运算的结果。)

然而，正如默顿指出，社会科学很难越出“中范围”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涉及政治行为的人类生活的宏观领域，虽然经历了世界战争、社会

主义实践，却没有从马基雅维里那里前进多少。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之后几乎成为不毛之地无人问津；所谓“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除了在美国之外，并不存在。而美国的“政治科学”或“政府学”，充满着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分析专家”到日本政治家、韩国财阀及按照其政治地位获得的学阀等，阻碍了把政策行为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还是克鲁包特金说得深刻：近代自然科学或许可以产生于象牙之塔，但对于社会的科学认识，只能产生于民众生活。

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最新的计算机通讯)以及社会知识的普及(例如情报公开法案的逐步实施)，使得立足于民众生活的、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现象等宏观领域的政策研究成为可能。知识与信息不断为民众掌握，政策的制订与改进已不再可能为极少数人所垄断，政策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独立价值获得了保障。

我们进一步确信：达成把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科学的有效手段就是比较。

作为科学的《比较政策评论》为此而生。

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一九九八年五月

## 作者简介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所长。其部分非思想性的观点也通过一些主流媒体（南都周刊、金融时报、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The Wall Street Journal、自由欧洲电台、BBC、H-NET、朝日新闻、Sino-Japanese Studies、西班牙当代史协会刊物等）为中文、日语、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波斯语世界所知。自1997年以来与妻子和儿子生活在美国硅谷/旧金山湾区。